


# 論廣州與海上 絲綢之路



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广州古都学会

封面题字：欧 初

责任编辑：蔡浩然 钟呈之 林康裕

封面设计：方楚娟

责任技编：姚明基

责任校对：钟水源



# 上海與廣州 絲綢之路論

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  
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  
廣州古都學會

中山大學出版社

## (粤)新登记 11 号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广州古都学会 编——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08

ISBN 7-306-00760-2/K·101

I 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Ⅰ ①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②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③广州古都学会

Ⅱ ①贸易 ②历史 ③海上丝绸之路

封面题词: 欧 初

责任编辑: 蔡浩然 钟星之 林康裕

责任校对: 钟永源 王国颖

责任技编: 姚明基

封面设计: 方楚娟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万象有限公司电脑排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 印张 18万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6.80元

# 目 录

##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

-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  
..... 邓端本 (3)
- 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理  
经济条件..... 黄启臣 (30)
- 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 王长庆 (37)
- 义净对勃兴海上“丝绸之路”的卓越贡  
献..... 钟永宁 (54)
- 光塔——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丰碑  
..... 杨 棠 (60)

##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

-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 袁钟仁 (67)
- 广州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丝绸、  
陶瓷和茶叶..... 陈坚红 (94)
- 清朝“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与  
海上交通 ..... 何礼荣 (112)

广州怀远驿与海上“丝绸之路” .....	丘 华	(119)
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 .....	史 彦	(121)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门户 .....	<b>邓端木</b>	(124)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经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对西欧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	黄启臣	(145)
广州建筑与海上“丝绸之路” .....	邓其生	(159)
海上“丝绸之路”对教门习俗的形成和 影响 .....	杨 棠	(170)

### 三、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人物、文物、 遗址与名胜古迹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人物 .....	夏 丰	(179)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 .....	钟 声	(186)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和名胜 古迹 .....	日 生	(200)

### 四、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在当代的弘扬与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当代国际性考察 研究的大热门 .....	何礼荣 林康裕	(221)
黄埔南岗与海上“丝绸之路” .....	李 中 区盘根	(232)

### 五、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

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 .....	<b>邓端木</b>	(239)
-------------------	------------	-------

编后语 .....		(247)
-----------	--	-------

# 一、海上“丝绸之路” 的兴起与发展





#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

邓端本

丝绸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我国的丝绸生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由于丝绸的外传，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指经过我国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进而抵达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等地的交通线，它的起点是长安。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指通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而抵达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海路，它最早的起点是广州。

## 一、航海先驱者与广州的兴起

广州作为一个集市，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早在周夷王八年（公元前 886 年），广州这个地方便有“楚庭”之建。当然，“楚庭”的建设是否事实，目前仍有争议，但根据考古发掘，西周时期，这里成为了一个聚落和市集，则是可以肯定的。

广州又称羊城，这是根据五仙骑羊含穗降于楚庭的神话而来的。传说在周夷王时代（也有说在周显王时代），曾有五个仙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骑着不同毛色的羊，降落于楚庭，口诵祝词曰：“愿此闾閻，永无饥荒。”言讫，化作五彩祥云，腾空而去。现在广州坡山的五仙现，仍然供奉着五仙

人。神话虽然不同于真实，但这个美丽的传说，也可以作为岭南开发史的参考。即居住在这一带的土著居民，最低限度在周夷王时期便学会了农耕，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故以美好的传说来赞美五谷，犹如仙人之降福于大地也。

古代的岭南地区，是百越族人民聚居的地区，由于地处南疆，所以又叫南越，居民叫越人。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南越后，郡尉任嚣在广州建番禺城（广州古称番禺），又称任嚣城，是广州有历史可据的最早城建。秦平南越后，建立郡县制，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广州是当时的南海郡治。

古代的越人，是我国的航海先驱者。史载“越人善舟”，习于航海。他们很早便在东南沿海和太平洋群岛之间开展航海活动，有段石磬，是百越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这些有段石磬除了在台湾、菲律宾等地发现外，在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群岛和苏拉威西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有发现，证明越人曾经通过航海到过这里。1976 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中，曾挖掘出一面铜鼓，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图形，形式与现在太平洋上诸群岛民族（如汤加、萨摩亚等）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再参考这些岛屿流传的神话，以及有段石磬的发现，说明百越文化很早便向海外传播。众所周知，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从来就是双向的，既然越人能航海至太平洋群岛等地，也当会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成书早于《史记》约 30 年的《淮南子》，在《人间训》篇说：秦始皇进军南越，有仰慕南越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的成分在内。当然，秦始皇统一岭南，绝不会仅仅是为了这些珍宝，还会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但从这则记载中，我

们可以知道，早在秦始皇统一南越之前，广州已因集散犀角、象牙、翡翠、珠玕等物而扬名于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汉初全国 19 个城市时，便把番禺列为一大都会，是珠玕、犀角、玳瑁、果、布荟萃之地。

据研究，这些产物在我国海南岛和合浦地区也有生产。但海南岛当时人烟稀少，生产方式落后，其产品不足以形成番禺作为全国主要市场的条件。《汉书·贾捐之传》也说，除了海南岛以外，中国要取得以上这些珍品，还有其他的途径。其所指便是从国外进口。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吕思勉读书札记》一书中也说：“《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玕、犀角、玳瑁、果、布之凑，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矣。”所谓“陆梁之地”，即古代对岭南地方的一种称呼也。

关于“果布”，最近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又有新的解释，认为“果布”并非水果和葛布，而是“果布婆律”的音译，是马来语对龙脑香的称谓，表明那时的东南亚已有香料输入广州。事实上近年来在广州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众多薰炉出土。薰炉是用来燃薰香料的，说明当时香料已在广州社会生活中出现。香料主要产地在东南亚，故“果布”即“果布婆律”的解释，亦不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香料也是最早从南方输入，然后才进一步普及到全国各地的。

在汉墓出土文物中，有透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蓝色玻璃碗等。关于这蓝色玻璃碗，有不少人认为是从西方进口的。因汉代我国玻璃工艺仍以琢玉法制作为主，制作的東西多是璧璜、印章和其他饰物。而广州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却不是用琢玉方法制成，而是用热处理的方法制造的，从形制上和技法上看，也不象是中国传统的玻璃器皿。关于玻璃从国

外的输入，我国从西汉时期便已经开始。西汉桓宽的《盐论》便有说：“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洩也。”

在汉墓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这种俑深目高鼻，两颧高，宽鼻厚唇。考古工作者认为他们就是扬孚《异物志》中所记的“瓮人”。扬孚，东汉时人，曾在汉章帝时期（76年至88年）任议郎之职，汉和帝时（89年至105年）著《异物志》。该书内容广泛，记述当时的广州有一种“瓮人”，这种人面体漆黑，多为大户人家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奴仆。很明显，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昆仑奴”的黑奴。他们有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来的，也有可能是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的。总之，他们是从外国进口的。这种“瓮人”既为扬孚记入书中，说明他们的人数是有相当数量的，其进口历史亦有相当的一段时期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促使广州附近种桑养蚕业的建立。东汉末年，广州已有桑园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记载了这一情况，谓汉献帝建安中期（206年至216年）孙吴政权派遣步骖为交州刺史，当其抵达广州时，曾登高远望，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中，见桑土成行，“原蕞殷阜”，物产富庶，所以步骖乃把交州的治所从广信迁至广州。可见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

可以推断：越人航海，开拓了南海道的海洋航线，引起了东南亚、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文化交流。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起到互通有无的作用，满足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需要，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上面所说秦始皇征南越，有仰慕越之犀角、象齿、珠玑、玳瑁的成分在内。而汉武帝征南越灭南越国，也有希望掌握南海门户——广州的成分在内。

从汉武帝征南越后加强与南海各国的交往、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情况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而广州港也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兴起。

## 二、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首记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据该书称：在汉武帝时期，由宫廷派出一批译使，与招募到的商人、水手一起，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日南（今越南顺化）三个地方出航，途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国，再从谶离国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乘船至黄支国，然后南下已程不国，返航途中经皮宗，最后在象林县边境的地方登陆。译使携带出去的是黄金和丝织物，换回来的是明珠与璧琉璃及奇石等异物。诚然，书中所列的地名，除出航和归航登陆的地点外，其余的地点在学术界中仍无统一的认识，考证的难度亦非常之大，但经过多年的研究，黄支国在印度半岛东海岸，即《大唐西域记》所说的建志补罗，则是意见比较一致。

据此，汉译使乘坐的船舶由徐闻、合浦、日南三个地点出航后，首先是围绕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线航行，渡暹罗湾后，进入马来半岛东部海域，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即弃舟登陆，步行通过马来半岛中部的克拉地峡，然后再在西岸的一个港口重新登舟，横越孟加拉湾以达印度半岛东南隅的黄支国。

为什么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要作这样的走向？海行之余还要走一段陆路？原因是在航海和造船技术均不发达的古代，远洋船舶只能围绕海岸线作近海航行，在围绕马来半岛

海岸线航行的过程中，步行横越半岛的行程比乘船绕过马六甲海峡短，整个路程所花的时间也要减少，而且还可以避免马六甲海盗的骚扰，航行亦比较安全。据史书记载，在当时横越马来半岛的主要商路一共有四条：第一条是由克拉地峡东岸附近的巴蜀西行，陆程至雅令加，或雅令加西南的盘惠色郭，然后改由河运，顺流直下丹老；第二条路线是从东岸的万仑港乘船至山国河上游，再步行至大瓜巴河下游，然后重新坐船至大瓜巴港；第三条路线是从夜功河流域的蓬迪（在今佛统附近），经三塔径抵达西岸的毛淡棉（在今缅甸境内）；第四条路线是从六坤至董里（即投拘利）。按照《梁书·扶南国传》记载，当时的克拉地峡是属顿逊国的国土范围，顿逊是东西方交通孔道、东南亚地区国际贸易中心，来这里贸易的日有万余人，珍货宝物，无所不有。该书在分析它繁盛的原因时说：“从交州往印度的客商都要在这里登陆，因“涨海无涯岸，船舶未得经过也。”“涨海”指现在的南海和东南亚海域，“无涯岸”辽阔之意也，就要说船舶抵达此地之后，就不再继续航行了。故此，商人多集中在这里贸易。事实上，在这一带的确发掘出中国制造的铜镜，印度笈多王朝的铜器，还有属于一世纪至二世纪的罗马式灯盏。这证明中国、罗马、印度商人，都曾集中在这一带贸易，而顿逊也就充当中转口岸，成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主要航路。

但是，当时的马六甲航道亦已开辟，如汉之译使从斯里兰卡归航时，有不少人便认为他们走的是马六甲航道。书中所记归航时经过的皮宗，便是马来半岛西南沿海的香蕉岛。

公元2世纪至3世纪初，在今柬埔寨兴起了一个扶南王国，大力发展航海，并吞了邻近的十余个国家，疆土拓展至五六千里。吴时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拳朱应出使该国（时

间大约是 222 年至 280 年)。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很发达，顿逊是它的属国。此外，在离该国首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呵克厄呵（OCEO）的国际贸易港（在今越南迪石北部），这个海港有运河与湄公河相通，并且在公元一二世纪间已非常繁荣。考古学家曾在这个古港的遗址中，发掘出罗马念珠数千枚，镶有罗马王像的金薄片徽章二枚，中国制品铜镜一枚，波斯制品玻璃质园片一枚等等。

在这期间，中国与爪哇已正式有航路往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 年），叶调国王便曾遣使贡献。据法国汉学家费瑯的考证，叶调国就是今天的爪哇岛。叶调使臣入朝中国之航路，当是循邦加海峡，沿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印度支那海岸，而达交州、广州的（参见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费瑯并提出，这条航道也是马来群岛人之远祖曾经走过的古航道。可见这条航道亦是早期中国丝绸往外传播的一条通道。

在这期间，中国丝绸也辗转通过印度、波斯等国。传播到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当时称它为大秦。大秦从陆路和海路输入中国丝绸。陆路通过安息（即波斯），海路则通过印度。印度和罗马都有船航行于埃及的迈奥霍穆至马拉巴海岸之间，特别是奥古斯多至尼禄帝这一段时期，达到了高峰。当时的丝绸运抵罗马后，价等黄金。据罗马学者白里内（23—79 年）的估算，每年流入印度、中国及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罗马货币名称）。由于丝绸贸易的利润极高，所以波斯商人总是想尽千方百计，利用其地理上的优势而企图垄断。大秦为了自身的利益，又要打破这种垄断的局势，于是爆发了 162 年的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果，罗马占领了波斯湾头，取得了通中国的出海口。为此，出现

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帝国麻河斯泰雷斯安拖尼诺斯皇帝）派遣使节从日南徼外来献的情况。当时的罗马使者是由波斯湾出航的，经过印度河口，沿印度海岸越过伊洛瓦底江口，围绕马来半岛航行，经过占婆（今越南南方）海域到达日南登岸。史书记载他所贡献的礼品没有什么奇珍异宝，因此怀疑他是一般的商人，不过是借贡使之名来中国行商罢了。然而，罗马欲直接与中国贸易，这却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三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论经商来到交趾，受到孙权的接见；281年（西晋太康二年）大秦国遣使贡献，航海至广州北上济阳，朝见晋武帝，带来的珍宝中有火浣布一种，点火不燃，可能是现在的石棉布，晋殷巨还专为此布写了一首《奇布赋》。在这期间，罗马皇帝喀鲁斯还征波斯（时间为282年至283年），陷克泰锡封城，用武力维护了波斯湾头的交通。于是大秦商人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南史》卷八谓“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当然，也有至广州的。

综上所述，早期通过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贸易已非常频繁。其主要航线共有四条：第一条是广州至越南、柬埔寨航线；第二条是广州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航线；第三条是广州至印度、斯里兰卡航线；第四条是广州至波斯湾转罗马帝国航线。活跃在这几条航线的有中国人、柬埔寨人、印度尼西亚人、印度人、波斯人和罗马人等。其交换的主要商品，除丝绸外，还有黄金、珍珠、象牙、犀角、翡翠、玳瑁、香料、玻璃、铜器等等。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自三国经两晋至南北朝，360余年间，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南北分裂状态。由于岭南地区距离中原较远，战火很少波及到这里，因此局势也相对地比较稳定。

三国期间，广州属孙吴的势力范围。吴国很重视东南沿海的开发，除了在黄龙二年（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带领军士万人航海至台湾外，又于赤乌五年（242年）令将军聂友、校尉陆凯领兵三万人，航海至海南岛，从而进一步巩固对广州的统治。由于东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因而引起广州外贸商务的繁荣，从东南亚各地运来的贵重商品，多从广州、交州进口。广州还是一个海军基地，驻有强大的海军；并长期把交州的州治设在广州。

东吴对广州的经营，为广州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晋初年，罗马帝国使节往洛阳朝贡之所以乘船取道广州，就因为广州当时已经是海外贸易的中心了。《晋书·义阳成王望传》记有禁止官吏至交、广两地经商的史料，说明广州外贸在这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所以朝廷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到了东晋之后，更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并有广州“贪泉”的掌故在流传。说的是广州石门的北面，有一眼泉水，饮过此泉水的人，都会产生一股贪婪的欲望。东晋隆安中期（399年），朝廷派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他特地到石门饮了一勺贪泉的水，并成诗一首曰：“古人云此求，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夷齐”是指商朝的遗臣伯夷、叔齐。他们于商亡之后，

耻食周粟，活活饿死在山谷里，以表示其宁死不屈的气节。吴隐之借用这个典故，亦表示他崇仰伯夷、叔齐的坚贞，绝不同流合污。贪泉的掌故当然是人们对广州贪官污吏辛辣的讽刺，但此事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广州外贸的繁荣，即由于外贸的发展，所以官吏才能藉此而大饱宦囊，以权谋私。像吴隐之这样的清官，是极为少数的。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的诗和“贪泉”两字，刻在一块石碑上，此碑现在仍存于广州博物馆。

按照法显《佛国记》的记载，东晋时从印度或斯里兰卡经耶婆提（爪哇）至广州的航线；已有定期航班往来。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自长安出发往印度取经，由陆路抵达该国。在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和东天竺之后，于409年在印度的耽摩立底乘船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再于义熙六年或七年（410年或411年）乘船取道耶婆提归国，原计划是从广州登陆，后遇大风吹至牢山湾上岸。法显归程说明，当有众多的印度船舶或东南亚国家的船舶航行这一条航线。

据考证，法显的航程是穿越巽他海峡而来的。这一条航线也是在1100年之后，欧洲人东来的航线。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深海航线。当时的船舶敢于开辟深海航线，证明造船技术已有极大的提高，船舶的御风能力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航海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

进入南北朝以后，广州的海外贸易又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宋书·蛮夷传》用“舟船继路，商使交属”来形容这一时期的繁荣盛况。前来贸易的国家有罗马、印度、斯里兰卡、占婆、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南齐书》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出隐海，瑰宝溢目。广州成了东方国际贸易的中心。那四面八方的稀世珍宝，都先到这里集中，

那堆积如山的宝货，光彩夺目，真是盛况空前。

在这期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南海大量向波斯湾、印度洋等地输出。阿拉伯著作家马斯欧迪（9世纪人）在其所著的《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中说过，在5世纪上半叶，幼发拉底河还可上航至巴比伦西南的希拉时，经常有人看见印度的船舶和中国的船舶停泊在该城的房屋前面。成书于545年（梁大同十一年）的《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是希腊人科斯麻士所作。他称中国为秦尼策国，并说：秦尼策国有海道通斯里兰卡，运至斯里兰卡的商品中，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等。这些船的起航地点，大部分在交、广两地。

#### 四、隋 唐 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隋代虽然是一个短促王朝，但它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分裂局面，在继承北周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上，进而统一了全国。隋文帝获得政权后，又进行了若干改革，发展了经济。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过去经济交流的障碍，并为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隋代实际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朝代。

隋朝也很重视发展外贸，隋炀帝曾派裴矩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之间，主持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长安和洛阳聚集了很多外国商人。隋炀帝还在洛阳开了个盛大的交易会，商品陈列的丰富，令外国商人为之惊叹，而且还免费招待酒食，显示大国的风度。在南海方面，隋文帝陈兵林邑，以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当时的赤土，在今马来半岛的中部，地当南海航道的要冲。常骏等从广州出航，昼夜航行，20天抵达赤土的国界，赤土以船30

艘来迎，隆重地接待了中国的使者，并遣使随常骏等回访了隋朝，隋朝亦优礼接待。其时，在中南半岛上还有真腊、丹丹、盘盘等国，亦经常派船来广州贸易。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命于广州建南海神庙，供水手、船员们顶神膜拜，祈求航行的安全。建庙求神，固然是迷信之举，但它毕竟反映了海外交通繁荣的发展盛况。

隋炀帝如此热衷派员出访赤土，显然是赤土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重要。其时扶南帝国已经衰落，海运发达的马来半岛北部诸国也摆脱了扶南的控制，纷纷寻求独立，而赤土正在东西交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密切赤土的关系，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为以后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打下基础。

到了唐代，通过南海道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果然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唐书·地理志》引述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中西海上航程，即以广州为起点，经过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洋，至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南下昆仑岛，经过湄公河口和马来半岛的海面，进入新加坡海峡，抵达苏门答腊岛。由此分程：东南往爪哇；西北出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以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自此而西，沿印度半岛西岸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还可以到达现在的巴格达。这条航线后来还伸延至红海的埃及滨海港口和桑给巴尔岛，由于深海航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便随之而起变化。如果说在6世纪以前，海上航线仍以迂迴曲折的近海航行（中间还要步行通过克拉地峡）为主，那么，进入7世纪以后，船舶便摆脱了这一限制，不但能够远离海岸线航行，而且还可

以在大海大洋中尽量选择最经济的航线。

往返这条航线的商人，除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外，尚有波斯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欧洲人、东南亚诸国人。广州江中停泊着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计其数，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为了方便外国商人的居留，唐代的广州已有蕃坊之设。这蕃坊的地址就在今天的光塔路一带。

为了保证从广州进口的物资畅通无阻地转运到全国各地，唐开元四年（716年），由当时的官吏张九龄，整治了大庾岭道。大庾岭在今广东省南雄县之北，江西省大余县之南，为五岭的过岭山隘之一，地当长江流域的咽喉。自东晋建都南京，江南经济大规模的开发之后，这条过岭山道越来越显得重要。但由于山岭的险峻，交通十分不便。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明确地指出：“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唇蛤之利”，源源而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所以非整治交通不可。经过艰苦的整治，终于把一条险峻的山路改造成成为荡荡坦途。这样一来，从广州进口物资，经北江水运至南雄后，便能顺利地通过五岭山隘，进入赣江、长江和运河，转运至全国各地，这条交通线也就成为当时的一条重要外贸交通路线了。大庾岭道的整治，不但促进了广州外贸的发展，而且密切了海外诸国与中原各地的物资交流，对推动国际间文化、科学、经济、技术的交流，均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航海至广州经商，回国后写了一本名叫《东游记》的书，记录了当时广州的许多情况，他称广州为康府（即广州府的意思，唐时在广州设中都督府，简称曰广府），是阿拉伯商人汇集的商

埠。由于阿拉伯商人数量很多，故中国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即中国称之为蕃长），按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治理阿拉伯商人。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门与阿拉伯商人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本国国王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照《可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故到此地来经商的伊拉克商人皆同声赞扬。

该书特地介绍了中国的丝绸致透明，薄如蝉翼，透过五件衣服还可以看见胸前的黑痣；瓷器精美，晶莹洁白，如透明的玻璃似的，隔着瓷碗可以看见碗中的水在晃动。

该书还记载了唐朝政府对外贸易的管理情况，说当外国船停靠广州时，中国管理港口的人员，便把船上的商品全部搬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艘商船到达为止。港务管理人员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实物税，把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交还给商人，任其自由买卖。就是皇宫购物，也要支付现钱，并且按最高的价格购买。中国皇帝从来也不肯亏待外国商人的。

该书还提到，海外贸易的收入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每到船期，广州金库每天的收入可达五万迪纳尔（按：一贯钱等于一个米卡尔，即等于四点二五克细金的一个迪纳尔）。

为了征收船税和主持海外贸易，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这是我国第一个管理对外贸易的专官。它的设立，大大增加了唐王朝的财政收入，所以当黄巢起义军在进军广州途中，义军都统黄巢要求任命他为岭南节度使时，右仆射于琮便立即反对说：“广州有市舶的收入，不能够让他们藉市舶之利而富起来，同时，国家也不能就这样轻易地丢失这一重要的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广州市舶之利，在唐王朝占有何

等重要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超过陆上“丝绸之路”。因陆上“丝绸之路”受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经常堵塞不通，而海上“丝绸之路”则通行无阻，再加上阿拉伯人热心航海，经商有方，活跃于中西的海上交通之中，故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加繁荣。《唐大和尚东征传》在谈到广州的市容时说：“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经过的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中西陆路交通基本上被切断。因此，波斯湾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商人、使者，主要是通过海路与宋朝交往。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后，便马上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事宜。据史书记载，当时通过广州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共有50多个。进口商品种类：北宋时有七八十种；南宋时达330种之多，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南宋时成书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介绍了宋代广州与海外通商的诸国，其中最主要的国家是大食（阿拉伯）、阇婆（爪哇）和三佛齐（苏门答腊岛）。在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阇婆、三佛齐、印度的故临国，都是重要的口岸。广州有航线直通阇婆，顺风一月可到。广州也有航线通三佛齐，发船后乘北风行，约40日可到。至于印度的故临国，是广州往大食必经之地。从广州坐船往大食，先到苏门答腊岛的蓝巫里，住至次年冬，再乘东北风，航行60天经故临然后抵达该国。据《岭外代答》所说：“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同样，大食国来广州，也要先乘小舟至故临，然后再换大船而东行。所以，故临国当是其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在《岭外代答》中，还提到一些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如木兰皮国（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昆仑层期国（今桑给巴尔岛）、白达国（今巴格达）、麻嘉国（今麦加）、勿里斯（今埃及）、大秦国（罗马）等等。另外，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还提到一个麻逸国，于北宋初年航海至广州通商。麻逸国，就是现在的菲律宾。由此可见，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唐代。

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建设。广州城垣自东汉末年步骛修筑，至唐末 700 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宋代，城市建设才取得较大的发展。也可以说古代广州大规模城建，实始自两宋。在两宋 300 多年间，广州曾经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城建。

第一次是北宋庆历四年（1044 年），加筑子城。子城又称中城，是在原南汉兴王府的城址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其范围与原来的城址相同。即东至文溪下游（今仓边路一带），西止西湖（今教育路、西湖路一带），南达今文明路，北抵越华路，周长五里。共有镇南、冲霄、行春、有年四门；第二次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 年）修建了东城，东城是在古越城东部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西接子城，与子城合一，东到今芳草街附近，北抵豪贤南路、南至文明路，与子城成一直线，面积共四里，有迎薰、拱辰、震东三门；第三次是熙宁四年（1071 年）增筑西城，规模最大。其东与中城隔一西湖，西抵今人民路，北起百灵路（附近还有一小巷名叫北城根），南抵今南濠街。面积有 13 里。共有阜财、善利、朝宗、航海、金肃、和丰、朝天、威远、素波等九门；第四次为南宋嘉定三年（1210 年）在城南两边筑东西雁翅城至珠江边，东翅长 90 丈，西翅长 50 丈。



在城垣建设的同时，宋代亦非常注意城濠的建设。当时珠江水面仍非常辽阔，停泊在江中的船常遭台风的威胁。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邵晔任广州知州时，凿内濠（即子城城濠）以通舟楫，作为船舶避风之所，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陈母即陈世卿，亦当时广州的地方官，为官颇有建树，甚得民心），除我二苦。”可见开凿城濠，在那个时期来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工程，对繁荣海外贸易，亦起了很大的作用。熙宁三年，王靖建成东城后，又在城外凿濠，形成了横贯东西的玉带河。至于南濠，又名西澳（在今南濠街一带），早在北宋景德中（1006年）已由经略高绅开凿，“纳城中诸渠水以达于海，维舟于是者，无风涛恐，且以备火灾”（陈大震《南海志》）。西澳又是当时广州最大的内港码头，与外侨聚居的蕃坊相隔不远，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到了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经略谢子强在大修城濠之后，又从白云山引水至城濠，大搞水利建设，筑堤灌溉城北一带的农田，做到修濠与农田水利相结合。

宋代广州建桥也是比较多的，如在南濠之上建花桥、果桥、菜桥、春风桥等，以利商业和交通。宋侍郎李昉英又在文溪上建文溪桥（今中山四路与长塘街北交叉口），狮子桥（今大石街西南方）、状元桥（位仓边路和法政路口）等。

在公共设施方面，西城修有共乐楼，楼高五丈，气象雄伟，为南州之冠。这共乐楼的建设，显然是供梯航万里而来的外夷瞻仰中华的文明。此外，在镇南门外，还有海山楼的建设。海山楼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纯粹是为了搞设海商的需要。按照宋朝的制度，每年十月，在海舶行将启碇离港的前夕，要设宴送行，以表慰劳之意。由市舶提举司主持。参加宴会者除海商外，还有船员和地方官吏。洪

适《盘州集》对宴会曾有描写，谓宴会厅上充满卉服鬻衣的夷人，还有夷歌胡伎，歌舞助兴，宾主尽欢而散。

宋代的蕃坊亦有很大的发展，蕃坊中不但有蕃市，而且有蕃学。蔡絛《铁围山丛谈》记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至1117年），广州请建蕃学，以教育诸蕃子弟。可见外国商人多有携眷到广州来定居的。《鸡肋编》在记广州的波斯妇女时说，她们皆绕耳穿孔，有带20余枚耳环的。又说：“家家以篾（竹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陈善《扞虱新话》说他们特别擅长栽种素馨花，在蕃坊中，素馨茂盛，花香袭人。外国富商拥有华丽的住宅，“楼高百尺，下瞰通流。……楼上雕镂金碧，英可名状”（岳珂《程史》卷十一）。这些外商挥金如土，家财积聚有数百万缗之多。据苏辙《龙川略志》所载，番商辛押阇罗，在广州经商数十年，家财有数百缗，此人还担任蕃长。广州修建西城时，外商曾自动捐款资助，后因地方官不同意才作罢。说明古代海外贸易的利润是很高的。

## 五、元 明 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元人陈大震《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广州与海外诸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计有140余个。与广州直接通航的国家或港口主要有：

交趾：今越南北部。

占城：今越南中部和南部。

民多朗：今越南之潘朗。

真腊：今柬埔寨。

单马令：今马来半岛中部之六坤。

吉兰丹：今马来半岛南部吉兰丹。  
丁加奴：今马来半岛丁家奴。  
罗斛：今泰国南部华富里。  
彭亨：今马来半岛南部彭亨。  
东冲古刺（孙姑那）：在今马来半岛南部宋卡。  
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巨港。  
龙牙门：今苏门答腊以东林加岛。  
南无里：今苏门答腊岛亚齐。  
浚泥：今加里曼丹岛。  
阇婆：今爪哇岛。  
重迦卢：今爪哇东部泗水附近。  
八节那间：今爪哇泗水南面附近。  
文诞：今班达群岛。  
苏禄：今苏禄群岛。  
文古老：今摩鹿加群岛。  
古里地闷：今帝汶岛。  
细兰（僧加刺）：今斯里兰卡。  
马八儿：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  
鹏茄罗（朋加刺）：今孟加拉。  
故临：今印度西南端奎隆。  
南毗：今印度西南部马拉巴海岸。  
胡茶辣：在今印度西部之海岸。  
弼施罗（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士拉。  
白达：今巴格达。  
默茄（天堂）：今沙特阿拉伯麦加。  
阔里抹思（忽鲁模斯）：今伊朗霍尔木兹。  
瓮蛮：今阿曼。

勿拔：今奥布兰。

勿斯离（勿斯里）：今埃及。

层拔（层摇罗）：今东非桑给巴尔岛。

以上所列举的通商口岸，应该说比宋代有所增加。如文古老、古里地闷、文诞等地，都是比较生疏的名字。

元代从欧洲来华的旅行家鄂多立克，是通过南海海道乘船抵达广州的。他先从陆路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然后乘船至西印度海岸，再转船达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再航行到苏门答腊，并经爪哇、加里曼丹、越南而抵中国。他在其著作《东游录》中，称广州为辛迦兰大城，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他特别指出广州的航运发达，港口拥有的船只，比当时意大利整个国家拥有的船只还要多。广州的鹅比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要大要好，而且价钱也很便宜。他很有兴趣地介绍广州人吃蛇的情况，并说：“这些蛇（很有香味）并且作为如此时髦的盘肴，以致如请人赴宴而桌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这是外国对“食在广州”最早的介绍。鄂多立克约在1322~1328年间在中国旅行，当时正是元朝中叶。

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之一、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亦于1347年抵达中国的泉州，并访问了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他在其《游记》中称广州为“兴阿兴”或“秦克兰”。在他的笔下，广州是世界的大城之一。市场优美，物产丰富，为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瓷器市场。商人由此转运瓷器至世界各地。他还提到广州的光孝寺和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并说当时的广州专门划一地段供外国商人居住，在居住区内有蕃判一人，伊斯兰教牧师一人。“蕃判者代表教徒清理词讼，判断曲直”。说明元代还有蕃坊存在，蕃判者当是

唐宋时期蕃长一类的人物。

中国历史进入明代之后，便有“闭关锁国”的政策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但由于商品经济不断的发展，再加上世界各国都要和中国通商，因此，以广州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处于发展的状态。

以明廷所提倡的“朝贡贸易”为例，在设立市舶司主持这项工作的三个港口中，规定宁波只准通日本，泉州（后迁至福州）只能通琉球，而广州却规定可通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苏门答腊、浣泥、满刺加、斯里兰卡、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古麻刺、柯支、古里、以及波斯湾及阿拉伯半岛等数十个国家。嘉靖二年（1523年）因日本贡使宗设、宋素卿在宁波相争，引起火并，宗设乘机大掠宁波。于是朝廷大臣中极言海外贸易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应该进一步实行海禁，遂罢福建、浙江两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也就是“一口通商”。

官方对“朝贡贸易”的限制，并不能阻止民间贸易的往来。当时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工业用品和生活用品，几乎都是仰慕中国。以日本为例，如果得不到中国产品的足够供应，物价便会飞快地上涨，并且十倍于中国的价格。高额的利润，使中国商人冒险走私，甚至发展为武装护航。当时与广州通商的东南亚国家，几乎都有华人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实际上是由华人经营的国际贸易市场。《东西洋考》记吕宋有所谓“洞内”的地方，即华人经营商业的居住区，其中多是闽、广两省的商人。他们大都通过走私的途径，取得国内商品，满足侨居国的需要，也刺激了中国丝绸等物的商品生产。

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还表现在多条新

航路的开辟方面。

第一条航路是经由七洲洋、占城附近海面南下，穿过加里曼丹西部的卡里马塔海峡，再沿爪哇海岸航行而至锦石，然后穿过泗水海峡至巴厘岛，东行经过龙目岛、松巴哇岛，东南折入松巴海峡，沿佛罗勒斯岛南面沿海航行，抵达帝汶岛。关于帝汶岛，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曾有记载，称为古里地闷。但有关具体的航线，该书却没有提到，说明元代这个岛与中国的交往并不正常，而且汪大渊所云当时的出航地点在泉州，不在广州，而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开列的通商国家中，也没有提到帝汶岛。可见该岛与广州还未正式通航。关于这条航线用正式文字记载下来，还是始于明代。

第二条航线是欧洲至广州航线。明以前，欧洲与广州的海上通商，多利用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海港，故贸易的货物要辗转经过东非或西亚大陆，才能到达罗马等地。在中国史书中，对大秦国记载较多，其余有关欧洲国家的情况记载甚少，来华贸易的商人与阿拉伯人相比较，也是居于少数。明初，欧洲与中国交通，一度断绝。直至明朝中叶，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才有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航抵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以后，经过多次的航海试探，葡萄牙的军舰才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航抵广东海岸屯门港。同年9月，舰队驶进广州，要求通商，从而开辟了欧洲直通广州的新航路。于是断绝了100多年的中欧交通，由于新航路的通航，又得到了恢复。

第三条航线是广州经菲律宾至拉丁美洲墨西哥航线。1570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领了菲律宾，便为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航线的开辟做了准备。1574年有两艘马尼拉帆船驶往墨西哥。1575年，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航线

正式通航。每年3月，中国商船成群结队由福建的月港、厦门和广东的广州、澳门等地，扬帆起航，运丝绸、瓷器等物，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再由马尼拉的帆船转运到墨西哥港口。这种贸易地区的扩大，明显地反映了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据儒塞斯《澳门史》所载，葡萄牙的大帆船，每年都要从里斯本出发，满载毛织品、玻璃制品和钟表以及葡萄酒等，经印度的果阿驶往澳门，在澳门取得丝绸、瓷器等物后，再开回欧洲，据说利润可达二倍至三倍。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葡萄牙船舶还经常由广东航抵日本，大量购买日本的黄金回国。万历年间，广州每年都举行两次出口商品的集市贸易，每次开市数天或数星期不等，由于全国各地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物数量非常多，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为了换取更多的中国商品，他们从墨西哥进口白银，运来中国，作为交换时支付的硬通货。按照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载，葡萄牙人每舶载白银巨万，到广州购买货物。据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墨西哥官员的统计，外国每年向中国输入的白银有百万以上。而广州每年通过澳门输出的仅生丝一项便有好几千担。

广州外贸的繁荣，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开发。顺德、佛山两地出产的“粤缎”、“广纱”，行销海内外。由佛山所生产的“广铁”，也是中外驰名的。陶瓷工业经过技术革新后，所烧制出来的“广彩”瓷器，远销东南亚等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广东地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广州经济出现了一个繁荣兴盛的局面。

清朝以后，继续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康熙年间虽然开放海禁，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严格海禁，只

许广州一口通商。由于全国的对外贸易，只能集中在广州一地进行，因此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被称为广州贸易。参加贸易的主要是英、法、荷、意、德、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等国，后来美国也参加进来，广州成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中心。

在出口的商品中，茶叶占了第一位。凡来广州经商的国家，都要购买茶叶回国，茶叶的销售量由 1818 年的 5 943 631 元（银元），增至 1832 年的 15 241 712 元。在前后不到 15 年时间内销售量竟翻了三番。

其次是生丝和绸缎出口。1817 年，生丝出口的货值仅有 635 440 元，但到了 1833 年，竟增加至 3 097 167 元，在前后不到 17 年时间内，增加了 5 倍。绸缎的出口增加得更快。1818 年出口货值为 300 000 元，1822 年货值却一下跃至 3 522 456 元，在前后还不到 5 年的时间内，却增加了 10 倍。

第三为南京土布，年出口货值也从 60 多万元增加到 100 万元以上。

自 18 世纪 60 年代初到 19 世纪 30 年代初，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 560 万两上升至 2 268 万两，在 20 年的时间内，增加了大约 3 倍。其中，英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由 290 万两上升到 1730 万两，增加了将近 5 倍。美国与中国贸易较迟，但却后来居上，从 18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19 世纪 30 年代初期，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内，增长了 10 倍以上。外国进入广州的船舶吨位，在 1730 年至 1830 年的 100 年间，增加了将近 22 倍，凡此种种，均可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已大大超过陆上“丝绸之路”。



## 六、结语：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特点

综上所述，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一）历史悠久

我国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期间，在沿海地带，虽然已经诞生了一系列的港口城市，但对外贸易港，却多出现在南方。这是由当时国际贸易形势所决定的。因为在那特定的环境下，能够通过海路与中国贸易的，在东方只有日本。而秦汉时期日本文明还很不发达，交通工具也十分落后，因此不可能与中国有太多的贸易往还。这决定了这一时期从福建至山东、河北一带的漫长海岸线上，几乎没有什么对外贸易港的出现。然而，通过南海与我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却有文明程度很高的罗马、印度，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当这些国家航海东来欲与我国贸易时，首先接触的就是南方诸港。在南方诸港中，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对外贸易港有番禺、交趾、日南三地，三地中又以番禺开发最早。《史记·货殖列传》在列举全国性大都会时，辽阔的岭南地区只有番禺在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再看当时的日南、交趾，“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后汉书·南蛮传》）。象这样落后的地区，舶货的消费水平肯定不会很高。而外舶梯航万里前来贸易，当然要选择最有利的经商条件，这个最有利的经商地点则非番禺

莫属。《汉书·地理志》亦明确指出，中国往商贾的地方是番禺。中原所需舶货，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初期，也大部分是通过番禺进口的。在广州的辽阔腹地内，四川是当时丝绸的主要生产基地，四川的货物通过夜郎输入番禺，“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汉书》卷95）。番禺既与海外通商，则四川丝绸当然也会通过此地出口至南海诸国。事实上在汉代，广州附近亦有丝绸出产。所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为悠久。

## （二）长盛不衰

广州作为一个港市，形成于秦汉时期。汉武帝征南越后，日南和交趾两港兴起，广州、日南、交趾鼎足而为当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三大港口。进入魏晋南北朝后，日南和交趾两港逐渐衰落，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到了唐宋时期，更是雄踞全国的第一大港。元代，它虽然被福建的泉州所超过，但作为一个港口来说，它仍然在发展。所以进入明清期间，它又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1757至1840年），它还是我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在我国古代的漫长历史中，曾经有过许许多多闻名于世的港口，如上面所说的泉州，曾被阿拉伯人称为世界大港。此外，明州（宁波）、扬州，也是世界有名的港口。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物换星移，这些古港都纷纷地衰落下来，唯有广州却长盛不衰，至今仍是世界著名的港口。

广州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港口的优越地理条件之外，它还是南中国的门户，出入的津口，而且这个津口大部分时间是开放的。开放促进它的繁荣。另外，在它本身，在它的周围，在它的腹地，建立了许许多多外向型的经济，这些经济

与国际经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时期，阿拉伯人万里远航，汇集此地经商，而当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欧人东来，首先到广州叩关索市，其原因就是如此。

总之，广州是一个历 2000 多年而不衰的港口，中国海外贸易的历史，也就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历史。

### （三）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自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以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肩负着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任务。贸易国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其作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其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早在唐代初期，伊斯兰教领袖穆罕默德便这样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千千万万的阿拉伯人，梯航万里，前来广州经商、学习，把中国文化传播至全世界，把广州作为文明城市，向全球介绍。旅游家接踵而来。于是乃有中世纪四大旅游家之一、摩洛哥人伊本·巴图泰在其《游记》中说：“秦克兰（广州）城者，世界大城中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多少人仰慕广州，前来进行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其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从而出现社会巨大的变革。因此，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不单纯是交通要道和贸易之路，而是世界文明建设之路，走向社会进步之路。

（本文作者生前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理经济条件

黄启臣

广州是中国最早从海上对外贸易的南大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而且 2000 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久不衰。这与广州所处的地理经济环境的优异是分不开的。

## 一、优异的地理环境

广州位于北纬  $20^{\circ}08'$ 、东经  $113^{\circ}17'$  的交叉点上，居广东省海岸线 4300 公里的中央，背靠五岭余脉的白云、越秀二山，南临浩瀚的南海，处于欧、亚大陆的东南端，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洲之间海上航路之要冲，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洲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广州至亚丁港海路相距 9836 海里，比泉州、宁波、上海等东南各港口近得多。因此，自秦汉以来，便开辟了广州到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航线，当时称为东西洋航线。即从广州港出发，往东可到吕宋（菲律宾），往西经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到达东非各国。广州又是中国南海沿岸中央的一大天然良港，位置适中，前面是一马蹄形的溺谷湾，自踞的谷湾北缘海岸的中点则形成和建设港市天然有利条

件。

广州港口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优良自然条件。广州港是近海河口港，港口建于珠江岸边，离珠江海口 80 海里。由于广东雨量充沛，使“珠江流域的平均流量达每秒 11600 立方米，全年流入海中的总水量平均达 3659 亿立方米；仅次于长江而超过黄河 7 倍以上。平均径流或每平方公里流出的水量达每秒 25.9 立方米；仅次于闽江（ $34.1\text{m}^3/\text{s}$ ），而约为长江  $17.5\text{m}^3/\text{s}$  的一倍半，或黑龙江  $5.3\text{m}^3/\text{s}$  的五倍以及黄河的  $2.0\text{m}^3/\text{s}$  的 13 倍”<sup>[1]</sup>。这就使珠江经常保持丰满的水位，而大大有利于广州航运。同时，由于广东具有石灰岩地质而使潜流得到过滤的特点，以及温暖的气候条件，使得各种植物生长茂盛，土地裸露时间短，面积小，植被率高；使得江河的含沙量小，如西江的年平均含沙量只有 0.93/10000（梧州），北江为 0.46/10000（清远），东江为 2.3/10000（河源）。这就为广州港及其航道提供了一个水量足、水位高、淤积浅的优越条件。在广州港到南海的 80 海里航道上，一般水深 7 米，潮汐期水位更高。经过疏浚整治，吃水 30 英尺的货轮可乘潮驶入黄埔港。无论是白鹅潭还是黄埔外港区，2000 多年来从未发生过淤港或航线改道的现象。这就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兴起和历久不衰的自然物质条件。纵观我国港口的历史，不少港口正是由于缺乏象广州这种自然条件而衰落的。例如泉州港，在唐代它与广州、杭州、交趾（今越南北部）并列为中国四大港市。而且，到了元代，一跃压倒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但从元末明初以至今日，泉州港则衰落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由于晋江的地壳隆起，河床升高，流域区内水土流失大，河流含沙量高达年平均 3.4/10000，洪水期达到 20/10000。这样，大

量泥沙充斥泉州港，使港口急剧淤浅，失去航运之利。于是，到明清两代，广州又恢复成为全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了。

广州地当西、北、东三江出海的汇合处。西江主流经广州珠江在磨刀门出海；北江主流经洪奇沥出海；东江主流在虎门出海。西江流经广州附近冲积形成珠江三角洲，三面高亢，主体为一下降盘，受到断决运动的作用；西北江汇流形成的西北江三角洲，由西向东挠倾；东江三角洲由东向西挠曲，使珠江水系向东偏集于珠江口而呈现出向心状。广州正当珠江水系的中心，形成一个优良的河口港和海口港的优势，而成为海运和河运的交通枢纽。在古代没有先进科学的交通工具、水运唯一具有经济效益（运量大、运费低）的情况下，广州起了江海联运的作用，非同小可。

广州背负山险，使之得以成陆早和开发早。广州北枕白云山，市内还有越秀山、番山、坡山等岗地，使广州成为开发早的港市。因为珠江三角洲原来是一个由地层下陷而成的浅湾，海水向内陆伸入。但由于广州地势稍高，海水只能浸至广州南端，所以广州成陆最早。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广州先民已在这里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业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广州的原始文化。到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任嚣率军队平定南越，在“番山之隅”建筑南海郡治番禺城。而此时，上海还未完全成陆。唐代海岸线才达到上海附近的江湾、严桥一带，直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才形成上海县。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553—1556 年）才建筑上海县城垣。建城的历史比广州迟 1500 多年。可见，成陆早，开发早，是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条件。

季风气候也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有利的自然

条件。广州位于亚洲大陆东南端，面临热带海洋，天气和气候全受亚洲季风支配。陆地与海洋冬夏之间，气压高低形势不同，风向相反，风性各异，天气差别极大。每年3至8月，受海洋气流控制，猛吹南风、东南风和西南风，谓之夏季风（Summer monsoon）；自9月至翌年2月，受大陆气流控制，猛吹北风、西北风，谓之冬季风（Winter monsoon）。这种风向至有周期，极之有恒。同时，由于夏季气压比冬季梯度小，所以平均风速也较小。从全年看，各月平均风速一般每秒在1.7—2.1米，年平均为每秒1.9米，缓缓向岸吹送。广州古代帆船开往南洋、印度洋、东非、西欧以及拉丁美洲各国贸易，完全利赖于此种季风气候。而来自南洋和西洋各国的帆船，每年夏季借西南季风驶来广州，再由广州转到东南沿海的漳州、泉州、宁波一带，以及琉球、日本长崎等地；次年秋冬，又借东北季风返航。这样，利用季风风力，一年往返一次，随风顺流，给广州港市的开发以得天独厚的恩惠。

## 二、广阔的经济腹地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同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密切相关。广州借助地处西、北、东三江交汇处的便利内河航道运输，编织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经济腹地。

首先，西、北、东三江入海水道形成的珠江三角洲，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层经济腹地。珠江三角洲原是一个古老的大海湾，其间岛屿无数，后因三江长年夹带大量泥沙沉积于海湾内，从三江各自不同的流向形成三角洲，岛屿变成平原的山丘。这些三角洲互相穿插，互相衔接，最后形

成了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湾内复合的珠江三角洲。三角洲的土壤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腐殖质，据农学家的研究，其有机质含量达到3%左右。其中含氮量为0.18%，是水稻高产型土壤。这里河网密集，沟渠交错，水源丰富，灌溉方便，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极为有利于水稻、蚕桑、甘蔗、水果、花卉、蔬菜等喜温作物和塘鱼的生长。所以，早在东汉末年，珠江三角洲的种桑养蚕业就已相当发展。到了唐懿宗时代，已把种桑养蚕和池塘养鱼结合起来。中经宋元两代的发展，到了明代，已发展成为“桑基鱼塘”的生产格局，形成了桑叶养蚕，蚕屎、蚕蛹喂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的桑——蚕——鱼——桑的生态良性循环，出现了“蚕壮鱼肥桑茂盛，塘肥桑旺茧结实”的生产局面，为广州、佛山等丝织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从而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供应大量的货源。正如屈大均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sup>②</sup>。

其次，西、北、东三江流域地区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层经济腹地。西江是珠江水系最大的干流，全长2129公里，流域面积352309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面积的78.4%，是珠江水系中经济价值最大的河道，是广州联接广西大部分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从三水县至梧州一段河道，水面宽阔，常年可通行400—500吨轮船，夏季涨水期可通行1000吨轮船。在整个珠江水系运输量中，西江水道的运输量占82%<sup>③</sup>。因此，西江对沟通广州和广西的货物运输，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供应，无疑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江是珠江水系第二条航运价值较大的河流。它干流全长582公里，流域面积4648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面积的10.31%，在广东境内有支流70多条，深入到粤北和湘南的



主要城镇和广大农村。粤北地区以及湖南、赣南的土产货物，都可以经北江及其支流而运入广州出口，而广州进口的货物亦可通过北江及其支流运往粤北、湖南和赣南各地销售。东江是珠江水系第三条重要河流。它干流全长 523 公里，流域面积 33200 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7%。粤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丝货、茶叶等土特产，都可顺东江运到广州出口。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充足的货源。

再次，珠江上游的云、贵、川、湘、赣等内地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外层经济腹地。从广州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境内之后，可以通过广西境内的浔江、红水河、南盘江等水道，进入贵州、云南；又通过牂柯江而进入四川盆地。这样，把广州与云、贵、川内地联系起来。云、贵、川的土特产就可转运至广州出口，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更充足的货源。例如四川著名的蜀布、邛竹杖和枸酱正是通过牂柯江而西江运到广州出口到交趾（越南北部）、日南（越南中部），进而远销印度。史称：“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它”<sup>④</sup>。而广州进口的外国货物亦可以上溯西江而牂柯江运销云南、贵州和四川诸省。

同时，广州也可以通过北江、东江把腹地延伸到华东、华中地区，而且路程最短。东汉初年，疏凿武水北江水道后，湖南、湖北以至中原的丝货就可从郴州顺武水而下坪石、乐昌、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广州出口。到了唐代，大庾岭道开通之

后，成为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丝货南运广州出口的通衢大道，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充足的货源。

综观世界贸易港口史，任何一个贸易港，都与其经济腹地唇齿相依。腹地越辽阔，港口就越充满活力，其地位就越重要。在古代中国，广州就是以它依仗河流的触角使经济腹地伸到全广东以至全中国，使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起点和贸易大港，而且经久不衰。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对外贸易仍然盛况空前。中国丝、瓷、漆、茶等出口商品和外国的进口商品都会聚于此贸易。清代，外国人在一份报纸上作过这样的报道：“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sup>⑤</sup>。

## 注 释

- ① 陈正祥：《广东地志》第 27—28 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8 年版
-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 ③ 陈正祥：《广东地志》第 127 页
- ④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 ⑤ 姚贤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第 305 页，中华书局，1962 年版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 “丝绸之路”航线

王长庆

中国的丝绸自古以来闻名海内外，这些丝绸（还包括其它商品）输往国外的路线主要有：经过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为我国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一、汉朝时期的航线

广州对外贸易的起源很早。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经略南越之时，番禺（今广州）已经是犀角、象牙等物的集散中心。西汉时期，广州更成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史记·货殖列传》）的大集市。揭开了从这里进行海外丝绸贸易的序幕。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帝时，对外贸易由黄门（即宦官）率领招募来的商人，携带丝绸和黄金等物品出海，换取外国的珠宝、宝石、异物等。当时航行的路线书中亦有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

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我国史书中对海外交通航线最早的记载。书中提到的当时海外国家的名称，目前无绝对准确的考证，但多数专家都认为此航线是：从日南（今越南广治附近）、徐闻、合浦（今广西境内）启航，经马来半岛等地，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及南部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 二、三国和隋朝时期的航线

三国时期，广州海运航线有了新的发展。孙吴期间开辟了从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南进入西沙群岛的航线。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派朱应、康泰出使东南亚各国，走的即是这条航线。《扶南传》中如实记载了这一航线。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西沙群岛的考察中，在北礁地带发掘出六朝时代的六耳、罐和陶环，找到了这一古航线的实物证据。这条航线的开辟，缩短了我国前往东南亚的航程。

公元一世纪，罗马水手在印度洋上发现了信风，欧洲商人从而打通了印度洋上的航线，改变了以往靠阿拉伯人才能与中国通商的局面，从此，往返于中国、南洋群岛、印度洋之间的外国商船逐渐增多，为以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和交通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现象：东吴之前，凡通往西南海上的史事，常说某国在徐闻、合浦、日南以南若干里；两晋南北朝以后，则称为去广州若干里。这说明：东吴以前，广州未能与外国直接通航，徐闻、合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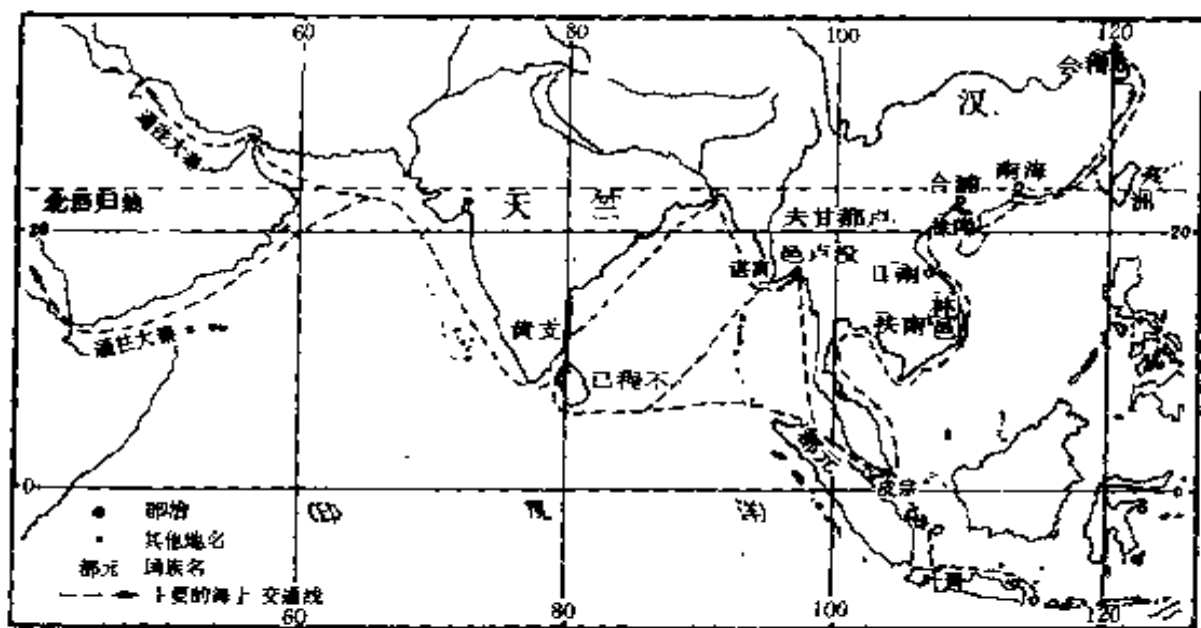


图 1-1 西汉及三国时代和印度洋以西的海上交通线图（选自齐易主编《中国水运史丛书：广东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年版）

南是南海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东吴以后，广州则直接与外国通航，再加上地理环境的优势，从而取代了徐闻等港口，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隋朝时期，隋炀帝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在大业三年（607 年），隋炀帝曾召募能出使海外的人员到赤土国。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应召前往，带有丝织物五千段。《隋书》卷八十二记载：“骏等自南海郡乘舟……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此航线是：从广州出航，沿安南海岸航行，入暹罗湾（今泰国湾），经过真腊（今

柬埔寨)海岸,至马来半岛北部东岸,望见狼牙须国之山,南行过马来半岛之鸡笼岛,然后抵达赤土国界(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文中认为赤土在马来半岛之中)。

### 三、唐 宋时期的航线

唐代,中国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海外贸易和交通亦有很大的发展,而广州则是当时全国最主要的海外贸易港口。

据日本商人楠顺次郎考证,唐朝时广州至海外的航线主要有六条(见《新民丛报》1905年第15号《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

1. 广州、南海(即东南亚)、锡兰(今斯里兰卡)、阿拉伯、波斯(此航线经阿拉伯海岸进入波斯湾)之间。

2. 广州、南海、锡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之间(此航线经阿拉伯半岛之南进入亚丁湾、红海)。

3. 波斯、锡兰、南海、广州之间。

4. 阿拉伯、锡兰、南海、广州之间。

5. 锡兰、阇婆(今爪哇)、林邑(今越南中部)、广州之间。

6. 广州、南海之间。

其中,广州至波斯航线最为著名。

唐朝德宗贞元间的大臣贾耽,在其《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中记载了这条航线。但原书早已失传,北宋欧阳修撰写的《新唐书·地理志》作了转载,现全文摘录如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

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屯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笮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二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筒罗国。筒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国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颯国。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颯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颯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谿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

原文中所载的 30 多个地名，据有关专家考证，屯门山在今九龙西南部，即屯门；九洲石在今海南岛东北角附近；象山为今独珠山，在海南岛东南岸；环王国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占不劳山为今越南占婆岛；陵山在今越南燕子岬；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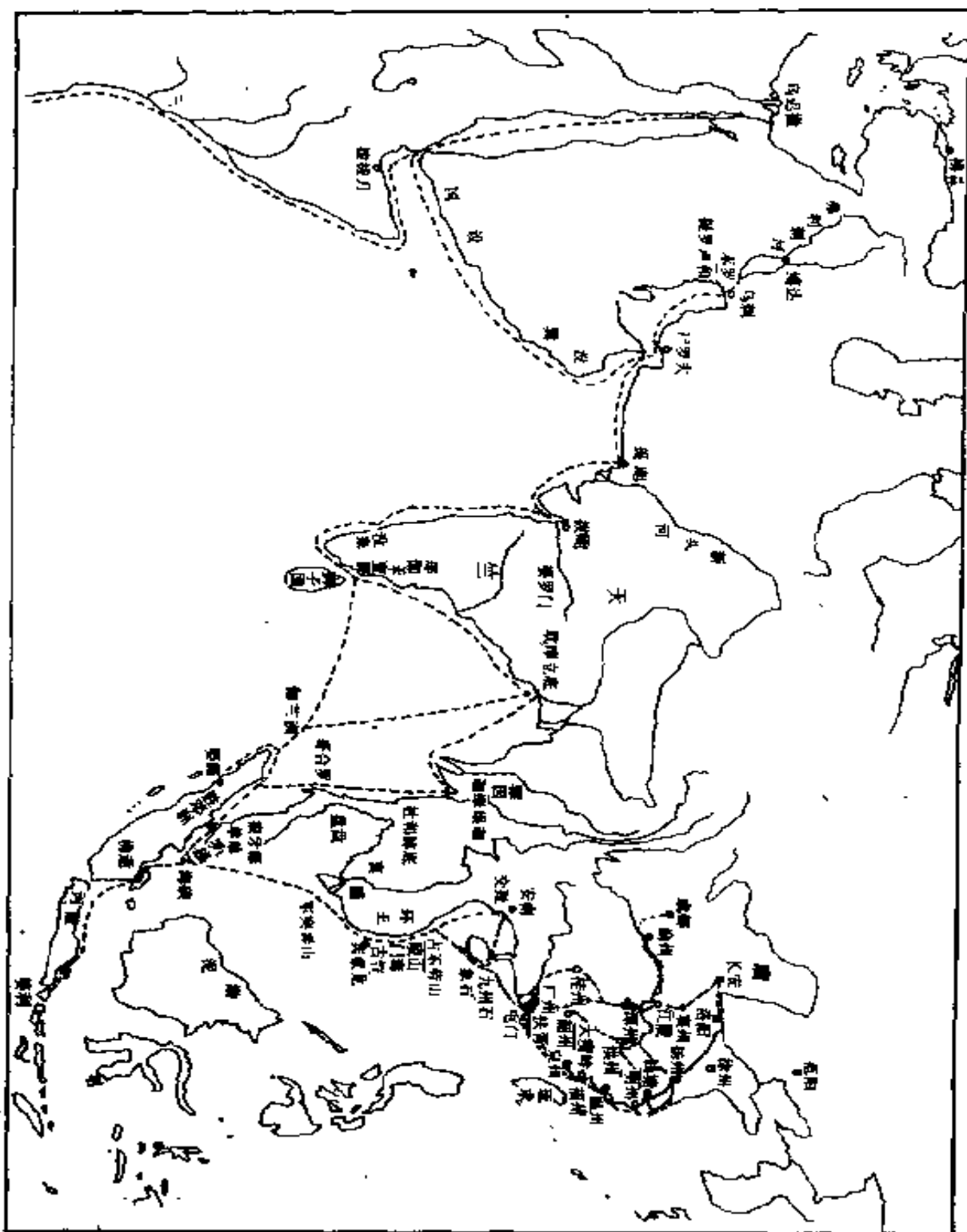


图 1-2 唐代广州内对外交通图（选自齐易主编：《中国水运史丛书黄埔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年版）



毒国为今越南归仁；古笮国在今越南茅庄；奔陀浪洲为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即现在的昆仑岛；海碇即新加坡海峡；罗越国为今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在今苏门达腊岛东南部；诃陵国为今爪哇；葛葛僧祇国为今马六甲海峡南部不罗华尔群岛中的一岛；箇罗国为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哥谷罗国在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南；胜邓洲在今苏门达腊岛北部东海岸、棉兰之北日里附近；婆露国即婆鲁洲，在今苏门达腊岛北部西海岸大鹿洞附近；伽蓝洲为今尼科巴群岛；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南天竺为今南印度；没来国在印度乌拉巴尔海岸之奎隆，婆罗门即古印度；拔颯国为今印度纳巴达河口的布罗奇附近；新头河即今印度河；提颯国在巴基斯坦前首都卡拉奇略东；提罗芦和国在今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乌刺国为今奥布兰，在巴士拉的东部；弗利刺河为今幼发拉底河；大食国即今天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末罗国即今巴士拉；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参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29页）。

如上所述，这条航线的走向是：从广州起航，南行至珠江口的屯门山，然后折往西南，经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往下越过马来半岛的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达腊岛。由此向东南到爪哇，转向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还可以到达现在的巴格达。在这条航线上，从印度半岛横渡印度洋，可达非洲东部的三兰国（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向北行经设国（今也门的席赫尔）、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拉伯半岛东南）、设巽国（今阿曼的苏阿尔）、拔离诃磨难国（今巴林）等数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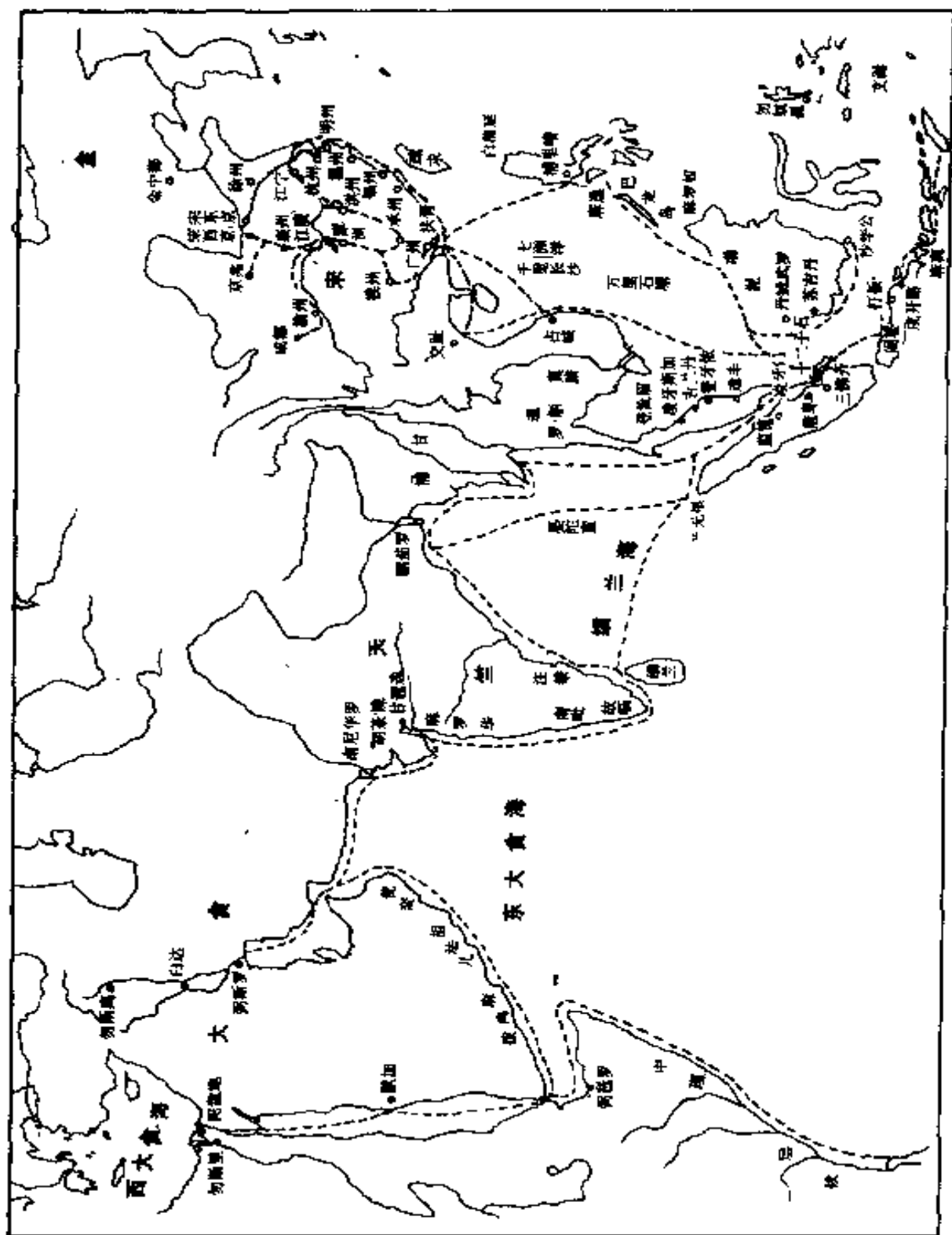


图 1-3 宋代广州对内对外交通图(选自齐易主编:《中国水运史丛书:黄埔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

图注:东大食海即今阿拉伯海;细兰海即今阿拉伯湾。

小国，同样可以来到乌刺国（今伊拉克一带）。上述这条全长10 000多公里、沟通亚非两大洲的航线，是当时一条主要的国际贸易航道，对古代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我国工农业业生产继续发展，航海技术不断提高，海外贸易和交通在唐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于宋朝受北方辽国、西夏、金国的侵袭，对西亚各国的陆路交通几乎停顿，中西交通和海外贸易主要依靠海路，广州成为当时对外交通的主要门户。

广州当时通往海外的航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1. 广州至占城（今越南南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有占城专条，说其：“之入中国一月可以往返。”《宋史》卷489，外国五载。“占城……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

2. 广州至阇婆国（今爪哇）。“广州自11月12月发舶，顺风速一月可至。”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上，阇婆国条“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sup>①</sup>“阇婆国在南海中……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sup>②</sup>

3. 广州至三佛齐国（今苏门达腊岛）。“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者，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sup>③</sup>

4. 广州至故临国（今印度东南部）。“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sup>④</sup>

5. 广州至大食诸国（今阿拉伯国家）。“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风北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至此国。”<sup>⑤</sup>

“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sup>⑥</sup>

6. 广州至摩逸国（今菲律宾）《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记载：“……又有摩逸国（今菲律宾），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

7. 广州至层檀国（今非洲东部的桑尼巴尔），《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记载：“层檀国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宁四年始入贡，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

#### 四、元 明 清时期的航线

元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福建的泉州超过广州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港口。虽然如此，广州仍不失为一个重要港口。从广州启程的航线的有：

1. 亚洲航线。亚洲航线主要是广州至南洋和印度洋航线。元人周致中的《异域记》，特别记载了三条与广州有关的航线：广州至占城（今越南南部）航线，“顺风八日可至。”（见《异域记》占城条）。其次是广州至三佛齐航线，“自广州发船，取正南半月可到。”（见《异域记》三佛齐条）。再其次是广州至莆家龙（今爪哇北岸）航线，“广州发的，顺风一月可至。”（见《异域记》莆家龙条）。周致中如此重视上述三条航线，足以说明广州与这些港口交往的频繁。

另外，《元史》卷 210 外夷三亦记载：“元世祖十七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官兵自广州航海至占城港。”

2. 欧洲航线。从意大利出发，经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过印度洋、斯里兰卡，经苏门达腊、爪哇、加里曼丹岛，越

南海面到广州。1322—1328年在中国旅游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就是沿上述航线来到中国的，当时正是元朝中叶，他的著作《鄂多立克东游录》详细记载了这条航线。

3. 非洲航线。由非洲东海岸，横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越南海面到广州。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于1325年从摩洛哥出发经此航线于1347年先到泉州，而后又来到广州。这条航线单程顺风约需160天左右。往返一次约需要两年时间。

通过上述航线，广州同亚、非、欧许多国家有了通航交往，大大促进了同这些国家的通商贸易。

据元朝人陈大震著的《南海志》所载，当时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多个。

明、清两代一度曾实行禁海政策，不允许同海外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清代取消禁海政策后也只开辟广州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垄断全国的海外贸易，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引起了航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欧洲资本主义进行海外殖民掠夺提供了方便。他们为加速原始资本积累，扩大商品流通，占领海外市场，千方百计开拓中国市场。因此，明、清两代，广州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海运航线。

明代，据洪武三年（1370年）设置泉州、宁波、广州市舶司的规定：“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市舶》）。嘉靖元年又规定：“广东船舶往诸番，出虎头门，始入大西洋分东西两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形成了三条与世界许多国家交往的航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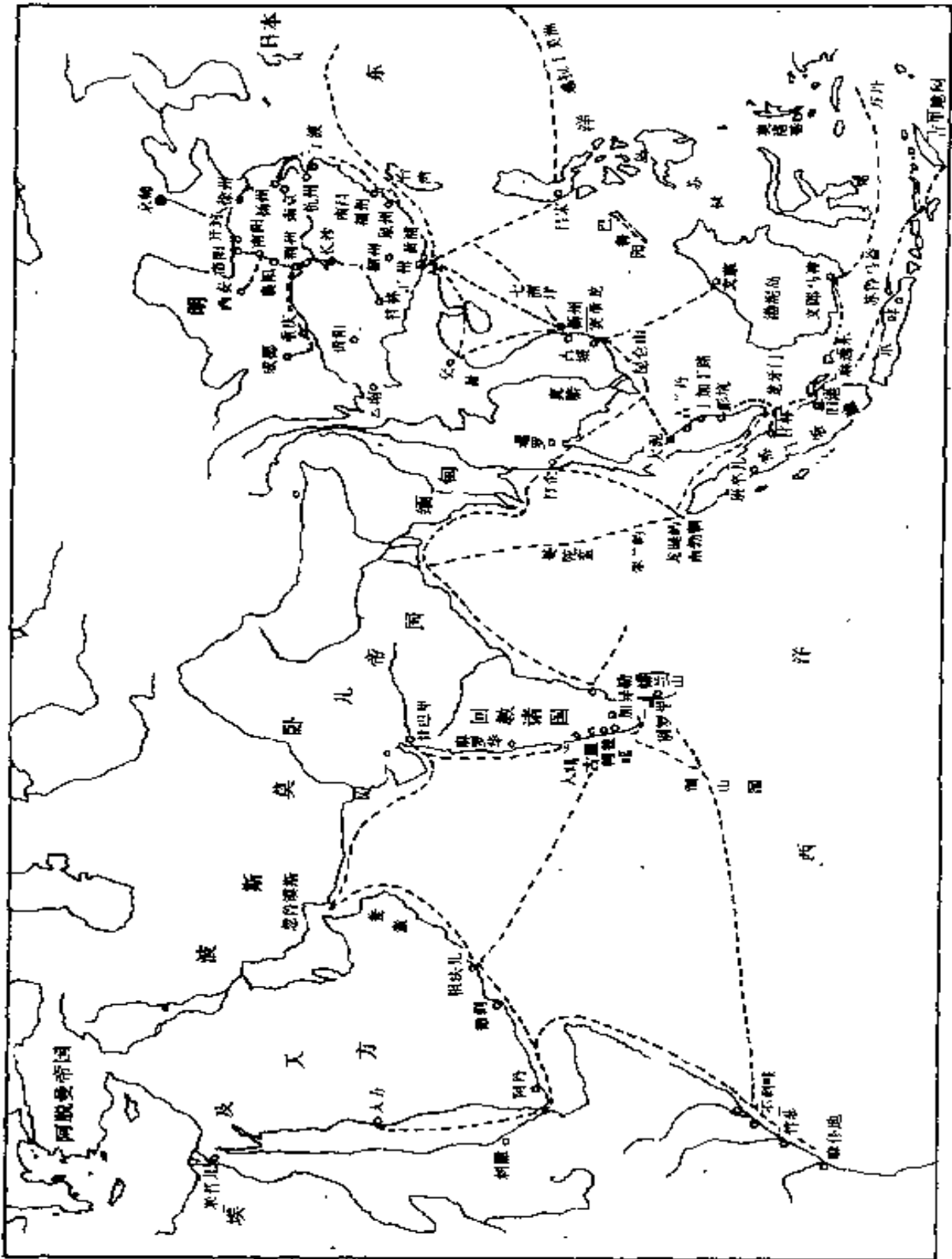


图 1-4 明代广州对内对外交通图(选自齐易主编:《中国水运史丛书: 黄埔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版)

1. 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航线。这条航线的走向分为两段：第一段从广州启航，经澳门出万山后，向东南行，经东沙群岛至马尼拉；第二段从马尼拉启航，“经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乘西南季候风北行，至北纬 37°和 39°之间的水域后，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再顺北美西岸海域乘西北风或北风南行，到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航程约需五个月。”<sup>②</sup>

2. 广州——欧洲航线。这条航线也分两段：第一段从广州出发，经澳门出海，西行横渡印度洋到印度西海岸的港口果阿；第二段从果阿启航，又分两条航线，一条走印度洋中的官屿留（今马尔代夫群岛中的马累），西行经木骨都束（今索马里东海岸）抵达欧洲；另一条从亚丁渡海，绕葛儿得风（今索马里瓜尔达富伊）和哈甫儿雨（索马里的合丰角），再经顺多大屿（今索科特拉岛），沿东非海岸直下不刺哇、麻木和慢巴萨（今蒙巴萨），经坦桑尼亚，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北行到摩洛哥，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转入欧洲各国。

3. 广州——日本航线。这条航线的走向是：从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向东行过东海、黄海，最后抵达日本的长崎港。

清代广州的海外交通又有了新的发展，计有以下航线运行：

1. 欧洲航线。据徐继畲《瀛环考略》卷四载：“欧罗巴诸国来粤东者，皆从大西洋开行，沿亚非利加之西岸，南行至尽头之岷阿稳易朴（现名好望角），及转而东北，舟行至此，风涛最恶……过此乃额手称庆。浮印度海东行，出苏门达腊、噶罗巴之间又东北向至粤东。计程约七万余里，俗称来三去五。盖由大西洋来中国，约三月程，回国则须五月程。”

这条航线的大致走向为：从欧洲西南部的里斯本或英国

伦敦启航，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其南端的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过苏门达腊岛西南部的海面，再北上经巽他海峡，直航广州。全程往返约8个月，即来时3个月，返回时5个月，是当时通往欧洲的主要航线。但也有船只绕道马六甲海峡，过新加坡海域，从越南海面来广州的。

2. 北美航线。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载货360吨，从纽约港出发，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巽他海峡，于同年8月23日抵达澳门，再溯珠江而上，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航程达13000多英里<sup>⑧</sup>。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也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

1800年，美国商人又开辟了美国至广州的太平洋航线。即从纽约港出发，沿南美洲海岸南下，绕过合恩角（在南美洲最南端），取道太平洋直达广州。因此，清朝时期中美之间开辟了两条航线。

3. 印度洋航线。广州与印度有海外交通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的。这条航线是：从印度南部港口启航，渡过印度洋进入马六甲海峡，再穿过新加坡海域，北上经越南而到广州。

4. 东南亚航线。古代称之为南洋航线，是我国商船主要的活动地区，一共有以下7条：

(1) 广州——越南航线。商船从广州启航后，由万山群岛出海，顺东北风约四、五日抵达越南会安的顺化。顺化为当时越南的王城。

(2) 广州——柬埔寨航线。当时柬埔寨被称为本底国。从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域，行约七日可到达柬埔寨。

(3) 广州——暹罗航线。暹罗即现在的泰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引用《外国史略》曰：“由中国进暹罗港，过七洲，见外罗山，向南则玳瑁洲、鸭洲、



昆仑、偏西则大真屿，西北为笔架山，向北至暹罗港竹屿。”竹屿为其进出口岸。船舶溯江而上，可抵达国都曼谷。

(4) 广州——马来半岛、新加坡航线。新加坡古称旧柔佛。从广州往马来半岛、新加坡的商船，“俱经外罗山南行，顺风约一日过烟筒大佛山，又日经龙奈口，过昆仑海，日余见昆仑山，至此然后分途而行：往宋卡、暹罗、大呢、咭兰丹各国，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由邦项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sup>⑨</sup>

这条航线还可以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马六甲、檳榔屿、吉德等地，即现在的马来半岛西岸的一些港口。

(5) 广州——爪哇航线。爪哇，古籍中又称噶喇叭。“海舶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洲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即现在的茶盘岛），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南行少西，经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上深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由地盆山又南行，约一日到网甲，经噶喇叭峡，出峡口，又南行过三洲洋，约三日到头次山，即噶喇叭边境也。”<sup>⑩</sup>

这条航线的走向为：从广州启航，经昆仑山、茶盘岛海域，然后进入爪哇海，到达噶喇叭。通过这条航线，不但中国与爪哇之间进行贸易往来，而且大批由中国到爪哇的华侨也是经此航线而去的。据《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爪哇条记载：“爪哇，其国一名莆家龙，中华乃诸番商船，輻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广州至爪哇航线是当时一条主要的海上航线。

(6) 广州——苏门答腊岛航线。广州与苏门达腊岛的通航，历史比较悠久，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清代，“闽广贩洋之

船，时往贸易。”<sup>①</sup>“船由广东往者，出万山后向东南行，经东沙过小吕宋，又南行即至禄海口。由咭在往则须向东南行，经细利洼入小港，转西北沿山行，经文莱，然后可至其国。”可见当时广州与苏门达腊岛之间的贸易来往是比较多的。

(7) 广州——婆罗洲航线。婆罗洲位于吕宋岛西南，古称渤泥，是一个大岛。据《海国闻见录》卷上《东南洋证》（清陈伦炯著）记载，当时的航线走向是：“从粤南之七洲洋，过昆仑、茶盘，向东而至朱葛礁喇（即婆罗洲西海岸），188更；马神亦从茶盘、噶喇叭而往，水程340更。”这就是说，船舶经昆仑、茶盘岛后，折而向东，便可到达婆罗洲的昆甸、马神等港口。

5. 大洋洲航线。中国同大洋洲通航的记载不多。在魏源编的《海国图志》中，引用《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其船只现赴广州府贸易矣。”从而判断出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大洋洲之间已经通航，但具体航线不太明了。

6. 俄罗斯至广州航线。清康熙帝时，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主要在北方边境，但俄国人并不以此满足。1803年，俄罗斯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作环球旅行，并于1805年冬抵达广州，要求同清政府进行贸易。但由于清王朝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俄罗斯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俄国人的目的没有达到。

这两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为：从俄国克隆斯达港启航，横越大西洋，绕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循西北方向航行，抵达夏威夷群岛，再越过太平洋到达广州，前后航行了约二年零五个月之久。

以上所述是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历代海外交通航线的大致情况。鸦片战争以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了。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逐渐超越广州而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口。但广州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对中国经济、海外交通和贸易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全世界所公认的。

### 注 释

- ① 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条
- ② 元朝脱脱撰：《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
- ③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条
- ④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故临国条
- ⑤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大食诸国条
- ⑥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条
- ⑦ 沙丁、杨典球：《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关系》，历史研究：4（1984）第4期
- ⑧ 吴玉成：《中国皇后号远航广州前后》，羊城今古：3（1990）
- ⑨ 谢清高：《海录》卷上
- ⑩ 谢清高：《海录》卷中，噶喇叭条
- ⑪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二

### 参 考 文 献

1. 邓端本编著. 广州港史（古代部分）.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2.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近代广州外贸研究. 广州：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1987
3. 蒋祖缘主编. 简明广东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4. 班固著.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5. 欧阳修撰.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第七下
6. 邓端本. 宋代广州市舶司. 岭南文史，1986年第1期
7. 黄启臣. 元代广州的对外贸易. 羊城今古，1990年第3期

（本文作者单位：广州图书馆）

# 义净对勃兴海上“丝绸之路”的 卓越贡献

钟永宁

## 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自 19 世纪末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用富有浪漫色彩的“丝绸之路”称道古老的陆上中西贸易通道以后，人们也把中西方的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位居我国大陆南端、毗邻南海的中心城市广州，自古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伴随着中国与西方交通贸易线路由陆路而海路的变化，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更是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唐代，我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而且唐中叶后经济重心南移。不仅周边列国称臣来朝，远隔关山和重洋之国，也纷纷来访，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中外交通的重心已由陆路转向海路。7 世纪、8 世纪，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兵燹不断，通阻无常，特别是强大的吐蕃控制陇右、河西后，商旅更受阻隔，中西方的交通仰赖于海路。而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为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南方大埠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厚实经济文化基础，成为当时中外海上交通的门户。广州“江

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船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位，种类极多”。<sup>①</sup>由于外国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不少留居广州，唐王朝遂将广州城西南濠东岸蕃船码头区划为它们的居住地，即所谓的“蕃坊区”。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首次在广州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使。至此，已有一条载诸史籍，从广州出发，蜿蜒至南海、西亚、东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即公元8世纪中叶的地理学家、唐德宗宰相贾耽所指出的“广州通海夷道”。贾耽述及的“广州通海夷道”，不仅把海路起点“定位”在广州，而且详述了所经港口、里程、方向、各段所需时间及沿途地理风情。<sup>②</sup>因此，至唐代，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充分反映出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地位的崛起和勃兴。

## 二、义净其人及其西行

在中外交通、特别是海洋交通的开辟上，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西汉末，佛教就通过中亚古道传入中国，东汉桓、灵时代，渐渐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僧人往来如织，但中土僧人走西天求法者，大都遵陆路。至唐代，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臻频繁。中国高僧“咸思圣迹”，赴印度求法者激增，但与前迥然有异的是，泛海求法者居多。自唐初至中叶，共有56个僧人到印度等国求法，其中即有34人是取道海路的。<sup>③</sup>它们远涉惊波骇浪，备极艰难险阻，不啻促进了文化交流，而且其前驱辟路，为中外海上交通特别是南海交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中最卓越

者莫过于义净。

义净（635—713年），俗姓张，字文明，范阳（今北京西南）人（亦说山东历城人）。垂髫之年，即洗剃为僧，从此即长伴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研习佛法，以至能“内外闲习、今古博通”。<sup>④</sup>他志趣高远，15岁时，即萌生西行佛国、寻幽访圣、参佛取经之念，不过至37岁时，才实现宏愿。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初秋，对佛国心仪已久的义净随冯孝铨到广州，“与波斯船主期会南行”，<sup>⑤</sup>当时有数十位僧友也准备联袂同往，但登船时，都临危退缩了，只有义净“奋励孤行”。11月船离广州，义净正式踏上了西天求法之旅。南海波涛汹涌，义净喟叹：“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河，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颠簸20日后，船抵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佛逝，全称为室利佛逝。他在这里停留半年，学习声明学，即佛学的语言文字。后得到佛逝国王资助，至佛逝之属国末罗瑜国（在今马来半岛的南端），稽延两月之后，续乘船北航15天，抵羯荼国（现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咸亨三年（672年）12月，乘王船西进，十余日后，至裸人国（即今孟尼拉湾的尼科巴岛）。岛上椰子、槟榔树，森然密布。再往西北航行半个月，到达东印度的东部港口耽摩立底，即《佛国记》中的多摩梨帝国，时为咸亨四年（673年）2月。这样义净自广州扬帆启程至印度，越16个月，除了在佛逝、末罗瑜停居8个月，实际在海上航行约8个月。

在耽摩立底，义净邂逅著名高僧大乘灯，与其一道学习梵语。一年后，同道去中天竺。因途多高山大泽，盗匪出没，旅客大都结伴而行。义净途中染上疾病，“求进五里，终须百息”。一人落在后面，艰难跋涉。傍晚，果遇盗匪，连裹身之服，也被席卷而去，只得折树枝遮体，浑身涂泥。这样如野

人般狼狈地行走几日后，才到达中天竺的摩揭陀国。在这里，义净“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祇林并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回到那烂陀寺后，义净即蛰居10年，即上元二年（675年）至光宅元年（684年），抄录和研译佛经。

因眷念故国，武后垂拱元年（685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南返耽摩立底，准备归国，不料途中又遭洗劫，仅存一命。至耽摩立底后，即循着去时线路，鼓舶东行，经羯荼而至佛逝。到佛逝国后，即一面翻译整理佛经，一面撰写旅途见闻文字。至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才舶回广州，至此，他才结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漂泊生涯，完成往返于广州至印度的海上航行。

### 三、义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贡献

义净遵海路求法，虽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但终能满载而归，终老故里，这在当时，是一项空前的盛举，是其先驱者和同代人无法企及的。泛舟重洋，波险浪恶，决无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义净曾深有感触地指出，“胜途多难……致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常愍至末罗瑜国后，因船沉没而葬身鱼腹；智岸至马来半岛的郎加戎，因染时疫而飘魂异域；义朗至狮子国后，不知所终；会宁从诃陵西向后，就杳无音讯；大津至佛逝，即回棹归国；明远、道琳、智弘、无行、大乘灯，虽侥幸抵达“西天乐土”，但终不能回归故园，客死他乡。<sup>⑥</sup>中国四大佛教译经家都曾到过印度：东晋法显，陆去海回，回程中，在南海骤遇暴风，不能径从广州登陆，在茫茫大海中飘摇数月后，才在山东崂山县的海岸登陆，唐代玄奘陆去陆回；慧超海去陆回；惟有义净是海去海回，且两

度纵穿南海。

唐初义净从广州西行印度，比唐后期贾耽提出“广州通海夷道”早了近一个世纪。贾耽生于730年，死于780年，字敦时，沧州南皮人（现今河北省），曾任节度使，鸿胪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穷观研考，垂三十年”。<sup>⑤</sup>因而他指出包括“广州通海夷道”在内的“四夷之路”，至早在8世纪中叶。他所总结的7条中外交通线路，来源于调查访问。他利用朝中掌职和外任节度使之便，搜罗资料、信息，“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闾阖之行贾，戎貊之之遗志，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从边川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sup>⑥</sup>而早于他一个世纪的义净，却是身体力行。他关于自己航海西行的记述，虽航线不及“广州通海夷道”长，但比后者更为翔实、丰富。

义净从印度东归途中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记录了所经线路及其时间，所经诸国及其地理、风情，后书还分述了30多位西行高僧至南洋或印度的航海情形，其中尤以他本人及道琳、无行等人的行程最为详细。这对指引远涉重洋的后继者，为研究古代南海、印度洋的海洋交通和印度、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书中，下举之类的记录比比皆是：

“驩州正南步行可半月余，若乘船才五六潮，即到比景。南至占波，即是临邑，……西南一月到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sup>⑦</sup>

“然南海诸洲有十余国……从西数之，有婆罗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河信洲，河陵洲，坦坦洲，盆盆洲，婆罗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



有小洲，不能具录”。<sup>⑩</sup>

义净还将所历国家的一些见闻荟萃书中，如在前文已提到的裸人国，只盛产椰子、槟榔，不产稻谷，缺少铁、金、银，土人纷纷用自产的椰子、槟榔，向途经此地的商旅交换金、银、铁和粮食。意大利人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和阿拉伯人写的《苏烈漫游记》也有近似的记载，但是它们在13世纪以后才问世。依此亦可蠡测义净著述的史料价值了。正基于此，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法国汉学家沙边碗在19世纪末即把《南海寄归内法传》译为日文和法文。

此外，义净杖锡南溟，舍身求法的精神和“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命短，何得满长祗”的西行壮志，也激励着后人。如还在义净第二次由广州至佛逝时，就有贞固、道宏、怀业、法朗西位岭南僧人踊跃随行。

#### 注 释

- ① 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
- ② 《新唐书》卷三十四，“地理七”下
- ③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 ④ 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一，《唐京兆大存福寺义净传》
- ⑤ 义净西行经历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本人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部分取自赞宁：《宋高僧传》，不再一一注明
- ⑥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 ⑦⑧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
- ⑨⑩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

（本文作者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 光塔—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丰碑

杨 棠

怀圣寺光塔，屹立于珠江古航道北岸，“白云之麓，坡山之隈……世传自李唐迄今。”<sup>①</sup>系古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之一。它形象地反映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奇伟风貌，生动地刻划过“番禺海獠杂居……故处”<sup>②</sup>的杰观景象，因而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千百年来，不断传颂着中国与大食、波斯等国人民的友谊，是中外友好关系的见证。

光塔原名“番塔”，“其制则西域”<sup>③</sup>属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宋元之际一度称为“怀圣塔”，岳珂的《程史》则称“宰塔坡”。清代以后普遍被“广人呼为光塔”<sup>④</sup>者。

“番塔”之称，因“唐时番人所建”<sup>⑤</sup>而得名。“曰怀圣塔”<sup>⑥</sup>乃怀念伊斯兰教至圣穆默德之意。“广人呼为光塔”，出于两种原因：一为阿拉伯语“麦那尔”之译意。“麦那尔”一词是从阿语“那尔”（光亮）的词根派生出来的，原意为“光亮之塔”，故简称“光塔”；二为波斯语“邦克”（宣礼）之译音，粤语邦克之“邦”与“光”为谐音。故有“广人呼为光塔”是也。

从光塔的建筑形式到塔名的称谓，都说明光塔与番人或海獠的关系密切，即与阿拉伯和波斯的友好关系是分不开的，因而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缺的参考素材。

至于光塔的历史作用，更与广州的海外交通息息相关。光塔的多种功能，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番人和海船作过不

少的贡献。

首先，它是怀圣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番人作“宣礼”的宗教活动场所之一。相当于我国道教宫观的钟鼓楼，故伊斯兰教教徒曾称之为“邦克塔”。据《南海百咏》记载：

“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每当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

“叫佛号”和“呼号”，同为高呼“邦克”宣礼的意思，都是伊斯兰教徒的一种宗教礼仪。光塔该是唐宋时期作为宗教场所是无疑了。

其次，光塔又系怀念贵圣的纪念塔。清人樊昆吾说：“回教之祖名贵圣穆罕默德，彼教之人称为‘贵圣’……。寺内现有元时郭嘉碑文，其赞云：‘寺曰怀圣，西教之宗’故明所指为贵圣矣。”足见它有纪念塔性质，以怀念番人的“回教之祖”，故又名“怀圣塔”。

第三，作海上瞭望台。这与海上交通更为密切，“望海须登最高层……寺有番塔，高十六丈有奇……唐时回人之望海表也。”<sup>②</sup>站在塔上，高瞻远瞩，珠江帆影，历历在目，这是作为海上瞭望台的雄辩证明。

第四，气象观测站。据《程史》记载：“……后有窳堵坡，高入云表，式度不比他塔……绝顶有金鸡甚钜，以代相轮。”《南海百咏续编》也说：“塔顶有金鸡，随风南北，以验飓风消息。”可见塔顶之金鸡，是个信风仪，有为海上航行观测风云气象信息之作用。

第五，导航灯塔。光塔从宋代就有“昼则悬旗，夜则举火”的记载。灯塔是导航的重要设施，正如《南海百咏续编》指出的“夜则燃火，以导归帆。”这是直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番船服务的证据。

研究光塔的建筑史及其作用，不但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有所帮助，且对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科学实验，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光塔的建造，从选址设点到备料施工，虽是“番人所建”，但也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就地取材的，且“塔有中国旧传亭之华表的性格”<sup>⑧</sup>。堪称是我国“引进技术”与“就地取材”相结合的先例。

选址于坡山古渡之近邻、海獠杂居之故处，乃是当时当地最佳的选择，“中海外内，宰堵表雄……商舶是脉，南北其风”<sup>⑨</sup>，“式度不比他塔”，是为番人匠心独具的设计，技术先进，选料上乘，就地取材，中西结合，也是显而易见的。已故熊振宗阿訇在《怀圣寺与光塔在文化上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留至今仍有文献价值的光塔在广州值得我们钦佩，广州濒海，海边多产蚌螺，宛氏就地取材，搜集蚌壳和螺壳，经过一番研究工夫，加以糯米质，渗得调和，做成筑塔原料……此项原料的发明，给中国建筑工程一大贡献。”

熊阿訇还指出：“如此伟大的建筑物，高入云端，且没有避雷针的设备，千余年来，饱经风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原来宛氏利用自然，防避雷伤，将塔建筑在水眼上，这也是建筑学上一大发明。”

考古学家龙庆忠教授最近实地考察，他认为光塔的建筑形式、砖的制法和灰浆之配料，都属大夏文化，但又保持唐风遗影，大夏文化是从西域传入的，它不重装饰，没有花纹，以灰色为主，海边不宜多彩，免受酸雨浸蚀而退色。<sup>⑩</sup>

龙教授曾指出：“光塔不仅制则西域，而且有古台、古表台之遗影，真不愧为东夏杰作。”

据元碑记载，唐宋时期番人在我国曾“制塔三”，到元至

正年间仅存“此其一尔”，故保留下来的这一历史文化遗存，便成了珍贵的重点文物。它原有的某些功能，如因珠江航道南移而失去其导航作用，又因近代发明扩音器而无需登绝顶呼号等等，这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它新的任务：一是当活标本，为海外交往的历史作见证；二是当活景点，供对外开放旅游作景观光，为提高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作新的贡献。

有关光塔的研究题材，是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以来，曾有不少中外专家学者亲临这里考察，数以万计的国际友人到此观光。因此，光塔无愧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它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活标本，让我们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去发展新的友谊吧！

#### 注 释

①③⑨ 见怀圣寺内元至正十年，《重建怀圣塔寺之记》碑文

② 见〔宋〕岳珂：《桯史》卷十二

④ 见〔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十九

⑤ ⑥见〔宋〕方信孺撰：《南海百咏》

⑦ 见〔清〕樊昆吾撰：《南海百咏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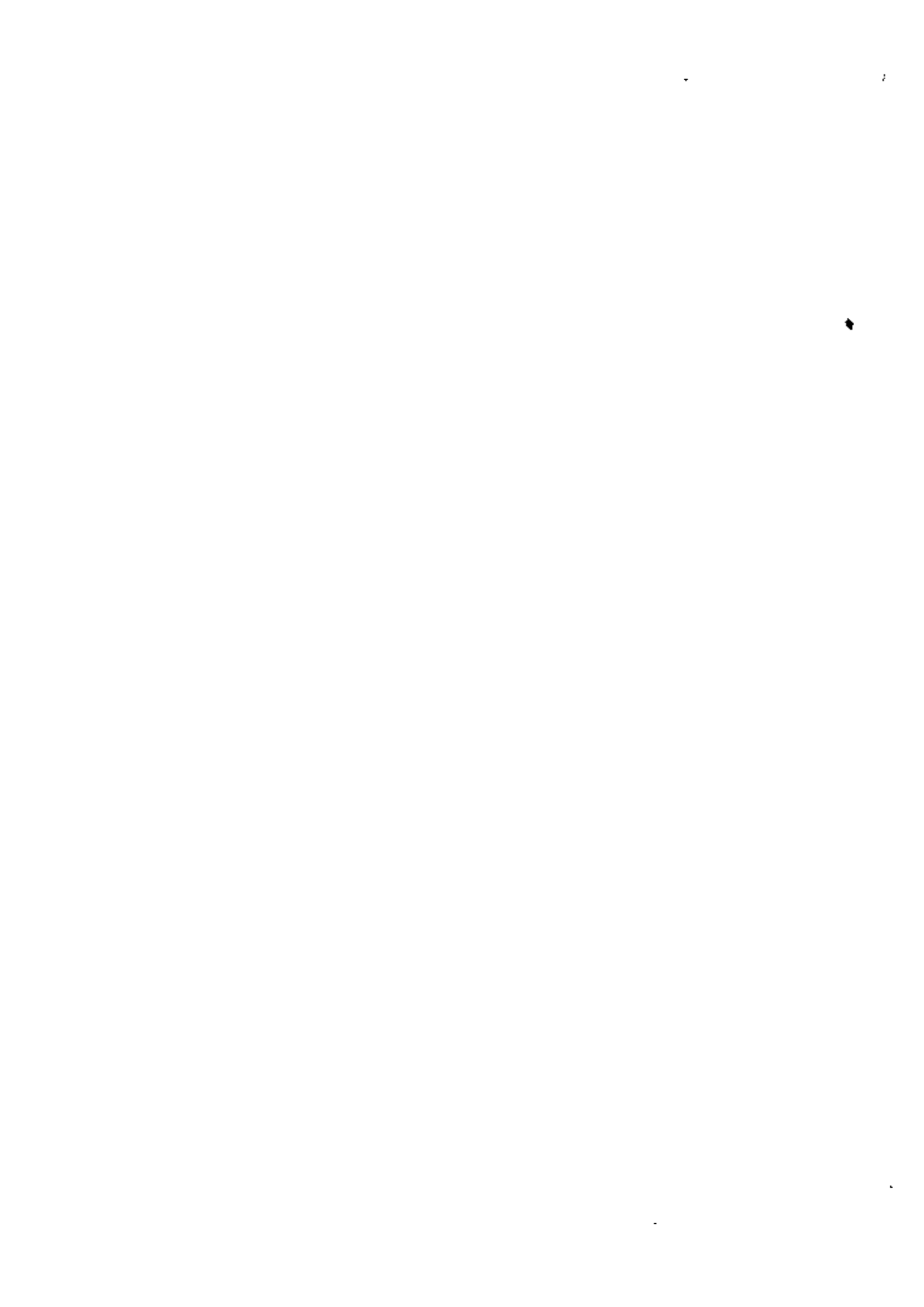
⑧ 见龙非了教授，《唐建广州怀圣光塔寺建筑文化考》

⑩ 摘录龙庆忠教授 1988 年 5 月 19 日考察光塔时之谈话纪要

（本文作者是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 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





#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袁钟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在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在经济交流上，通过这条海路，中国输出的丝绸、陶瓷、茶叶、纸张和各种日用品，不仅丰富了沿线各地人民的生活，活跃了沿线各地的市场贸易，也有助于中国农副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在输入国外商品时，还引进了世界各地的粮食、蔬菜、水果、药材、花卉及其它经济作物品种，因而国内农业、园艺业、药物业和某些轻工业原料的生产得以扩展。在文化交流上，通过这条海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及其它发明传往各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还对海外产生有益的影响；中国则传入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哲学、文学、医药、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广州是中国南方大港，因而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巨大作用。

## 一

广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上具有悠久历史。这从考古发掘与中外史籍记载两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广州便和沿海地区有航运往来，成为比较重要的港口。秦汉时期，广州（当时称为番禺）造船业颇具规模。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发现秦汉之际的造船工场遗址，有 3 个平行并列的造船台，从 1 号船台枕木取样所作碳 14 测定，提供的年代范围距今 2190±90 年（公元前 240±90 年），“这里可以建造宽 6~8 米，长 20~30 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1、2 号船台间距 3.65 米，若併台造船，则可能生产出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sup>①</sup>须知，1784 年从美国远渡重洋前来广州的商船，由波士顿启碇的单桅帆船“哈里特号”仅 55 吨，其后由克利夫兰启碇的则在 50 吨以下。因此，某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在 8 世纪以前尚无自己的海船<sup>②</sup>，此说不能成立。而且当时中国已掌握天文航海技术，班固《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慧虹杂占》等书 136 卷，这就证明当时广州人民在造船、航海方面都具备出海远航的条件，为海上丝绸贸易奠定了基础。

关于南方海上的航线，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今越南中部）障塞、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合浦（在今广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 20 余日，有谶离国（今缅甸悉利）。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南部康契普腊姆），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公元前 140~87 年）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禀

食为偶；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公元1~5年）中，王莽摄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新加坡之西的皮散岛）；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中部广南省维川县南茶桥）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在今锡兰岛），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上述航线为什么没有提及番禺（广州），应该看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璠、瑁、果布之凑。”班固《汉书·地理志》也说：“处近海，多犀、象、璠、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指中原地区）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这就具体说明当时广州是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埠，成为进出口货物的聚散地。日南障塞（障塞是边防营垒）、徐闻（雷州半岛最南端，为海防要地）、合浦（当时设有关亭，王莽时称“桓亭”），因设有障塞、关亭，可见是海防前哨，同时也为来往海船补充淡水、粮食和货物之处，乃离开国境的计程起点。中国使者携带黄金和各种丝绸乘船前往印度南部，主要应从全国有数的“都会”番禺（广州）出发。回程时来到“日南象林界”，这明确是指进入中国国界、象林并非回程的终点，主要的终点仍应是番禺（广州），所以番禺（广州）有那么多舶货出售，充分显示出国际贸易市场的特色。

当时从广州运出的丝绸，以印度南部为中转站，再经安息（今伊朗）、罗马帝国商船运往南阿拉伯、埃及，通过红海至尼罗河之间的运河，到达亚历山大里亚，由此越过地中海而在欧洲各地市场销售。中国丝绸的最大买主是罗马帝国。到了公元50年，罗马水手希帕努斯发现了印度洋上的信风规

律，这不仅缩短航程，还打破了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因而大批罗马船队从埃及的红海港口伯伦尼卡或迈奥霍穆扬帆直驶印度南部。这就出现了联系亚、非两大洲的船线，大大有助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此，德国学者夏德认为：“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为海上贸易要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很大发展。据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说：当时已能制造“大者长二十余丈（当时1丈约合2.4米），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1万斛合5百吨）”的大型海船，船上有4帆至7帆。“特别是出现了能使前侧风的平衡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在船舶推进中，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sup>⑥</sup>因而中国海船能够经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进入红海，来到阿杜利港（在今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附近）。南朝时，中国商船经常驶往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在阿拉伯古国希拉王国的国都希拉城（距离古巴比伦废墟约3公里）附近停泊，进行贸易。

唐德宗时，宰相贾耽（730~805年）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此书虽已失传，但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地理志》转载了其中“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九龙半岛西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洲石（今海南岛东北角附近），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岛东南方独珠山）。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归

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芽庄之间）。又一日行，至古笄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今新加坡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柔佛），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在今苏门答腊岛）。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河陵国（在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两者兼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今伯劳威斯群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筒罗国（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筒罗西则哥谷罗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部）。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苏门答腊岛棉兰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又六日行，至婆国伽兰洲（今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今锡兰岛）。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南印度）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西南部奎隆），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今印度西部）。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国（今印度纳巴达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颯国（今巴基斯坦国都卡拉奇附近），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即印度河），自北渤崑国（约在今印度伯尔蒂斯坦）来，西流至提颯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颯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乃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之弗利刺河（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拆流，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今非洲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谟磨难国（今巴林）。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同样来到巴士拉、巴格达。

上述由广州至东非三兰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在这条主线上，还有支线通往各地，如：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卑谬一带）、迦摩浪迦（今马来半岛北部，或缅甸勃固附近）、堕罗钵底（今泰国佛统附近）、盘盘（今泰国万伦湾沿岸一带）、狼牙修（今泰国北大年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婆利（今巴厘岛）、耽摩立底（今印度加尔各答附近）、那伽钵亶那（今印度东南部）等，都通过这条航线和中国交往。

宋元时期，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十分兴旺。由于中国海船体积大，构造坚固，性能优越，设置水密舱壁和披水板，抗风浪能力强，压载技术完善，并使用指南针导航，因而很多外国商人欢喜乘坐中国商船前来广州。据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当时广州海船可载重数万斛，还说：“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猪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忧。”在长途海行中，可以经常设酒宴客，实为一大乐事。著名旅行家非洲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印度前来中国，他在《异域奇游胜览》（又名《伊本·白图泰游记》）说：广州建造的“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

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射手和持盾战士及发射石油弹战士，随从每一大船有小船三艘，半大者，三分之一大者，四分之一大者。……这种船桨大如桅杆，一桨旁聚集十至十五人，站着划船。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内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有时旅客在官舱内，不知同舟者为何许人，直至抵达某地相见时为止。水手们则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可见当时中国海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国际航业的发展，哥伦布于1492年（明朝弘治五年）发现新大陆，出现了欧美航线。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驾驶欧洲式船只来到广州，这就出现了广州至欧洲的航线。其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广州府香山县蠔镜澳（即澳门），据此作为对华贸易基地；西班牙人于1571年（明穆宗隆庆五年）侵占吕宋岛马尼拉，因而出现广州至美洲的两条航线：一是葡萄牙殖民者的航线，即由广州府澳门经印度果河前往葡萄牙国都里斯本，越过大西洋，来到南美洲巴西，这是印度洋上“香料之路”的延长；一是西班牙殖民者的航线，即“大商帆船贸易”航线，由西班牙的塞维尔前往北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越过太平洋，来到吕宋岛马尼拉，再转往中国闽、粤口岸。这些航线虽然不再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广州出口的丝绸已享誉全球。

## 二

广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各

种因素形成的。

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途径，主要靠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1912年间陆续出版了三大卷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首先把中国古代西北对外贸易的陆路称为“丝绸之路”。接着，德国学者赫尔曼于1910年出版了《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一书，从此“丝绸之路”这个富有诗意的名词便广泛流传。与此相对应，人们很自然地把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海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明确指出：海是“丝绸之路”优于陆上“丝绸之路”。这原因是：①中国西北陆路对外联系，要经过许多民族、国家，其中一个地区发生变乱或进行垄断，就影响全线畅通；南方海路则不如是。②中国主要外销货物，如丝绸、陶瓷、茶叶以及农副产品、日用工艺品等，多产自东南地区，由西北陆路输出国外，途程遥远；南方海路则较便捷。③中国西北陆路对外贸易，要越过高山大漠，不仅行旅艰辛，而且商品运输易于破碎损耗，费用较高；南方海路运输虽有风波之险，但费用较廉。④太平洋、印度洋上的众多岛国和美洲大陆，古代只有通过海路才能来往。

中国海岸线绵长，有不少对外通航的港口，但只有广州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市场繁荣，经历两千多年而从不衰落，这四者俱存，是沿海其它港口无法与之比拟的。中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库达特拔根据阿拉伯邮驿档案，约于846年编成、885年修订的地理名著《道里郡国志》，其中说：从占婆（今越南中部）向西北航行，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港口是龙编，以后依次是广州、泉州、扬州。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之东、天德江北岸，此城在宋朝时已废圮。泉州在南宋后期至元朝曾一度是世界名港，后因晋江带来大量泥沙，港



口淤浅，明末清初已渐衰落，为此，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立粤、闽、浙、江4个海关负责对外贸易时，闽海关设在福建漳州而不是泉州。扬州在唐朝是中国最大港口，有“扬州一益（成都）二”之称，因位于南北交通要冲，其后屡经兵燹，加以大运河淤塞，贸易迥非昔比。广州港由于是不冻少淤良港，面临太平洋，邻近东南亚，通向五大洲，所以它的对外贸易一向活跃。

广州对外贸易活跃，是由于它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都有其优越性：①它位于西江、北江、东江的汇合点附近，腹地深广，溯西江而上，可通往桂、黔、滇地区；溯北江而上，越过大庾岭进入赣江，或越过骑田岭进入湘江，转入长江、大运河、黄河，可通往华中、西南、西北、华东、华北等广大地区；溯东江而上，可通往赣南地区；并可从海路通往沿海各港口及世界各地。秦朝开凿灵渠；汉朝开辟零陵（今湘桂走廊）、桂阳（今骑田岭道）峽道，并多次疏浚武水；唐朝拓建大庾岭路；宋朝修筑北江浈阳峡栈道，并维修大庾岭路；明朝也多次维修大庾岭路及整治浈阳峡栈道，这就更便利了广州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因而全国货物均可在广州集散，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充足货源。②它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农、林、渔产品丰富；手工业品制作精巧，被誉为“广货”，畅销海外；尤其是造船业实力雄厚，有助于在海上“丝绸之路”施展鸿图。③它位于南疆边陲地区，距离中原较远，中国历史上发生大规模战乱时，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居民流离失所，广州则保持相对安定，所以广州西郊出土的晋砖中，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文句。即使在改朝换代时，在广州地区也较少发生大规模激烈战斗，因而局面长期安定，

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开展。④它有热情好客、礼遇外商、与外侨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从汉朝开始，就不断有外商前来广州，有的还长期定居。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下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的奏章说：“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船长）、作头（工头）、梢工（舵手）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因而外商外侨乐于前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广州对外友好之路。⑤它富于开拓进取精神，从汉朝开始，广州人就不断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明清时期更是大批前往海外各地落户，这就加强了广州的对外联系，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亲朋互访之路。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地位，还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国际方面，东西方的交往与广州的发展密切相关。秦汉时期，中国处于空前统一的局面，尤其是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商业随之兴盛。与此同时，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正在崛起，工商业发达。这东西两大帝国都积极开展对外政治联系和经济交往，但陆路有时遭到匈奴、安息人的干扰，例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遣甘英从西北陆路访问罗马帝国，在波斯湾就受到安息人的阻挠，无法前往。南方海道却提供了方便，例如，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帝国的使者便从海道来到了中国。中外贸易使广州成为全国有数的繁荣“都会”。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广州僻处一隅，战火较少波及，大批移民不断南下，推动南方经济的发展。在

这期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于 395 年（东晋武孝帝太元二十年）去世，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因而中国与罗马帝国的陆路贸易暂时中断，这就促进海路贸易的发展，广州成为华南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所以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萧子显《南齐书·东南夷列传》也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初积王府。”隋朝统一全国，唐朝称雄亚洲，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这东西两大帝国都在发展海上贸易，因而广州成为国际著名的港口。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在今锡兰岛），大石国（即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今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混战局面，虽然统一全国，但西夏占有黄河河套与河西走廊，控制了北宋前往中亚地区的通道。与此同时，东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也妨碍了东西方的陆路贸易，因此中国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朱彧《萍洲可谈》说：“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今宁波）、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1102 年），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州）最盛。”南宋后期至元朝，福建泉州港逐渐兴起，但广州港仍然繁荣，宋末元初的陈大震著《南海志》说：“广（州）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不可名殫，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

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山人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到了明朝，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今泰国）、西洋诸国。”西洋诸国是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东北非等沿海地区。这个规定要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使者、商人按指定港口前来中国，广州是接待外国使者、商人最多的港口。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2~1567年），因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政府实行海禁，据张廷玉等撰《明史·职官志》载：“给事中夏言奏，倭祸始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因而广州成为中国南方对外交往的唯一港口。清朝初年，因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清世祖顺治十八至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61~1685年）实行海禁，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但广州府香山县蠔镜澳（即澳门）有大量葡萄牙人居留，不便内迁，所以广州通过澳门仍然维持海外贸易。康熙二十五年，政府在江苏云台山、浙江宁波（后改定海）、福建漳州、广东广州等4个港口设立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骚扰，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决定除广州外，其它港口停止开放，从此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时止。可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是与国际交往紧密联系的。

国内方面，广州的对外开贸易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汉朝时候，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宦官（即隶属于少府的黄门）去海外贩卖丝绸，采购珍宝；这时民间贸易活跃，获得高额利润。两晋南朝时，外贸由地方政府管理。到了唐朝，中央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由岭南

节度使兼任，并以宦官充任市舶官员，负责外贸事务。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起义军占领广州，宰相于琮认为这会引来国家财政困难，可见当时广州外贸收入甚巨。五代时，刘岩割据岭南，建立南汉国，广州对外贸易成为这个封建割据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给发运使薛向的手诏：“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指吴越国主钱氏）、刘（指南汉国主刘氏）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指中原地区政权）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便是明证。宋朝统一全国，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首先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朝廷对广州外贸官员的任用，十分慎重，按功过予以奖惩。对于在广州推动中外贸易作出贡献的外商还授予官衔，例如，宋哲宗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辛押陋罗被封为归德将军。宋高宗于绍兴七年（1137年）闰十月三日要广州知州连南夫陈述外贸中的存在问题，以便改进工作。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由于三佛齐（在今苏门答腊岛）国王来信投诉在广州出售乳香蒙受亏损，宋高宗于绍兴十六年（1146年）九月二十五日给有关官员降职一级的处分，并再次郑重提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明朝时候，据《明史·外国传》说：“初，广东文武官员月俸多以番货代。”这番货就是广东市舶提举司从进口商品中征收的实物税。又说：广东“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分私皆窘。今许佛朗机（即葡萄牙）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即实物税）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

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朝廷终于采纳了林富的意见。清圣祖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立海关时，认为对外通商的好处是：“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之劳”，而且又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可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国内经济需要密切相关。

### 三

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在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 (一) 经济交流方面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是国际史学界瞩目的贸易。长期以来，广州运出的丝绸、陶瓷以及种类繁多的商品，对这条海路沿线各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市场的繁荣均产生重大影响。

古代中国丝绸在东南亚各地均有出售。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从广州乘船往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南端)，一次带去的丝绸就有5000匹之多。在南亚，印度南部曾以中国丝绸作为婚嫁的礼物，其后因而建立了自己著名的丝绸业。在中亚和西亚，中国丝绸曾经成为最受信任的通货，可充作军饷和支付手段，还成为高级馈赠品。在非洲，古埃及人用中国生丝加工成丝织品，或把中国丝绸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因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不

仅是重要的丝货贸易中心，并且逐渐成为丝织业中心。在欧洲，罗马帝国是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男女贵族都争穿中国丝绸，以至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不胜惊叹：“丝至罗马，价等黄金，然用之者众，故金银乃如水东流。”罗马帝国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说：为了购买丝绸，“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即中国）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亿赛斯太斯，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一亿赛斯太斯有人折算合 10 万盎司黄金，也有人折算合 85 万英镑，可见其购买丝绸之多。到四世纪时，罗马帝国历史学家马赛里努斯宣称：“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著丝绸，现在则各阶层人民都普遍服用，连搬运夫和公差都不例外。”这就使罗马帝国建立了自己的丝织业。应该说明，古代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中国丝绸，除了一部分是从西北陆路运去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从西南地区运去的，如蜀锦是通过现今缅甸、印度、越南等地输出，并非全由广州出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获利甚大，中外史籍均有记载，范曄《后汉书·大秦国传》说：大秦（罗马帝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房玄龄等撰《晋书·大秦国传》则说：“安息、天竺人与之（指大秦）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如此高额的利润，促使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旺，因而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罗马帝国每年有 120 艘商船从埃及的迈奥霍穆港前往印度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同亚洲远邦商人贸易。这一来，中国丝绸的大量出口，必然推动国内丝绸的生产。广州在汉朝就已发展蚕桑业，出现了“高则桑土，下则沃衍”的景象<sup>④</sup>。珠江三角洲与太湖平原、四川盆地并列为中国三大蚕桑区，广绣与湘绣、苏绣、蜀绣为中国四大名绣，至今在国际市场仍十分畅销。明

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广州出产的丝绸，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不少光彩。

在这条古代海路的繁忙货运中，除丝绸之外，陶瓷占很大比重，中国陶瓷不仅畅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东北非，而且在欧洲极受欢迎，以致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誉为“陶瓷之路”，并于1968年出版《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一书，介绍自己亲身考察的收获。他在埃及开罗附近的历史名城福斯塔特遗址参观两座仓库，其中堆积如山的陶瓷碎片约有六七十万件之多。可见国外对陶瓷器需要量之大，这就促过各地建立自己的制瓷业。沿着这条海路各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有不少是广东的青瓷、白瓷。从唐朝开始，广州是中国最大的瓷器输出港，这就有利于广州地区陶瓷业的发展。本来，广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生产陶器；汉代广州陶瓷质地坚硬，纹式繁杂，产品多样，并开始外销；两晋南朝时，能烧制色泽晶莹的青釉陶器和青瓷器；唐朝时采用“馒头窑”烧制瓷器，窑温可高达1300摄氏度；五代时出现绘彩陶瓷器；北宋时采用龙窑和阶级窑烧瓷，规模很大，广州西村窑的产品，釉色有青、绿、黑、酱、褐黄等种，造型丰富多采，实用美观，与南北各地名窑如越州窑、磁州窑、耀州窑等产品的风格相似，这大概是国内各地瓷器通过广州外销，广州工匠善于从中吸取经验之故。元朝时，广州的制瓷业相当发达。伊本·白图泰《异域奇游胜览》说，广州“出产瓷器，……是一大城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到了明朝又有



新的发展，其中石湾窑大规模仿烧南北各地名窑瓷器，以仿钧器最多，器形和釉色都很逼真。清朝的“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更是驰誉海外。广州陶瓷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增加了内容。

从广州由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货物，还有茶叶、漆器、纸张、麻布、棉布、蔗糖、粮食、酒类、药材、染料、金属品、工艺品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日用品。它供应了国外人民的需要，所以沿线各个港口的市场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而且，由于贸易的原因，大量中国铜钱由广州等地流入东南亚和东非沿海地区，这对当地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起了某种催化，促进的作用。

与此同时，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州进口了各种商品，除了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琥珀、珊瑚、翠羽、宝石、琉璃器等奢侈品外，还有各种香料、药材、木材、布匹、皮革、杂物等。古代广州对进出口货物没有留下详细记录，现据《宋会要辑稿》载：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十七日户部通知广州等市舶司，进口货物有的应运往京城（今杭州市），有的可在当地变卖，共计约近400种之多，可见当年贸易之盛！值得重视的是，广州从国外引进了粮食品种，如占稻、玉米、番薯、马铃薯等；蔬菜品种，如生菜、菠菜、蕹菜、辣椒、番茄、洋葱、椰菜、荷兰豆、芥兰头（球茎甘蓝）、椰菜花、西洋菜、君达菜、南瓜、苦瓜等；水果品种，如木瓜、番木瓜、番石榴、杨桃、菠萝、菠萝蜜、无花果、椰枣、油橄榄等；药材品种，如诃子、郁金、芦荟、阿魏、白豆蔻、龙脑树等数十种之多；花卉品种，如茉莉、素馨、水仙、指甲花、昙花等；经济作物品种，如棉花、花生、甘蔗、胡椒、番麻、刺桐、烟草等。上述品种

的引进，使中国的作物园地异彩缤纷，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二）文化交流方面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使广州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因为在这条航线上，政府使者的互相访问，贸易团体的彼此往来，宗教信徒的传道取经，人民群众到对方定居谋生，这种种活动，都是广州对外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

东南亚与广州隔海相望，汉朝已有中国人前往定居。考古工作者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等地的墓葬中发现汉朝陶器和五铢钱。在加里曼丹岛出土的一件印圆圈纹陶甗，与广州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同类器皿极为相相似，便是明证。三国时，吴国广州刺史吕岱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访问东南亚等地，曾向扶南国王范寻表示，男子裸体很不雅观，于是范寻下令国内男子穿“横幅”（类似“纱笼”），这就发展了当地服饰文化。据史籍记载，自吴国至南朝，林邑来使 20 多次，扶南来使 30 多次，因而传去了中国的养蚕制丝、酿酒造纸技术。由广州输出的陶瓷，不仅是东南亚人民的日用品，在泰国最偏东地区，城门上曾镶嵌中国陶瓷碗钵作为装饰物；在婆罗洲沙撈越，曾用中国瓷碗镶嵌在墓标上，令人瞩目。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前，东南亚使者经常前来中国访问，很多是先到广州。大批华侨在东南亚落户，对当地各项建设均作出卓越贡献，因而中国文化在东南亚有很大影响。

印度北部邻近中国，有陆路相通，南部海路可达广州。因而中国的织绸、炼钢、造纸、制漆等技术以及梨、杏等植物品种传入印度。广州海船在西汉时已来到印度南部，其后前

往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均在印度南部、西南部停留，所以至今印度西南部柯钦一带渔民仍称网为中国网，并认为当地一些建筑物的形式是从中国传去的。

阿拉伯人早就活跃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朝时来到广州，他们非常爱好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曾说过：“求学问尤当去中国。”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于762年迁都巴格达时，第二代哈里发（政教合一的国家元首）曼苏尔认为其好处之一是：“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当时巴格达为世界商业中心之一，与广州有贸易来往，设置专销丝绸、瓷器的“中国市场”。这促使阿拉伯建立自己的丝织、制瓷业。中国绘画艺术还推动了阿拉伯金银器皿、陶瓷制品在图案设计上的改进。中国重要医书和切脉术传入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阿拉伯医学是现代欧洲医学的基础。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后，成为欧洲近代化学的先驱。而中国魏晋的炼丹术，是由葛洪在广州地区撰写《抱朴子》时进行总结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由于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以致穆斯林学者撒阿利比在《珍闻谐趣之书》说：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siniya）。”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李彦升考中进士而知名于世。宋神宗时，阿拉伯人在广州州学学习，其后勿巡国（在今阿曼苏哈尔港）使者请求广州州学另设校舍，招收外侨子弟。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广州设立“蕃学”，这进一步有利于广州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

在非洲，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30年），位

于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有的学者认为即《汉书·西域传》所说的“犁靬”），成为地中海与东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埃及克列奥帕拉特女王（公元前51~30年）所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织成的。公元前30年，埃及为罗马帝国所并吞，罗马商人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南部与广州有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约在公元初年，中国金属器皿及制作技术已传入非洲，位于东北非的麦罗埃古国，其工匠模仿中国铜器制作铜壶。唐宋以来，广州和非洲的文化交流进入新的阶段，由广州启碇的中国船队可直达非洲东部，这时非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人占领了埃及、马格里布等地区。从广州输往埃及的瓷器，再转运至摩洛哥、马格里布等地，有的还溯尼罗河而上，贩往努比亚和更远的南方。在东非，中国瓷器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外，还作为室内摆设和建筑物的艺术装饰品。在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中国陶瓷碗盘被用来镶嵌在宫殿、清真寺的内壁和顶棚，以及柱形陵墓的外部。用中国瓷器装饰墓碑，曾成为东非广大地区对死者最美好的纪念和祝愿。

欧洲在罗马帝国统治时，其商船于东汉后期多次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贸易。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年），罗马使者来到广州转往洛阳，向中国赠送火浣布等礼物。其后罗马帝国分裂，海上活动衰落。唐朝时，广州“蕃坊”有基督教徒，但情况不详。到了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从海道来到广州府上川岛传教，不久病故。此后欧洲传教士陆续前来，据法国德恩编印的《1522~1800年的中国耶稣会士名录》所载即达9百多人，此外还有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传教士。他们中很多从海路来华，有不少人先在澳

门、广州等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后转往内地传教，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欧洲。朱谦之《中国哲学输入欧洲是辩证法唯物论底重要源泉之一》提出：“在18世纪时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不过比较起来，在这两个来源里，中国思想的影响比希腊的为大。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受希腊的文化影响较深，但到了启明时代（按，即启蒙运动时期），希腊的影响已为中国文化所代替。”西欧启蒙思想家从本身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利用改造，作为抨击欧洲世俗偏见和神学束缚的思想武器；并把中国古代的“仁政”观点，作为提倡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依据。他们提倡“理性主义”、“自然法则”，于是把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引为同调；他们追求理想和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所以对孔子及儒家的伦理道德、注重教育的学说，给予很高评价。他们还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如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二进制数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易经》和宋儒理气宇宙观的启发；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崇尚的“自然法则”，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其相似之处，他被认为是“新思潮的代言人”、“社会舆论的领袖”；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人物魁奈，其以农为本的理论、土地单一税的主张，都曾直接承受中国重农思想的某些内容，因而有“欧洲的孔子”之称。在十八世纪前后，欧洲社会掀起了崇尚中国古老文明的热潮。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某些欧洲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出异议。

另一方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不断吸取外来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作出应有贡献。早在秦汉之际，广州就已对外进行文化交流。1983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广州

象岗山南越文帝的墓葬中，发现“大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虽然未经检定，但初步可以判断其中有一部分应是从中亚或南亚等地输入的。过去广州发掘的西汉墓，曾发现犀角模型、玻璃器、玛瑙珠饰、蚀花的玉红石髓珠，经验定，有的不产于中国，有的质料不同于中国所产，有的与中国传统工艺迥异。”<sup>⑧</sup>可见当时国外的工艺美术已传入广州。在这个墓葬中，还有铜制和陶制的熏炉，这是广州汉墓最常见的随葬器物之一，为燃熏龙脑香的炉具，其出现要比中原地区为早，所燃龙脑香来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马来语称为“果布婆律”（Kapur Bauirs），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都记载番禺有“果布”出售。姚思廉《梁书》称为“婆律香”，这都是“果布婆律”的简称。它意味着东南亚的某些生活习俗，经广州传入内地，为中国所接受。广州在汉朝已有一批外侨居留，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的墓葬中，发现托灯的陶俑和侍俑。托灯的陶俑有男有女，侍俑则均为女性，站立作捧物状。这两种陶俑的形象都是头部较短，深目高鼻，两颧高，宽鼻厚唇，下颌较为突出，身材不大高，从刻划的胡子与胸毛来看，再生毛发达，因此有人认为这和马来群岛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这些陶俑的服饰特点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侍俑下身穿长裙如纱笼，也和马来群岛一些土著民族的风习相似。如果从深目高鼻这种特征来看，他们可能来自西亚或东非。有人认为这种陶俑大概就是东汉杨孚《异物志》中所说的“瓮人”。他们在广州定居，其生活习俗当会传入广州。与此同时，非洲埃及人的玻璃制品也辗转传入广州。在广州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发现有透嵌眼圈式玻璃珠、蓝色玻璃碗、绿色玻

璃带钩、绿色和黄白色的璧。玻璃珠、碗的制作与中国传统的工艺品不同；带钩和璧是中国传统的礼用器，但原料似非中国出产，应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有关。

两晋南朝时期，印度高僧除由陆路来到中国外，还有一些由海路前来广州，这就传入了印度文化。第一个由海路前来的天竺高僧耆域，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到达广州传教，并擅长为人治病，惠帝光熙元年（399~401），前往京都洛阳。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39—401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译经传教，以后前往长安、江陵。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罽宾国高僧求那跋摩来到广州，元嘉八年（431年）前往京都建康（今南京市）译经传教。元嘉十二年（435年），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来到广州，宋文帝派人迎至建康译经传教。齐高帝建元初年（479年），中天竺高僧求那毗地来到广州，后往建康。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高僧昙摩伽陀耶舍在广州朝定寺译经传教。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一说在大通元年（527年），南天竺香至第三子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来到广州西来庵（今华林寺）传教，以后前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他是中国禅宗的始祖，禅宗提倡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精神。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说：“历史事实表明，有许多进步思想家受过禅宗打破权威的影响，产生了批判封建传统权威的积极作用。”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年），西天竺高僧波罗末陀（又名“真谛”）来到广州，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前往建康，后又回到广州，前后翻译了佛教经论、纪传64部、278卷，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宗教本属唯心主义产物，但僧侣在传教时，往往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说：“佛教

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在音韵学方面，如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的拼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至于中国佛庙建塔塑像，绘制壁画，举行宗教仪式时行礼奏乐，均与印度文化传入有关。这时，埃及制作琉璃的技术已分别传入华南、华北，使中国建筑增色不少。

唐宋时期，大批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从海道前来广州的，在“蕃坊”（今光塔路一带）长期聚居。由外侨推荐“蕃长”一人，在中国政府认可，管理“蕃坊”事务。中国政府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在广州“蕃坊”兴建怀圣寺和光塔，并在城郊桂花岗建造“先贤古墓”，这些建筑物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以后几经修缮，至今犹存。由于阿拉伯人经营香药贸易，因而一些阿拉伯药方传入中国用唐朝名医孙思邈的著作《千金要方》、《千金要方》，采用进口香药的医方有数十种之多；到了宋朝，中医著作记载用进口香药来配方的汤剂、成药更多达二三百种，有些阿拉伯药物品种还在广东移植，阿拉伯人食用的烧饼、油煎饼，在中国十分流行。其乐器如唢呐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有喇叭、海笛、大吹、小青等类别；扬琴则成了“广东音乐”的主要演奏乐器之一。

明清时期，欧洲商人、传教士从海路来到广州，传入了欧洲文化。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12年），广州府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曾到葡萄牙商船了解情况，得知船上中国人杨三、戴明熟悉制造欧洲式船只和火铳的技术，水道副使汪铤于是命令何儒同杨三等联系，在东莞大批仿造西方火铳。明神宗万



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玛窦前来广州转往肇庆,以后进入内地,他和中国官员、文士交往,宣传欧洲的文物典章制度,介绍欧洲的天文学、数学、理化知识,并展出自鸣钟,地图、天文仪器、三棱镜等物。他在传教时,还译著有《坤輿万国全图》、《天主实义》,并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几何原本》、《同文具指》等书。为此,中国的修钟、造钟(发条靠进口)和机械制造业,以广州为最早。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在广州开设怡和洋行的英国商人马地臣,出版了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Canton Register)。道光十三年(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出版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中国统纪传》。在接收西方近代科学文明方面,广州与内地相比,可谓得风气之先。对于明清之际络绎前来广州并转往内地的欧洲耶稣会士,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评论说:“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稣会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人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总之,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贡献虽说内容复杂,但却具有一种较高级的投机性质。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中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连同他们的荣誉在内,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因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虽然有些迷信由于他们的到来而被除了,但哲学家们可以认为,他们随身带去的迷信也不少。”至于他们当时在中国进行的政治活动,此处姑置勿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科学的进步,

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飞跃发展,现在这条航线已和古代大不相同。我们缅怀先辈在惊涛骇浪中艰苦奋斗的功绩,发扬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继承他们长期对外进行友好交往的事业,从广州历史的角度予以评介,认识其往日的地位和作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 注 释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 ② 见沙斯特里《南印度史》、威廉斯《东南亚史》。
- ③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造船工业局《造船史话》编写组:《造船史话》,上海科技出版社。
- ④ 酈道元著、王国维《水经注校·泝水》,上海人民出版社。
- ⑤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三期。

### 参 考 文 献

1. “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2. 《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 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
4.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5. 陈大震。《南海志》残本。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印
6.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7.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 武培干。《中国国际贸易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9.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
10. 徐俊鸣,郭培忠,徐晓梅。《广州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1.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12.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
13.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广东陶瓷》。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化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5.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6. 梁嘉彬,《广东十二行考》。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北京:三联书店
18.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
19.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北京:知识出版社
20. 冯承钧,《中国殖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1.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2.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译,《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
23. (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
24.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5. (阿拉伯)人著,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
26. (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7.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
28. (日)桑原鹭藏著,陈裕善译,《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

(本文作者是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 广州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丝绸、陶瓷和茶叶

陈坚红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重要的起点，长盛不衰。2000多年来，它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交流的基础就是物质上的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丝绸、陶瓷和茶叶是广州古代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

本文仅就“五口通商”以前广州的丝绸、陶瓷和茶叶的输出及其意义作概括性的论述。

## —

由于对外交往方面的各种优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的重要港市。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初，中国船只从南海边上的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带着黄金、杂缯到都元、邑卢没、湛离、夫甘都卢和黄支等国，“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杂缯即各类丝织品，文中提到的“国”在今日东南亚和印度等地。这是关于我国丝绸外传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一记载虽无明确提到广州（古称“番禺”或“南海”），但不应排除广州也是其中一个始发港的可能性。因为根据考古发掘等资料来看，广州在西汉早期已具有海上通航的能力，而且，舶来品不少。另外，成书早于《汉书》的《史记》也明确记载：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玳、果布之凑，”可说已经是岭南的对外贸易中心。市面上不仅有舶来的海外奇珍，亦有本地土产及内地各处运至的货品。西汉时桓宽的《盐铁论》中就提到商人把蜀郡的货物运到南海来交换珠玕、犀、象等珍品的情况。西江水路就是连接南海与西南内地的通道。当时，蜀锦闻名天下，必然会成为顺江水面下东南的商品，并且很可能经由广州输出。汉代，广州与地处今日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半岛、波斯湾畔和地中海海岸的国家已有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交往。《后汉书》中亦不乏汉朝政府向叶调（今爪哇）、天竺（今印度）回赠彩缯等的记载。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地区从汉代开始已有种桑、育蚕、丝织的生产活动（《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近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大量炭化了的丝绸，并有一大一小相配的一套铜质印花工具，可在丝绸上套印花纹，其印出的纹饰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朱点金银印花纱的纹饰十分相似，可见当时广州已有比较发达的丝织技术。外来以及本地的产品为丝绸的出口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中国丝绸日益被各国人士所喜爱，广州亦成为我国的主要输出口岸。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賚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隋书·赤土传》）。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一说在苏门答腊），是广州航线通达之地。

唐代，广州地区丝织业较前又有发展。当时，有的阿拉伯商人在广州见到一个中国官员穿着五件丝质长服，胸口上黑痣仍然能透现出来，感到非常惊讶，而广州总督穿的丝绸比这个还要精美（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录》）。这些丝绸

的产地不详,但当时广州市场上聚集了不少精美的丝织品,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印度见闻录》、《金草原》等约九世纪的阿拉伯人著述中,也提到黄巢攻占广州以后,中国丝绸向阿拉伯的输出一度陷于停顿。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贞元年间(785—804年)的宰相贾耽已列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路由广州出发,经南海和印度洋,通航波斯湾和红海,远至东非。外国商人,则“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綾、绢、丝、帛之类”(《大正大藏经》卷五十一)。当时,中国的丝绸正是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输出海外的。

宋、元时期,丝绸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宋初,市舶司首先在广州设置,管理对外贸易,后又明确规定:“外国货物贸易者,专以绢、帛、锦绮、瓷、漆等物交换”(《宋史·食货志》)。丝织品与瓷器等作为货物,换取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玑、镔铁、麝皮、玳瑁、玛瑙、水晶、蕃布等物。不仅交易用丝绸,礼赠亦用丝绸。如宋元丰五年(1082年),三佛齐管辖下的占碑国派使者到广州,送给广州的市舶官员200多两香料等物,中国方面则以同等价值的丝织品回赠。舶来的香料并不便宜,如诸种香料中的龙涎香,宋代广州市场上的售价是“每两不下百千,次者亦要五六十千”(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二)。香料是宋代朝野上下都十分喜欢的物品,需求量很大,而广州又是当时香料进口的主要口岸,仅熙宁十年(1077年),广州进口的乳香就占全国进口量的98%,其中从丝绸交换的当不在少数。可见宋代广州输出的丝绸数量相当可观。元代,与广州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綾、罗、緞、绢等丝织品亦从广州运往今日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桑给巴尔等

地。明、清两代，广州的丝绸外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一）广州地区发达的丝织业是丝绸出口的基础**

斯时，广州地区的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珠江三角洲一带桑基鱼塘布局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蚕造亦由唐代的一年五收发展为七收，并吸收省外、国外的织造技术，生产丝绸新品种。如明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又在广东肇庆长期居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人“用丝掺以棉织成一种大马士革式的料子，并且他们模仿欧洲产品，现在又织成一种金丝的料子。他们的其他纺织品也在欧洲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中国札记》。“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清雍正《广东通志》），遐迩闻名。现存于广州博物馆的明代花缎及清代广缎，十分精美。尤其是清代广缎，虽历经数百年，依然鲜艳如新，其织造工艺之精致，构图设色之纤丽，都令人叹服。明嘉靖九年（1530），佛山的丝织业已有一定规模，丝织行业划分为十多行，进行专业分工的生产。从清雍正年间开始，广州的丝织业更形发展，后分朝蟒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通纱行等。大行内又分为许多小行，如十八行就分洋货三行、金彩三行、千纱三行、绫绸三行，其中以生产贡品及洋八五六丝、洋货洋巾的十一行人数最多。”（广东省文史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 **（二）丝货冲破官府时松时紧的禁止、限制出口政令，通过朝贡贸易、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出口**

明、清两代，朝廷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往往给予丰厚的

“赏赐”，其实这也是一种贸易形式，即“朝贡贸易”。中国周边的国家带来了当地的土特产等礼物，中国方面则主要回赠丝织品及瓷器，以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暹罗（今泰国）为例，明洪武七年（1374年）和永乐二十年（1422年），暹罗国王派使者上京朝贡，明廷分别回赠 丝金文绮、纱罗、文彩、帛和纒丝、纱罗、赖锦等多匹，从广州出口。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暹罗国贡船遭风飘没，未能到达京城进贡，但清廷仍照惯例，把各类丝织品等发交两广总督，转往暹罗。

民间贸易是当时丝绸输出的重要途径，主要为官商所操纵。以下所列的地方志记载和清代宫廷档案，均形象地描述了明清时期广州丝货大量出口的一些情况。“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广东新语》）。清乾隆年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丝缎等货，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六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浙江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商行，转售外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硃批奏折》）。“蚕事之兴也凡八熟……所繅之丝，率不自织而易于肆。月之一、四、七为墟期，每期丝价辄以万计……”。“呼郎早趁大岗墟，妾理蚕丝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竞何如”（清嘉庆五年《龙山乡志》）。就在清道光十年（1830年），仅生丝一项，从广州出口达705 300万斤，其中广东丝占368 000万斤。

当时，广州的海上丝绸贸易还突破传统的地域界限，经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船销往日本和欧美等地，数额颇巨。



明末清初，广东是与日本关系最深的中国四个省份之一，日本博物馆中至今保存着当时日本人彩绘的广东船、南京船等样式，绘画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识别。根据陈捷译的《中日交通史》所载：广东运往日本货物，很大一部分是白丝、黄丝、锦、金缎、二彩、五彩、七丝、天鹅绒、八丝、闪缎、柳条、綾子、绉纱、纱綾、绢绉、纪、绉、绸、天蚕丝等。明末，葡萄牙人在东方的主要贸易据点有四个，其中澳门是丝绸贸易的中枢，他们从澳门到广州集市上采购丝绸。1580年以前，广州的这种集市每年有三至六次，以后每年两次。葡人利用各地丝绸的差价，赚取巨额利润。他们在广州采购丝绸后，运到日本交换白银，再把白银运回澳门，购买以丝绸为主的中国货物，然后又到马六甲装上热带产品启程回欧洲。17世纪以前，中国丝绸已经从葡京里斯本发往欧洲各地。当时，菲律宾的马尼拉也是中国与拉丁美洲丝绸贸易的枢纽。闽粤商人把丝货运至马尼拉，再由西班牙等国商船运至墨西哥等地。1587年，一艘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的西班牙帆船，就载有200万西元的中国丝绸。清代，从马尼拉启航的船只，每艘装载的中国丝货亦多至1200箱。按1774年的一次来看，每箱的数量是：珠色广州光缎250匹，深红色纱72匹的重250磅；内装1140双丝袜的重230磅。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期，墨西哥有1400人以丝织业为生，但“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当地丝织业的原料均由广州和漳州运来。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金属货币亦源源不断地流入闽广，用以购买中国生丝和其他丝织品。“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多行使洋钱……称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乃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计”（《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清代笔记小说也

有乾隆年间广东流通“鹰洋”（墨西哥银元）的记载，可为广州丝绸大量出品一证。

据有关资料显示：1817~1833年，从广州出口的生丝数额达29 676 209元，绸缎数额达32 595 382元。同时大量出口的还有土布，主要销往欧美国家。

## 二

陶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以及陶瓷技术的外传，对世界物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广州在陶瓷输出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

### （一）广州历代的陶瓷外销

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是货品汇聚的重要都会，有可以建造宽5~8米，载重25~30吨木帆船的造船工场。随着海外交通航线的开辟，陶器也传到了东南亚诸国。印度尼西亚出土的汉代陶制龙首勺，在广州汉墓中亦有出土。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的北礁礁盘上发现了南朝（420—589年）时的两件陶罐和一件陶杯，这些陶器在广东的南朝墓中常有出现。这些都说明当时广州地区生产的陶器已有可能成为外销的商品了。

隋至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对外贸易的管理职官“市舶使”和管理机构“市舶司”均创设于广州，广州是“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的大港市，中外商舶云集，载货多以陶瓷为大宗。陶瓷器容易破碎，走陆路用车马运输诸多不便，而海运则不仅减少了转折，而且损耗较小，容量又大。广州在秦汉时已有的造船技术，到了唐代更为发展，木

帆船船体坚固，设备较好，适宜远洋航行。宋时，又是国内的三大造船中心，“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吴自牧《梦粱录》），而且已经使用指南针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阴晦观指南针”（宋或《萍州可谈》）。中外商船可以直接或间接来往于南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这一切，为广州陶瓷外销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不少专家认为：唐宋时，湖南铜官窑、浙江越窑和龙泉窑、陕西耀州窑，江西吉州窑和景德镇窑、河北磁州窑，广州西村窑等窑口的产品汇集广州出口。唐代，阿拉伯商人在广州所见到的“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也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13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到过广州，有这样的评价：“广州是世界大城市之一，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能及，其间最大的莫过于瓷器市场”，“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伊本·拔图塔游记》）。著名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认为：“中国瓷器早在8世纪时就由我国船舶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由波斯到达埃及，以至阿非利加的东部与北部，甚至有的记载说通过地中海，还运到西班牙”（《中国陶瓷史略》，载《文物》年1963第1期）。因此，以广州为主要起点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人称之为“陶瓷之路”。

广州珠江是这条海上“陶瓷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出口。1977年，珠江口外的伶仃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批唐代陶器，捞出时层层相套，大四耳罐内装有小四耳罐和青釉碗。这与《萍州可谈》一书关于广州出洋“船舶深阔各数一丈，商人分

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的记载正好互相印证，说明了早在唐代，广州海舶的商人已经懂得充分利用海船的空间以增加陶瓷外运的数量，而且，也有可能用大小紧迫相套以减少因风浪颠簸，瓷器碰撞带致的损耗。在广州海船经常往返的海南岛东海岸和西沙群岛海域，也发现过大量的外销唐宋陶瓷，既有广州及附近窑口生产的陶瓷器，也有产自外地但经由广州出口的各个窑制品。虽然这不过是中国陶瓷在外销过程中因意外而遗留下来的很少一部分，但亦可见当日外销盛况之一斑。

明朝和清朝，各地港口时开时禁，兴废无常，惟有广州比较稳定，开放时间最长，陶瓷外销最兴旺；而且在一度“禁海”的时候，民间的瓷器对外贸易也没有中断，继续以走私的形式进行。葡萄牙的传教士克罗兹在明嘉三十五年（1556年）曾到过广州，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广州（市场上）有许多洁白的瓷器，另外还有一些五彩釉的瓷器，有红、黄、绿釉，有的还描金。有些非常精美的瓷器是禁止公开出售的…但它们有时也秘密地（在市场上）出售…”。当时，几乎所有瓷器都是洋行商人们组织采购来的。瓷器商店门前的招牌上写明来自江西或福建等地。江西瓷器一般是从赣江而上，越过大庾岭到广东的南雄，再顺北江而下，经韶关、英德到达广州。由于欧美新航路的开辟，广州外销的陶瓷除了继续运销传统贸易地区外，还远销到欧美。特别是18世纪初，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先后在广州设立贸易站后，陶瓷贸易更便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陶瓷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在造型、装饰方面可按客户需求生产，深受消费者欢迎。因此，欧洲在清代前期始终是广州外销瓷器的主要市场。

## （二）经广州运销世界各地的陶瓷

千百年来，中外商船经由广州运销出口的陶瓷器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沿着“陶瓷之路”而行，到处可见其迹。

17~19世纪，暹罗（今泰国）王室及民间所用的瓷器多数由中国传入。当时，广东是暹罗的“贡道”，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政府不但以大量的陶瓷器作为暹罗“进贡”的回赏，并准许暹罗贡使所带的大批随船货物在广东自行“觅商变价，置办国需随汛回国”（《宫中硃批奏折》），再加上民间的交易，广东运往暹罗的陶瓷当不在少数。近年来，有关方面多次在泰国水域打捞到中国明清时期的沉船，载有景德镇瓷和彩釉瓷器。在湄南河的出海口附近，水下的元、明、清瓷器很多，被称为海底瓷器博物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是与广州直接通航的国家，宋代广州西村窑生产的青釉刻花大盘、白瓷凤首执壶、酱釉小瓶、军持、水盂、碗、盒等器物在国内传世品很少，在菲律宾、印尼等地却大量发现，其中前者是发现西村窑产品最多的国家，“过去几年间在菲律宾布土安发掘到的瓷器差不多包括了中国方面报告中西村窑的所有类型”（麦英豪、黄森章《西村窑的兴废与宋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关系》引文）。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陶瓷器，不仅有经广州出口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釉和青花等瓷器，还有大量的广东和福建陶瓷，数量占了一半以上。

中国的远洋船帆是13世纪时“印度洋上最大的帆船，它们访问了南印度和斯里兰卡，卸下的丝布和陶瓷随后便被穆斯林商人、印度商人以及犹太商人运到其他东南亚地区、中非和东非的市场上销售”（肯尼思·麦克费森《19世纪以前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印度南部

港口柯钦有一个建于 1568 年的犹太教堂，里面铺地的瓷砖全部来自广东，砖上绘画有中国式的风光或花卉。

古代的广州与阿拉伯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唐宋时期，交往十分频繁。在阿曼出土的中国陶瓷，有广东南海五代官窑彩绘瓷盆，北宋广州窑青白釉刻花碟，北宋南海奇石窑黑釉翠蓝窑变四耳罐，明代广东石湾杂色釉和三彩骑狮人物像，黑釉三足炉，北宋广东潮州窑青白釉盘口瓶，明代广东惠阳青釉碗，还有大量南宋浙江龙泉窑青釉碗、盘，元代福建德化窑白釉印花碗和明代江西景德镇青花碗等（曾广亿：《阿曼出土一批中国古代外销瓷》，载《古陶瓷研究》）。伊朗各地几乎都有中国历代瓷器出土。伊朗历代帝王，尤其是萨法维王朝（1502~1735 年）的帝王大宗订购中国瓷器。至今伊朗各博物馆保存的中国明代瓷器，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以及内容之丰富均属罕见。公元 750 年（唐天宝九年），阿拉伯的阿巴斯王朝建立，它的船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新都城报达（今巴格达）成为繁荣的国际都会，河岸码头停泊着许多装载瓷器和丝绸的中国商船，还有中国商品的专营市场和货栈。本世纪以来，在巴格达周围方圆约 100 公里的地区，到处发现中国陶瓷，其中有 9~10 世纪的华南白瓷碎片。

中国陶瓷从唐代开始输入非洲。在元大德《南海志》中，明确记载与广州有直接交往的国家有勿斯离（今埃及）、麻加里（今北非西部）、层拔（今东非）等。地处北非的福斯塔特，已发掘出中国陶瓷残片 1 万多件，有唐三彩、邢瓷、铜官窑瓷等，数量最多的是越瓷。还发现不少宋代彩青、龙泉瓷和元代青花瓷。东非沿岸港口也大量出土中国瓷片，仅坦桑尼亚海岸就有 46 处遗址，器物年代从唐末至明代，不但数量多，

而且有的还相当精美。在宫殿的墙壁和天花板，在清真寺的礼拜龛墙，甚至在墓碑上都镶嵌着中国陶瓷，可见其数量之多，影响之深。在肯尼亚马林迪附近的给它古城的16世纪文化层中，青花、白瓷和粗瓷中的“广东罐子”占了主要的地位。

1610年和1614年，荷兰两艘商船先后从广州运载8万件瓷器回国，使荷兰和中国的瓷器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统计，从1602~1682年，有1200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载到荷兰和世界各地，其中1010万件是从广州出口的。1698年，法国在广州建立东印度公司，当年即有法国商船“安非托里脱”号来到广州，载走了以景德镇瓷为主的160箱约数万件瓷器，并且在两个月内销售一空。1703年，再次运载140箱。1738年，法国又要求在广州购买彩釉杯、糖缸、茶壶、高脚杯、果盘、青花碗、五彩面团罐等数万件。18世纪以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瓷器贸易迅速发展，在广州、伦敦和牛津都有不少经营中国瓷器的商人。1774年，伦敦至少有52家经销和承接委托定制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店（《中国陶瓷史》）。“在英国的博物馆中，有一张英国商人皮尔于1731年12月10日在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发货单，包括100种不同样式的青花瓷碟250件，装饰有家族纹章的汤碟、啤酒杯及花瓶、咖啡壶等近450件”（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从1750~1833年，英国在广州进口了瓷器共789箱（《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1760年，英国还从广州进口了制造瓷器的设备，仿照广州流行的式样和图案制造瓷器，其厂名则叫“新广州”。瑞典从广州运出的瓷器，数量十分可观，据瑞典学者估计，在18世纪的13次远航中，至少运回瓷器2800万件，大部分是按瑞典商人要求而描上各

种图案的广州彩瓷”（章文钦《清代广州的瑞行》）。仅1745年“哥德堡号”的一次航行，就采购青花等瓷器两吨多，而且品种相当丰富，装饰图案共计120种。

“1784年8月28日，从美国纽约启航的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黄埔港，购买了962担瓷器及丝绸等运回美国。1786年再次到广州运回大量瓷器。以后，波士顿、费城、塞勒姆等港口城市的商人也纷纷前来广州贸易，18世纪末，中国瓷器占美国商船货运量的15%，到19世纪初，增加到24%。从1804~1809年，美国驶入广州港的商船总数为154艘，每年从广州进口的瓷器等货物价值约在300万至600万元”（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

### 三

茶是我国传统的饮料，又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从17世纪末开始，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瑞典、美国等国商人竞相争购中国茶叶，交易甚旺。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又有“茶瓷之路”一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的茶叶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才运销外洋。因此，五口通商前，茶叶出口几乎集中于广州。当时，皖、闽、粤、浙等省的茶商汇聚广州，通过“十三行”行商与外国商人进行茶叶交易。不少茶商在茶叶产区开设茶庄，在广州设立茶行。外地茶叶运到广州后，再根据英美茶叶市场的需要加工成各种茶叶出口，著名的是用橙花或茉莉花薰过的花薰茶，又叫珠兰茶。清代的广州外销画中，就有不少茶叶加工的场面，其中的一张画是：中间是中国商



人和西方商人在看样、谈判，左面是许多工人在加工茶叶，右面是已包装好的一列一列茶箱；两个挑夫把茶箱抬到门口，再送到江边的船上。当时广州珠江南岸（广州人称“河南”）有很多手工制茶工场，“河南茶”饮誉国际茶叶市场。看来不少茶叶亦在“河南”进行。另一张画是：中国工人正在加工茶叶，旁边可见六个已装好茶叶的茶箱，写有“万益记”三字，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国人在西方商人的注视下给茶箱编号。今天可以见到的，还有 19 世纪 30 年代的广州茶行工人坐在空茶箱上筛拣茶叶的照片。鸦片战争前，每年约有 45 万担茶叶从广州输出，每担茶叶征粤海关正税及各项归公规费 9 钱 2 分，粤海关每年可征收茶税 41.4 万两（彭泽益《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工工业》，载《历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英国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两国的茶叶贸易在广州的中英和中外贸易中均占有很大份量。1775~1833 年的 58 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茶叶共约 1400 多万担，最多的一年是 40 多万担，最少的约 12 万担，平均每年约 25 万担。仅 1792 年，英国就从广州出口红绿茶共 4 037 694 两白银（《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英国茶叶贸易的品种很多，至 1940 年时，已有武夷、功夫、珠兰、小种、白毫、熙春等近 20 个品种。茶叶不但为英国带来了巨额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习俗，成为英国公众的日常饮料。

“瑞典也是与广州有大宗茶叶交易的国家。瑞典东印度公司在营运的 75 年中，对远东进行了 130 次贸易远征，除了 3 次外，均以广州为目的地，购买的货品主要是茶叶和瓷器。1750~1793 年间，瑞典商人从广州共运走茶叶 292 469 担，占瑞典从中国购买货物总数的 90% 以上。瑞典哥德堡是重要的

茶叶市场，以其命名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曾三次从哥德堡航行至广州。1745年9月，这艘快速帆船从广州满载货物回航时，不幸触礁沉没在哥德堡港内。船上有丝绸、陶瓷、胡椒、生姜等1333吨，并且有茶叶370吨”（杨仁飞《瑞典人早年在广州与澳门》，载1991年3月《澳门日报》）。现已打捞上来的一箱茶叶，重50公斤，是优质白毫茶，虽在水下240年，但由于包装得好，又有海底淤泥起保护作用，故其青绿颜色和香味尚存。

“18世纪末，美国也参与了在广州的茶叶贸易。1783年美国独立以前，茶叶来源要依靠英国，1784年美国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首航广州，运回红绿茶数百吨、瓷器数十吨等货物，开创了中美贸易的先河。接着，美国东海岸各处的商船也纷纷加入华茶贸易的行列。1800年，美国商人从广州运回茶叶28489担，1820年是40153担，1840年增至150081担”（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中美关系史论丛》）。在美国的费城博物馆内，保存了一个1811年的一个木质茶箱，高61厘米，宽45.7厘米，长45.7厘米，书有中文“正香”字样。

“19世纪初，中国茶叶还远销巴西。1810~1812年巴西从中国引进茶树，并从澳门招了一批中国技术工人到里约热内卢近郊的植物园传授种植茶树的技术。至今巴西人把茶叶叫作“cha”，是中文的译音”（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据不完全统计：1817~1832年，广州口岸的出口总值约318301431元，茶叶占了193134525元（《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所占比例相当之大。

## 四

广州是世界闻名的港市，对外贸易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至清代前期，广州对外贸易的范围已十分广泛，与亚、非、欧、美洲的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丝绸、陶瓷、茶叶等从广州珠江口出洋，通过海路销往世界各国；海外的珍宝、香药、木材、金属、纺织品及各种洋货亦经此输入，可谓“番舶连樯，货宝鳞集”。汉代，丝绸已经出口，以后历代不断；唐宋时期，陶瓷崛起，成为与丝绸并重甚至超越前者的外销产品；明清以来，茶叶开始从海路外销，并成为广州外贸市场上最主要的商品。由此，以广州为主要起点的这条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陶瓷之路。或“茶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上进行的贸易，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交易，也是文化方面的双向交流。虽然，这个贸易在后期曾受到复杂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它对贸易双方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却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的。它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广州，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仅以陶瓷为例，陶瓷的故乡在中国。历代以来，中国各地窑口的陶瓷器汇集广州口岸，源源不断的运销海外，很受各国人士欢迎。在欧洲，“见识到中国瓷器以后，中国瓷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瓷所能比拟的瓷器。中国瓷器所具备的优点，它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陈万里《宋末至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引佛尔克《瓷器与东印度公司》）。当时对中国瓷器的追求达到

了狂热的程度。17世纪以来，随着陶器、丝绸、园林艺术等的大量传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在法国，17世纪开始从广州大批购入瓷器，后又在本土开设工厂，仿造中国瓷器。当时的法国国王曾给予一家工厂30年的专利权，专门生产仿中国货的碗、盘、碟、瓶等产品。法国塞佛雷斯于18世纪生产的一件青花吉祥扁瓶，与同时代的景德镇产品十分相似，从造型到纹饰几乎一样。当时，瓷器已普及整个法国社会，最受欢迎的是一种轻巧纤美，莹洁润泽，白底绘彩色人物花鸟的中国瓷器。这类瓷器，很可能就是经广州出口的江西景德镇瓷器或广州彩瓷。在广州博物馆里，保存了一只纤巧的广彩碟，白底彩绘，一对西方青年男女漫步于花丛中，上有法文“忠诚和坚贞”，情调浪漫，装饰华丽。正是法国，于18世纪初首先兴起了一种追求轻盈华丽和幻淡色彩的“罗柯柯风尚”。罗柯柯(rococo)一词源于法文(rocille)，涵义为贝壳饰品。它以纤巧轻淡的中国瓷器为典型原质，受中国艺术崇尚质朴和富有想象力的影响，具有轻倩、优美、愉快和自然的特色，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风靡整个欧洲，盛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对欧洲的艺术风格和生活风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唐宋年间开始，陶瓷从广州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他国的需要，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同时也促使中国本身的陶瓷生产进一步发展。因为，海外市场愈广阔，生产竞争也愈激烈。在外贸的刺激下，各地窑口不断改进烧造技术，提高工艺水平，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广州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生产外销陶瓷的窑场，最为著名的是北宋西村窑、明清石湾窑和清代广州彩瓷，其中广彩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市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广州彩瓷是清初发展起来的外销瓷器。当时，外

商对陶瓷的需求量很大，各地产品云集广州，销路甚畅，景德镇的瓷器尤受欢迎。商人们看准行情，投其所好，在广州南岸开设工场。先从江西景德镇等处运来向釉或表面装饰极少，中间留空位置的瓷器，再按外商的要求描画施彩，然后开炉烘染，烧成彩瓷出口。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些专门附属于洋行的瓷器彩绘作坊，广州有100多个。美国旅行者Willian Hickey于1769年曾参观过广州珠江南岸的一个广彩加工场，在一间长厅里，约有200个成年工人和童工在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和润饰各种装饰（《中国陶瓷史》）。欧美等国商人不但送来了本国的家族纹章、景物、图案及肖像等样式，而且还派画家亲临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装饰。早期的广彩色调较为古朴，后来大量运用金彩，造成一种金碧辉煌的效果，故又称“织金”彩瓷，举世知名。传世的广彩不少，这在我国及土耳其、英国、美国、瑞典等国的博物馆都有收藏，韩淮准先生在南洋也见到过一只绘有印度鸟鲁军团徽识的广彩碟（《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瓷》），上文提到的法文广碟则应该是外国商人订造的货品。

丝绸、陶瓷、茶叶是广州古代三大出口商品，曾为架设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外友谊桥梁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今天，它们仍然是我国出口创汇中的重要商品。

（本文作者是广州博物馆馆员、陈列部主任）

# 清朝“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 对外贸易与海上交通

何礼荣

清朝初期，清政府继续执行明朝政府的封关锁国政策。清初40年间，即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44～1683年），在海禁十分严厉的情况下，对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几乎停顿。除郑成功以台湾为据点，大规模经营海外贸易外，在广州只有数量极少的朝贡贸易和与澳门的陆路贸易以及走私贸易了。由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弃膏腴而为荒土，捐楼阁而就茅檐，赤子苍头，啼饥在道，玉容粉面，丐食沿街。”“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银在三十余万两……未迁之民，日苦于科派；流离之民，各无栖止，……”<sup>①</sup>因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不得不下令开放海禁，次年，正式公布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四个海关，以主持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当时，海禁虽然开放，但清政府对外贸易仍然限制极严。至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又封闭了江苏、浙江、福建三个通商口岸，广州则成了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可以说，自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九年（1758—1839年），广州处于清朝海外贸易的繁荣时期。

## 一、“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

“一口通商”后，由于“广州的地理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再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得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极盛之地。除了俄国商队跨越中国北方边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往来澳门以外，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汇集到此城（广州）”<sup>2</sup>“清政府在广州委托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管理广州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垄断了广州和全国的对外贸易。”“鸦片战争以前的1837年，在广州的外国商号有156家。”<sup>3</sup>“1836年，307名外国人租到了广州十三行的房子，总面积为77万平方英尺。”<sup>4</sup>

茶叶是18世纪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主要输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1830~1833年出口货值46694226银元。<sup>5</sup>

丝绸在广州出口商品额中占第二位。“至道光十年（1830年），广州出口的生丝就达到705300斤”<sup>6</sup>“1830~1833年，广州出口生丝货值9618056银元、绸缎货值5934189银元、土布货值1002052银元”。<sup>7</sup>

在这期间，外国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白银、棉花、毛织品、香料等。白银是充当购买中国商品的支付手段而输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

向中国输出的”。<sup>⑧</sup>福建巡抚常赉奏折称，夷船来时，“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年）的130年中，广州净进口白银达到4亿两之多，占输入中国白银的80%”<sup>⑨</sup>。输入的棉花主要来自印度，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输入广州的棉花1116担，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已增至48000担，次年增至93000担，再次年增至187000担以上了。”<sup>⑩</sup>

外国商品的输入，对关税收入也是可观的。据有关资料记载：“道光八年至十七年（1828~1837年）粤海关贸易商品量值为：关税15697281（两），贸易量总值784854050（两）。”<sup>⑪</sup>

在进口商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清廷封建统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和高级消费品，如宝石、香料、首饰、戒指、高级毛织品、鱼翅、燕窝之类。

## 二、“一口通商”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清代鸦片战争前的80余年，由于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全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和大批的外销物资都集中到广州运往海外，外国的商品也运进广州销往内地。由此，推动了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州作为广东省的行政中心，将周围番禺、顺德、南海、东莞、香山等十多县的种桑、养蚕、种茶、花卉、水果、甘蔗、养鱼等农副业户，以及织布、缫丝、刺绣、陶瓷、铁器等手工业户，通过各种渠道，将分散的千家万户，渐趋集中，纳入网络。使珠江三角洲的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与广州本地产品一起组成种类繁多，五光十色的“广货”供应海内外市场，大大地促进了广州对外



贸易的迅速发展。广州的丝织业是很负盛名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广州的丝织业生产很发达，从江浙一带请来师傅讲授，并且从江南贩运一部分丝斤和土丝混合织造“广纱”、“广缎”。“质密而匀，其色鲜艳，光辉滑泽”，“苏杭皆不及，然必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那时广州的丝织工场都集中于上下西关，下九甫等处。格林伯格曾指出：到19世纪30年代，已有一些集团，如福建的茶农，南京地区的蚕丝生产者和广州的手工业者等，开始靠对外贸易为生。在广州河南兴起了瓷器加工业。瓷器商人先到江西景德镇买大批白瓷器回来，然后在河南设厂开炉烘染加工，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售之洋商。

广州一带所产的物品，统称“广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广州所产的珠贝、玻璃、翡翠、珊瑚诸珍错，不但供封建王公贵族所用，还大量卖给外商出口。

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进口工艺品在花式、品种、式样等方面起交流、推动、传播作用，择优仿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广州产品的更新改造，加速了广州以及中国城乡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进口原材料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物资交流和贸易的发展。

### 三、“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海上交通

清朝前期，广州除原已开通的欧洲航线、拉丁美洲航线、印度洋航线、东南航线和日本航线之外，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夏季，由美国商人装备的“中国皇后号”商船，自纽约载着一批洋参到达广州，开通了北美航线。嘉庆十年

(1805年),俄罗斯派遣“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商船抵达广州,开通了俄罗斯航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开通了由广州至南威尔士杰克逊口岸的大洋洲航线。

据有关资料记载:自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9年)进入广州港的商船共有5290艘。船舶进口数量是逐年增加的,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836年,达199艘。这与“国朝设关之初,番船入市者,仅二十余桅”<sup>③</sup>比较起来,增加了许多倍,其吨位数也由每年的四万吨增加到七万吨。<sup>④</sup>

“至于通过广州出口的本国船舶,也有蓬勃的发展,而且多往来于越南、暹罗、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吕宋等地,仅新加坡一地,每年便有90余艘中国船往来贸易。”<sup>⑤</sup>“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73年间,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总数3017艘,其中相当部分是从广州开出的。”<sup>⑥</sup>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十八年(1839)年的82年间,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为800艘,其中绝大部分是由黄埔港开出的。”<sup>⑦</sup>田汝康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一文中说:19世纪20年代后,每年行驶暹罗、中国,由华侨集资经营的船舶有82艘;由中国驶往越南西贡的有30艘,吨位6500吨;驶往福发的有16艘,3000吨,驶往顺化的12艘,2500吨;加上驶往越南其他港口的船舶,总计有116艘,约20000多吨。该文还引克劳佛特《印度半岛史》的资料说:当时“行驶马来海面的中国船有加里曼丹10只,5600吨,爪哇7只,5300吨;望加锡2只,500吨或1000吨一只;安汶1只,500吨;马六甲1只,1000吨;林牙群岛以及附近岛屿3只,2100吨;丁加奴1只,800吨;吉连丹1只,800吨。总计26只,17100吨”。当然,这些船也有从福建出发的,但从广东和广州出发的,当不会少于一半。

总之,清朝“一口通商”期间,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处于繁荣时期,海上交通也很发达。自18世纪末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取得鸦片专卖和制造特权后,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以攫取暴利;美国也将印度和土耳其鸦片输入中国。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1838年增至40200箱,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影响清政府财政。1838年底,清廷派林则徐赴广东省查禁鸦片,1839年6月,在虎门销毁英、美鸦片商交出的鸦片2376254斤;同年10月,英政府以保护通商为名,出兵侵略中国。1840年6月,正式爆发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最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从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从此黯然失色。但它以往光辉业绩,却是永载史册的。

#### 注 释

- ① 钮锈:《粤觚》李率泰、王采任奏疏
-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304页
- ③ 孔经纬:《简明中国经济史》第139页
- ④ 转引自[美]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第89页
- ⑤ 黄启臣:《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1644~1840年)》第217~218页
- ⑥ 李待尧:《奏准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不准其出口疏》,《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4册,第41页
- ⑦ 黄启臣:《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1644~1840年)》第218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 ⑨ 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载《清史

研究集》第5辑第258页

- ⑩⑫⑭ 邓端本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
- ⑪ 黄启臣：《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1644～1840年）》第220页
- ⑬ 《粤海关志》卷二十五
- ⑮⑯ 黄启臣：《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1644～1840年）》第214页

（本文作者是广州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 广州怀远驿与海上“丝绸之路”

丘 华

今广州十八甫路怀远驿街，是怀远驿的所在地。“驿”，是古代专供官员、使节和传递公文的公差途中住宿和换马之地，“怀远”，即接待远方的外国客人之意。因此，顾名思义，这怀远驿就是专门接待外国客人的宾馆。

怀远驿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在全国同时设立这样驿馆的，只有浙江宁波的安远驿和福建泉州的来远驿。

明成祖设立驿馆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朝贡贸易。因明太祖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准民间经营海外贸易，外国人要与中国贸易，必须以朝贡的形式出现，即以向中国皇帝朝贡为名，然后在朝贡的过程中互相贸易。按照规定，贡使可以携带少量的商人和货物入境，通过牙人卖给中国的商人，临走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牙人买进一部分货物，带回本国。明成祖为了显耀国威，除了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之外，还极力动员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前来朝贡。广州地近南海，为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等国进入内地的门户，贡使和商人往来较多，所以十分重视怀远驿的建设。

怀远驿有房屋 120 多间，雕梁画栋，红墙绿瓦，十分气派。从大门进去，有厅堂廊庑，楼阁玲珑，花木扶疏，环境优美。再加上面临珠江，有码头等设施，交通亦称方便。

怀远驿归市舶司管理。所有来华朝贡人员乘船抵达广州

后，其携来货物通通由市舶司保管，因此，随行人员除一部分留船照管船舶外，大部分人员都要住进怀远驿，进行商务活动。住进怀远驿的人员，其生活费用和医药费用，统归明廷负责，直至贡使从北京朝贡回来离开广州回国为止。住进驿馆的贡使和商人是不能随便外出的，为了丰富他们客旅生活，当局除了按规定的時間宴请外，还有歌舞等表演，以娱乐他们的身心。

16世纪初期，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葡萄牙人首先到广州叩关索市。1517年6月，葡舰8艘，载有葡王使者皮来资由马六甲起程，于8月15日抵达广东的屯门港，并强行驶入内河，直至怀远驿码头靠岸。《东西洋考》引《广东通志》曰：“佛郎机（指葡萄牙）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铙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所谓“铙声如雷，据葡人解释是向广州当局鸣礼炮致敬。葡王派皮来资来华，主要是想打开中国这扇紧闭的大门，以进一步通过贸易进行经济掠夺。中国的地方官对此事的处理十分谨慎，只接待皮来资及少许的随从进入怀远驿住宿，其余的人员令其随船驶回屯门等待。皮来资后来以朝贡为名，终于到达北京，但由于朝廷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再加上葡舰经常骚扰广东沿海，因此，这一次出现是以失败而告终。但葡人后来还是以曝晒水渍货物为借口，跑上了澳门搭棚居住，赖着不走，并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强占了这个地方。

明朝灭亡以后，清朝仍利用怀远驿进行朝贡贸易，接待外国使者到这里住宿。直到康熙年间，粤海关成立和“十三行商”垄断对外贸易。怀远驿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十三夷馆所代替。

（本文作者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

史彦

广州十三行的起源，有人认为起自明代嘉靖年间，也有人认为清代开海贸易后才有。然广州人民南路西侧的十三行街一带，却确实是清代十三行的旧址，至今还留有以当年十三行商号为名称的街道，如同文街、怡和街等等。而十三行自康熙开海贸易至鸦片战争爆发，这段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确实是垄断广州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的商业组织，故其在近古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苏的云台山、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漳州、广东的广州四个地方设立海关，开展海外贸易，规定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时，都要找行商代理，十三行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所以阮元《广东通志·政经略·市舶》记载说：“康熙二十四年开南洋之禁，番舶来粤者，岁以二十余桅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谓十三行也。”

由于十三行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业务，所以又称洋行，行商也叫洋商。行商真正发展起来还在乾隆年间。其业务主要有三项：第一项为外商交纳税及所有的费用；第二项为外商出售进口货物以及代买出口商品；第三项监督外商在华期间的一切活动及充当地方政府和外商之间的联络人员。即外商在中国的全权代理人。除了经营对外贸易的商务外，还负有

办理外交的责任。因此，又有人称他们为“官商”。实际上是半官半商性质。

所有的外国商人，在进入十三行后，都要遵守如下规定：

1. 必须寓居夷馆内，不得自由行动，每月可以集体组织往花地、海幢寺游览二三次。

2. 一俟贸易完毕，便须离开广州，禁止在省城过冬，如有未了商务，可在澳门居住继续办理。

3. 外商不得携带妇女进入夷馆。一切凶械火器，亦不准带进广州。

4. 每夷馆一间，无论居住夷人多少，只准雇用看门 2 人，挑水夫 4 人；每夷商雇看货夫 1 人，不许额外多用。其人夫保光，由买办负责，买办则责成通事保光，通事由洋商保光，层递钳制。

5. 夷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特禀，以肃政体。

6. 夷人不得乘坐肩舆。

7. 借贷夷商银两，应杜绝拖欠弊端；每年行商与夷商交易，买卖事毕后，令行商与夷商检查有无尾欠，分别报粤海关存案。

8. 夷商禁止在省河闲游，各夷人船到黄埔，或在省城澳门往来通信，只准用无蓬小舢板，不得用插旗三板船只。

外商在广州贸易，虽然受到诸多的限制，但前来贸易并在广州开设洋行者，还是有增无减。十三行的贸易，对当时中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十三行也是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的焦点，由于外国商在十三行夷馆经营肮脏的鸦片贸易，广州人民对此恨之入骨。广州地方官为了警告十三行夷馆内的外国鸦片贩子，曾于 1838 年 12 月在十三行街的商馆前广场上，处决了一个贩卖鸦片的中国无赖。外商



认为这样做是侮辱洋人的行为，于是在1839年2月，再于此地处决鸦片犯人时，外商便进行捣乱，致使处决犯人的工作无法进行。这消息传到广州市民的耳朵后，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上万的群众包围了商馆，用石头袭击夷馆的门窗，把每个商馆前面小围墙柱子拆下来，用作攻打之军器，大声呼喊，要消灭洋鬼子。这次群众性的斗争和示威，持续了整个下午，后来由广州地方官出面，才把事态平息了下来。此事给了外国的鸦片贩子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广州，雷厉风行地禁止鸦片，并于1839年5月驱逐以大鸦片贩子颠地为首的16名烟贩出境。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一度遭到沉重的打击。于是他们凶相毕露，利用船坚炮利的武器优势，挑起了震撼中外的鸦片战争。但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侵略者所吓倒，他们与殖民主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五口通商之后，英国商人在广州复市，以胜利者自居，招摇过市，横行霸道。1843年11月8日，居住在十三行内的英商，差人外出买物，竟然不给银钱，而且出言不逊，咄咄逼人。双方争执之后，仆人逃回馆内，纠集多人，持枪上街威胁寻衅。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入馆内，把所有的什物捣毁，晚上还放火烧毁行馆。由此可见，人民对侵略者是非常痛恨的。经过这场大火后，十三行也就寿终正寝了。

（本文作者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门户

邓端本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大部分是伴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而进行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门户。

## 一、早期中国科技的传播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科技外传的道路。

中国与印度是最早有文化交流的国家之一。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说：“中国数学对印度数学的影响却是无可怀疑的。赵君卿在2世纪注释《周髀》（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时所应用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论证，在印度巴斯卡拉（1150年）著作中再次出现。1世纪《九章算术》中的割圆术面积计算法，也在9世纪大雄的著作中再次出现。3世纪《孙子算经》中没有解答的难题，可在《梵藏》（7世纪）中找到。而《圣使》（5世纪）中的几何测量材料，则和3世纪刘徽的材料很相似。”虽然他没有在这里谈到传播交流的途径，但这些科技文化的传播，应当与海外贸易的交往有关。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也通过海运进行文化交流。762年，曼苏尔在奠定新都巴格达时说：“我们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接触到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土地，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供给的一切。”唐、宋时期广州的蕃坊，居住着大量的阿拉伯侨民，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和科技成就曾经通过他们传播到阿拉伯各地。

至于中国文化、科技成就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则更为巨大。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特别是广州）地理接近，因此，都慕名前来朝贡，学习中国文化科技。在今日的柬埔寨马德望和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发现的青铜器证明，古代扶南的青铜文化是从我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引入的。而马来西来的青铜文化，又是从扶南引入的。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发现有我国古代的青铜斧，在加里曼丹沙捞越河口的山猪墓山麓，发现有公元前112年我国古代钱币；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岛发现有我国的陶明器。在苏岛发现的陶器中有一个灰陶三脚鼎（香炉），它的底部刻有相当于公元前45年的汉代年号，这些明器的发现，表明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岛居民生活已深受我国风俗习惯的影响。607年（隋大业三年）常骏、王君政访问赤土国，赤土国王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说明赤土欣慕华风，愿意吸收中国之文化。《宋会要辑稿》载元丰五年（1082年）3月，三佛齐詹毕国主有“唐学书寄给广东转运副使孙迥”，说明该国有人学习和通晓中国文字。《诸蕃志》卷上《三佛齐》亦说：“国中……亦有中国文字，上表章则用焉。”到了元代，当周达观等人出使真腊时，著《真腊风土记》，记录其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丝绸、瓷器等25种物品，其中特别提到纸张、硫黄、焰硝、铁锅等。该国“12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

其合干支为一甲子，与中国无异，是从中国输入的。暹罗亦用 12 生肖，这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受中国的影响很深。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关于这四大发明对西方的传播，马克思曾经认为：是对中世纪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是对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总之，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中国造纸术发明于 2 世纪，8 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再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各地。于 1100 年传入摩洛哥，1150 年传入西班牙，1270 年传入意大利。

中国用指南针航海，从 11 世纪已经开始。朱彧《萍洲可谈》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由广州出航的远洋船舶，在 11 世纪末都用指南针导航了。从 12 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在航海中，亦学会了使用罗盘。欧洲人之知用罗盘航海，实得自阿拉伯人，他们使用罗盘比阿拉伯人要迟 3 个世纪。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当在 7 世纪中期。早期的印刷品，除佛像之外，还有佛经。宋庆历中（1041~1048 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这是中国活字印刷之始。印刷术之西传，起因于纸币印刷，大概在 13 世纪开始，西方亦学会印刷钞票。

火药一名，首见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 年）。但中国制造火药军器则始于唐末五代。1227~1250 年，硝由中国传入阿拉伯，1325 年阿拉伯人学会制造火药武器。翌年，意大利人亦能制造火药武器。

中国四大发明，除罗盘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外传外，其余的三种发明，按传统的说法，似乎都是从陆路传入阿拉伯国家。但这种科学、技术发明的外传，亦不能说与海上“丝绸之路”截然无关。因阿拉伯人除了从陆上与中国

取得联系外，也同时通过海路与中国贸易，而且通过海路前来的阿拉伯人肯定要比陆路的多。宋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已经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起而代之，而且越来越加繁荣。同时，这四大发明，大部分都是在宋以后才传播至西方的。因此，它的传播不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无关。由阿拉伯人苏莱曼撰写、最早介绍中国广州情况的一本书——《东游记》，曾记录了有关纸的应用情况。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义净于广州起程，西行求经，归途曾留室利佛逝达四年之久，为了译经，于永昌元年（689年）回广州取纸，同年又返室利佛逝。这就明显地说明，中国的纸亦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东西亚一带。众所周知，马可波罗回国时，是从海路乘船归去的。他的《游记》曾经被视为传播中国科学、技术的媒介之一。其中对纸币的介绍尤其详细。元朝的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亦多次提到元朝纸币中统钞在海外流行的情况，如罗斛（今泰国）“法以则子代钱，流通行使，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这些中统钞就是由中国海商（当然包括广州）携带出国的货币之一，故中国的印刷术亦不能排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

除了四大发明的外传之外，从1世纪至18世纪期间，中国的发明先后传至西方的还有龙骨车、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应用、水排、风扇车和簸扬机、活塞风箱、平放织机和提花机、巢丝机、纺丝机、调丝机、独轮车、加帆手推车、磨车、拖重牲口用的两种高效马具（即胸带和套包子）、弓弩、风筝、深钻技术、竹蜻蜓和走马灯、铸铁的使用、游动常平悬吊器、弧形拱桥、铁索吊桥、河渠闸门、瓷器、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发明（包括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前后索具和船尾的方向舵）等等。

这些发明的传播，肯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 二、早期佛教的传播

佛教自汉明帝时（1世纪）传入中国，南北朝时，始有佛教的传教士耆域由海道抵达中国，张星烺考证他登陆的地点是在广州，《高僧传》初集卷九亦有叙述他的行程，谓其在西晋初期，“自发天竺（印度）至于扶南（柬埔寨），经诸海滨，爰涉交广”。但他在广州没有留下什么遗迹。据《广东考古辑要》卷四十四的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有僧人迦摩罗，自印度抵达广州，建三归王仁寺。此寺现已不存在，后人考证寺址在今海珠中路西侧尚果里。但此僧人的行踪不见于《高僧传》。

能辑录于各种史志并有遗迹留存下来的早期东来僧人，首推昙摩耶舍。昙摩耶舍，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人，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航海抵达广州，首创王园寺（今光孝寺），建立大殿五间，并住在这里翻译佛经，发展僧徒。义熙中（408~413年）至长安、南京等地，宣扬佛法，翻译经典。宋元嘉中（438年左右）归国。据《高僧传》初集卷一所载，他在广州有徒众85人，有弟子名南康者，善梵汉语文，充当他的翻译，并帮助他译经。因此，这昙摩耶舍应是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佛教的先驱。光孝寺至今仍是广州佛教“五大丛光”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间寺院。

自昙摩耶舍在广州建立光孝寺这一佛教基地之后，外国僧侣至广州宣扬佛法者日益增加。南北朝时期，中国统治阶级大多数都是敬佛，更进一步鼓励僧人东来。其中循海道而来在广州登陆较为重要者，计有：

求那跋摩：罽宾国人，又名功德铠。曾在阇婆等地传教，名声远传至中国，宋文帝慕其名，令交州刺史将他请来，于宋元嘉元年（424年）由阇婆乘印度商人竺难提舶至广州。后来到南京，译有经典：《菩萨善戒经》、《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26卷，是将大乘律传入中国的重要僧人。他最后死在中国，据说参加葬仪的人竟达1万多。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从狮子国乘船达广州。后由宋文帝迎至南京，住祇洹寺。译出《杂阿含经》、《胜鬘经》、《楞伽经》、《相持解脱经》、《无量寿经》等。《胜鬘经》和《楞伽经》在佛教中有很大的影响。求那跋陀罗对佛经的研究有相当的造诣，故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孝武帝也以厚礼相待，是一个宣扬佛法颇有成就的高僧。

菩提达摩：南天竺人。本香至王第三子，为印度佛教28代祖师，传释迦牟尼衣钵者。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由南天竺乘船抵达广州，在今下九路西来正街登陆，并建西来庵。达摩后来到了南京，因与梁武帝话不投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多年，授徒传教，创建了中国的佛教禅宗，是为禅宗始祖。由于禅宗在佛教中很有影响，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最初登陆的地点称为“西来初地”。后来佛教僧徒还在这里建华林寺，为广州“五大丛林”之一。

拘那罗陀，又名真谛，西天竺人。梁武帝曾委托扶南国招聘名僧，真谛应聘于大同十二年（546年）到达广州。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病逝于广州。他在中国总计23年，其中在广州先后共12年，一共翻译了经书64部，凡278卷，为佛教摄论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传播至隋唐时期，达到了最高峰，特别是唐代，无

论是从印度东来或者从中国西去的僧侣，大都取道海上“丝绸之路”。

东来僧侣有名字可考者 29 人，内印度 20 人，于闐 4 人，康居、上火罗、龟兹、西域、爪哇各 1 人，其中由海道在广州登陆的著名僧侣有那提三藏、般刺密帝、跋日罗菩提、阿目佉跋折罗、般刺若等。

至于通过广州由海路西行求经，或求经后由海路归来的中国僧人，为数就更多了。最突出的为东晋高僧法显和唐朝高僧义净，尤其是义净，于高宗咸亨二年（671 年）从广州出发，经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往来南海凡 25 年，历 30 余国。695 年，携带了许多佛经梵本回到洛阳。晚年从事经书的翻译，并撰写了《大唐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除详细记载其行程的情况之外，还为西行求法高僧 60 人立传。据义净的介绍，这些西行求法的僧人，半数以上是从交趾、广州两地乘船出发的。

广州虽然不是古代中国的佛教中心，但广州也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基地。以上所讲的佛教人士，当他们由西往东至中国传教时，无不以广州作为跳板，先在这里译经传教，然后进入内地。因此，佛教在广东亦很普及，信徒不少，而且在唐高宗咸亨年间，竟然出现象六祖慧能这样的一位卓越的人物。

上面已经说过，达摩开创了中国的佛教禅宗，传至五代弘忍，弘忍为了选择法嗣，令门下弟子各抒己见，写成一偈呈上，上座神秀先书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当时的舂米行者慧能亦叫人代写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弘忍认为此偈写得比神秀高明，便把衣钵传授了给他，并指



定他为禅宗的接班人，是为六祖。那时教派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慧能承受衣钵之后，不敢公开传教，怕有杀身之祸，秘密潜回老家广东新兴，隐姓埋名 15 年，才于仪凤元年（676 年）来到广州光孝寺，混在人丛中听老和尚讲经。当时光孝寺有一个印宗法师，在佛教界中很有影响，他讲经时拥有僧徒听众 3000 余人。有一天，在讲经场中，忽然风吹幡动，僧徒就此事辩论了起来，有的说是幡动，有的说是风动。正在争论不休之时，慧能插嘴道：“风不动，幡亦不动，只不过是你们心动罢了。”此言一出，语惊四座，连印宗禅师也大为佩服，仔细询问后，才知道他是禅宗衣钵的继承人。当即拜慧能为师，并为他剃发受戒。至今光孝寺仍有六祖瘞发塔以纪念此事。而禅宗也因慧能在南方传教，分裂为南宗和北宗两派。

禅宗是以谈空说无为宗旨，即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人的感觉才存在。属主观唯心主义。在修行方面，禅宗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即众生心有觉悟即成佛。南宗对此解释得更为具体，认为佛教的修行不外乎净心和自悟，净心即屏弃一切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慧能这种“即心即佛”和“当机顿悟”的理论，“使得怀才自负狂妄骄纵的士人，名利薰心所求不能满足的贪夫，仕途失意满心烦忧和富贵内热需要饮冰的官僚，生活优裕自称隐逸的地主，这些人都愿意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又因禅宗所提倡的观点，与中国的老庄思想非常相似。“释迦其表，老庄其实”。故很容易为中国的士大夫所接受。再加上禅宗南宗废弃天竺佛教的许多烦琐戒律和经典，更增加了儒佛其得一致的可能。所以，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

至连反对佛教非常坚决的韩愈，最后在潮州时也与大颠禅师频频地往来。

由于慧能进一步开创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南宗，因此禅宗获得很大的发展，压倒了佛教的其他宗派，甚至传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成为唐代以后我国佛教的主流。

在此期间，岭南一带佛教传播也很快，记载鉴真行程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在谈到鉴真第五次东渡，被飓风飘流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时，曾受到岛上的佛教徒和地方官的盛大欢迎，行政长官冯崇愷护送他们从海南岛回大陆，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连续3日进行供养。崖州游奕大使（武职官员）张云出来迎接，“令住开元寺，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见《唐大和尚东征传》）。当鉴真等一行抵达广州时，广州都督卢奂亲率诸道俗出城迎接，“引入大云寺（即光孝寺），四事供养，登坛受戒。……采访使刘巨鳞奏状，敕留开元寺供养，七宝庄严，不可思议”（见《唐大和尚东征传》）。可见当时佛教在广州有很高的地位。

### 三、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

伊斯兰教的传入，与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关系。相传穆罕默德曾派他的母舅艾比·宛葛士来华传教，在广州登陆，首创怀圣寺、光塔。宛葛士后来死在广州，遗体葬于当时的芝兰湖畔，即现在兰圃附近清真先贤古墓。《明史》卷三三二也作了类似的记载，称宛葛士为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并说他在隋代开皇中已来中国传教。“干葛思”即宛葛士的异译，“撒哈八撒阿的”意为大宗师，言其在宗教中地位高尚也。

关于宛葛士其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湖南长沙的伊

斯兰教徒蓝煦著《天方正学》一书，卷七载有《旺各师大人墓志》，此旺各师即宛葛士又一异译，内容与以上之传说大体相同。著名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张星烺，在其所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记载，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柏雷狄斯，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获得古代汉文大字布告一张，此布告乃是从阿拉伯文中翻译过来的。里面叙述唐贞观六年（832年），宛葛士率徒三千，携《可兰经》来中国传教，并建怀圣寺。后来，英国人莫尔干将这张汉文布告又译成英文，刊载在1872年的《凤凰杂志》第三号。

但是，这些均是附会之说。日本汉学家桑原隲藏早在他的著作《蒲寿庚考》一书中指出：“干歌士（即宛葛士）事出于附会，其不可信学者均知之，无待喋喋。怀圣寺建于唐代，亦无稽之谈。”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亦否定伊斯兰教在隋时传入，他说：“‘隋开皇中’四字，见《旧唐书·大食传》。《旧唐书》本之贾耽《四夷述》。然此四字系述摩诃末先代之情形，非谓其教此时入中国。”

查回教元年为622年，正好是唐高祖武德五年。在此之前，伊斯兰教还未正式创立，那来的回教传入中国呢？因此，伊斯兰教从隋开皇中传入之说，应予否定。但陈垣肯定伊斯兰教的传入，当在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使节来朝之时，似乎又依据不足，因使节来朝与宗教传入不一定有联带的关系，伊斯兰教亦有可能在使节来朝前已经传入。盖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当时前来经商的阿拉伯人有很大的关系，是他们把伊斯兰教带了进来的。在唐初，已有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了，故伊斯兰教对中国的传入，虽然至今仍无确凿的文献可征，然其传入于唐初，亦是毫无疑问的。它最先传播的地方，大都是一些沿海的城市。

怀圣寺与光塔是伊斯兰教向广州传播的见证。怀圣寺和光塔建于何时？中国史料一贯都把它建设的年代，记载为唐代。

方信孺（南宋人）《南海百咏》番塔条曰：“番塔（光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实为十六丈五尺），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

郭嘉《重建怀圣寺碑》（元至正十年，1350年撰）曰：“世传自李唐迄今……历唐宋五代。”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二九曰：“怀圣寺在府城内西二里，唐时番彝所创。”该书还引黄佐（明代人）《广东通志》的史料，以证明怀圣寺、塔建于唐时，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众多史料中，方信孺的《南海百咏》引《历代沿革》的史料，应当说是遗存至今有关光塔史料中最古老的。《南海百咏》是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前的作品，是方信孺任番禺县尉时所作。《历代沿革》已散佚，故无法查证其创作年代及何人所作，但可以肯定，其成书当在《南海百咏》之前，否则，方氏便无从引证该书的史料。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在广州经商的阿拉伯人，绝少向中国人传播伊斯兰教。他们在侨居的过程中，只是在阿拉伯人中间举行宗教仪式，所以苏莱曼的《东游记》说：“我们从没有看见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是信回教的，或者是说阿拉伯语的。”故当时光塔和清真寺肯定不会是中国人所建，而为“番彝所建”无疑矣。《历代沿革》说寺与塔均为怀圣将军所建，这怀圣将军究竟是谁？在唐代的史书上查不到这个封号，只有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大食首领和萨来朝，朝廷曾封他为左金吾卫将军。

这是大食人在唐代唯一受封为将军的人，《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记载和萨受封为将军后，不久回国。因此，这怀圣寺和塔也有可能是和萨来朝时组织兴建的。其所以称怀圣将军，是怀念贵圣穆罕默德之意，并非称号也。

早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除广州怀圣寺之外，还有泉州的圣友寺，西安的东大寺和西大寺，杭州的真教寺，福州的福南街安泰桥清真寺，扬州太平桥清真寺，以及开封的文书寺等等，凡是通商比较发达的商埠，几乎都有伊斯兰教的传播，证明伊斯兰教与通商关系密切。

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把伊斯兰教传播之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一商贾之远征，二兵力之所届，三本族之繁衍，四客族之同化。”又说：“第一项为唐时中国始有回教及宋元时回教繁盛之原因；第二项为唐时中亚细亚各国及宋明时新疆各地改从回教之原因；第三项为元明以后中国回族繁盛之原因；第四项为在中亚及新疆之蒙古后裔改从回教之原因。”因此，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上，广州也是老资格的。

古代，阿拉伯侨民的华化，亦比较明显。阿拉伯商人抵达广州后，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敬孔子。《七脩类稿》引伊斯兰教徒的诗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唯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

据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的记载，北宋熙宁间（1068～1077年），程师孟任广州知州时，大修学校，并亲自授课，学生慕名而来。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侨居广州、泉州的外国商人，要求在蕃坊内建立学校；教育阿拉伯人子弟学习中国文化。

由于阿拉伯商人生活优异，经济实力雄厚，故其子弟大

都能够认真学习中国文化，有些还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唐代有大食人李彦升登科成进士。唐代进士须通五经，明时务，要求也很严格，李彦升能够通过进士考试而终于登科，证明其汉学根底深厚，学识衍博。五代时亦有波斯人李珣兄妹，成为著名诗人和学者。何光远《鉴诫录》谓其所吟诗句，往往动人。今《花间集》选入李珣的词作不少。他著有《琼瑶集》，所作《南乡子》17首，都是描绘岭南风物，说明作者的故乡在岭南。现录其一首以下：浣市敢，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歌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李珣妹李舜弦，亦工诗词，有《鸳鸯瓦上》诗一首，词藻艳丽，诗曰：鸳鸯瓦上瞥然声，昼寐宫娥梦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

李珣还著有《海药本草》一书，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用，可见他亦懂中医。

宋代蒲寿庚之兄蒲寿晟，官至梅州知州，亦擅长诗文，著有《心泉学诗稿》六卷，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而且获得很高的评价。他是阿拉伯人后裔中第一个诗人。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载，蒲寿晟居广州蒲宜人巷，这蒲宜人巷据后人考证，就是昔日蕃坊所在地。

伊斯兰教的传播，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善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并学习汉族的文化，他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与儒家的思想相结合，成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伊斯兰教。

#### 四、利玛窦来华及天主教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6世纪，最早传播的地方是广

东沿海一带，与中西海上交通和贸易有关，也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海外交通发展所出现的现象。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来华传教，只身抵达广东珠江上川岛，设法进入广州，岂料疾病缠身，很快便病死在岛上，成了天主教为传入中国而献身的第一人。然而，近400年来，中西文化之交流及中国天主教基础之奠定，实始于利玛窦的来华。

利玛窦，意大利人，是该国耶稣会的传教士。1577年，离开罗马赴东方传教，先至印度果阿，1582年乘船抵达澳门，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生涯。他先在澳门学习汉语，并在当时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的指导下，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等情况。1583年9月，他获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取道广州至肇庆传教。当时在中国传教是十分困难的，不但受到官府种种的限制，而且还遭到老百姓的反对，甚至无知小儿，亦不时地向他们扔砖头石块。针对这些情况，利玛窦采取了五项对策：第一，努力学习中国的文化，用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讲解经书，学习儒家经典。第二，赞美儒家学说，表示自己皈依儒学。他称赞孔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并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第三，广泛地接触和争取士大夫阶层，由于他学识渊博，很快取得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他的好感。第四，大力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从而提高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以取得知识界对其传教工作的支持。第五，翻译汉文书籍，直接把四书五经介绍给欧洲人，并以此扩大与中国知识界的接触面。

利玛窦在肇庆传教共6年。1589年，利玛窦越过大庾岭北上，到南昌、南京等地。1600年定居北京至病逝为止。在中国传教的时间一共是28年。可以说，他的事业是从广东开

始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又一高潮。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一书对他的活动作了如下的评价：“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因此，利玛窦来华之意义，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传播，其成就更多的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而且也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介绍给西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他的贡献是显著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天文与历算：利玛窦通过对天文历算书籍的译撰，传播了西洋在天文历算方面最新的成就，他还写信给欧洲耶稣会，请派优秀天文学家来华，帮助中国修改历法，故崇祯初年的修改历法，就是根据格里高里历法进行修改的，而修正后的新历法一直影响至近代。

第二，他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数学：利玛窦著《乾坤体义》二卷，上卷介绍天象，下卷介绍算术。明末，西洋数学最先译为中文的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译的。

第三，他传播了欧洲先进的水利学：利玛窦介绍欧洲水利学，著名的《泰西水利法》虽成书于熊三拔，但正如郑以伟在序言中所说，它实际上是熊三拔根据利玛窦的意志写成的。此书共分六卷，万历四十年刊行，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部分，全录此书。



第四，他传播了西方先进的舆地学：利玛窦除了介绍西方的地理学之外，还画了很多的世界地图，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所画的《山海舆地全图》，以及万历三十年（1602年）画的《坤舆万国全图》，使中国人获得了地理知识，第一次知道当时欧洲地理学界之新发现，开阔了视野，使中国社会眼光大开，看到了整个地球。

利玛窦的遗著有《天主实义》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辨学遗牍》一卷，《几何原本》六卷，《交友论》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西国记法》一卷，《测量法义》、《万国舆图》、《西字奇迹》、《乾坤体义》三卷，《二十五言》一卷，《勾股义》一卷，《圆容较义》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这些著作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其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为此，自利玛窦开始，在此后两三个世纪中，传教士竟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唯一的媒介。

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热潮，他们几乎都是从海路而来，先抵澳门后，再经广州至内地各省或京师传教。按照韩霖、张庚之《圣教信证》所载，当时西来教士凡91人。较为著名者有意大利人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孟三德、郭居静、龙华民、王丰肃、熊三拔、毕方济、罗雅各、杜奥定、贾宜睦、利类思、潘国光、卫匡国、殷铎泽、陆安德、利国安；葡萄牙人苏如望、罗如望、费奇规、阳玛诺、鲁德照、费乐德、伏若望、瞿西满、郭纳爵、何大化、孟儒望、安文思；西班牙人庞迪我、马奥图；法兰西人金尼阁、马约瑟、白晋；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波兰人穆尼各；比利时人柏应理、南怀仁、卫方济。

这些传教士都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主要骨干。但他们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有深刻的研究，除利玛窦艰忍不拔地钻研汉学外，还有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五经》，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大学》和《论语》，卫方济译《四书》、《孝经》、《幼学琼林》等，并以拉丁文介绍中国哲学。白晋在中国研究《易经》前后达6年之久，用拉丁文著《易经大意》（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马若瑟著《经传议论》，共分12篇。作者自称熟读经、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研究汉学凡十余年，是传教士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汉学家。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在欧洲的思想界中起了重要的影响。按照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所称：“18世纪，欧洲有所谓‘启明运动’，故被称为‘理性时代’‘哲学时代’，尊重理性，尊重自由，于是而产生反宗教运动。此一运动之来源，中国实多于希腊。”这就是说，欧洲哲学界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致使“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17世纪至18世纪间，欧洲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勃尼兹等，均受宋儒理学之影响。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说：“欧洲反宗教之哲学家，见宋儒以‘理’为最高而永久之法则，‘理’又附于物质，乃大为欢迎。”笛卡儿反对经院哲学，主张科学革新，提出“形而上学”学说，主张理性演绎法。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既有唯心论，也有唯物论。斯宾诺莎也是唯物论的唯理论者，他和笛卡儿一样，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主张唯理论。莱勃尼兹则创“单子论”，是唯心的唯理论者。而这两人都是18世纪德国启明运动奉为始祖之人物，正如方豪说的：“二人曾直接受笛卡儿影响，故间接即受中国影响。”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著名人物，如孟德斯

鸠，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为法律所下定义，即提出‘万物自然之理’，而谓‘有理斯有法’，则完全受宋儒影响”（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

## 五、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

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到了康熙末年，因罗马教皇与中国统治阶级之间产生矛盾，于是出现“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的皇帝硃批。在此后的120余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缓慢，无甚显著成效。到了19世纪初，才又由基督教的新教徒来华打开局面。1804年（嘉庆九年），英国传教士玛礼逊，取得美国国务卿乌第孙的支持，乘美国船由纽约出航，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9月抵达广州，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达二年之久，并通过翻译《新旧约》全书，编辑中英文字典等一系列工作，进行传教。他还在马六甲创办中文学校，交流中西文化。出版杂志两种：一为中文月刊，即《每月统纪传》；一为英文季刊。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玛礼逊后来死于中国，遗体葬于澳门。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一书中评价此人：“无沙勿略或利玛窦之方，但见解甚高，为人诚恳，心思专一，学识渊博……新教中罕见之人才也。”

1829年（道光九年），美国教会派遣阿拜尔及裨治文（即高理文）两人来华传教，并于1830年2月抵达广州。裨治文在广州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从事教务活动，是为新教对华传教之先驱。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是出版报纸和从事写作。1831年（道光十一年）他由美国取得印刷机一台，在翌年的5月于广州创办《中国丛报》（或译作《澳门月报》），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风俗、历史、文学及时事，以

向西方人士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国家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相标榜，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份刊物，撰稿者都是知名的传教士，如马礼逊、马约翰、郭士立、麦都思、巴驾、卫三畏等人。该报以每年为一卷，一卷十二期，一共出版了二十卷。裨治文还积极地把美国的情况介绍给中国人，用中文撰写了《美理哥合众国志略》，于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这本书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国人对西方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裨治文用中文介绍美国甚至是全球的情况，对那一时期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与世界，无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在国际资本日益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时期，传教士的活动是带有精神侵略的因素在内，但当鸦片输入掠夺中国大量的财富，而对封建的官僚机构也日益陷于瘫痪的危机下，一部分首先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寻求励精图治的道路上，看到了传教士们介绍西方的著作，眼界的确为之一新。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开眼看世界思潮，与那个时期的西学东渐，便有密切的关系。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林则徐魏源、梁廷柅、姚莹等人。广州就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把组织翻译外国书报作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途径。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了《外国史略》、《万国图书集》和《澳门日报》等书籍刊物，同时还根据有关翻译的外文资料，编成《四洲志》。虽然，林则徐搜集和翻译外国资料，是出于禁烟斗争的需要，但他这种力图通过了解和介绍外国情况，打破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局面，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四洲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为：“新地志之

嘴矢”。

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扩编为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并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大量摘引传教士的著作，如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培端的《地球推方图说》、玛礼逊的《外国史略》，以及《每月统纪传》杂志、《天下万国地理全图集》、《贸易通志》、《华事夷言录要》等书。当时在广州的广东学者梁廷枏，也多方搜集有关的资料，编成《海国四说》。《海国四说》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峇偶说》。梁廷枏编《海国四说》是直接受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启发。他本来早就想写一本介绍美国情况的专著，因资料缺乏，访行商、通事，均无头绪，当他见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时，如获至宝，喜不自禁，欣然命笔。他不但在书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与广州通商国家的经济情况，而且还夹叙夹议地介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情况，大胆地提出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见解。他在《合省国说》中说：“我观察美利坚合众国之政局所以稳定，经济之所以繁荣，主要是推行民主制度，总统也要按民意行事。”这与魏源称赞美国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的议论是相一致的，两人对近代资产阶级联邦制和议会制，都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说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已传播进知识分子阶层之中，并为他们所肯定。

受当时传教士思想影响而编写的另一本书，是《瀛环志略》。该书为福建巡抚徐继畲所编，此书是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的又一本极有影响的著作。在编著此书之前，徐继畲从中国旅行家、夷务专家、外国知情人和外国书刊中，大量搜集资料，也参考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因而在

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该书的内容。徐继畲也是倾向于西方民主的，他把美国的政治成就主要归功于乔治·华盛顿，把华盛顿比作中国的圣人。并在书中介绍了美国政治制度，从而得出结论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徐继畲还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美国人的成就，因当时美国还立国不久，在短短的一百几十年中，通过提高科学技术的途径，将荒凉的殖民地建设成具有先进工业的国家，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奇迹。

在鸦片战争前后，受传教士思想影响而编成的书还有《康輶纪行》（姚莹编著）、《中西纪事》（夏燮著）、《安吴四种》（包世臣著）、《圣武记》（魏源著）、《英吉利纪略》（陈逢衡撰）、《英吉利记》（肖令裕编著）、《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汪文泰辑）等书。在这些书中，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断地被翻刻，以致“家置一编，不胫而走”。而且还流传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所出现的开眼看世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因素，但东西方文化交流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提出的“师夷”，除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之外，还有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政治制度在内，为后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文作者生前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经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对西欧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黄启臣

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欧国家的传播和影响源远流长，但大规模、略具近代意义的传播和影响，则是在明清时期。因为明中叶以后，明清政府实行海禁，但对广州实行特殊政策，只准许中外商人在广州进出口贸易，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贸易港口同时文化传播的枢纽。因此，明中叶西欧国家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经商贸易的同时，大批的耶稣会士也纷纷随商船来到广州和进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这些耶稣会士传教的目的，当然是企图从思想上麻醉中国人民，为其殖民活动服务。但是，他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也不得不在广州及内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儒家经籍，努力了解中国的文化。“礼仪之争”使他们迫切了解中国儒家哲理思想，从而对中国儒家的经籍进行翻译和注释，以向他们的祖国传播。于是，中国儒家经籍流行西欧各国，掀起欧人研究汉学之风，并随之出现研究汉学的组织，使汉学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中，蔚然独树一帜，产生强烈而深远影响。

## 一、儒家哲学思想激荡着德国古典哲学

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澳门进入广州，到肇庆、韶关、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后，为传教需要，十分注意研究儒教、道教和佛教，崇拜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观。他们研究孔子的思想，翻译儒家的经籍，撰写解释儒家思想的专著，向他们的祖国介绍儒家的哲学思想。如比利时会士柏应理，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一书，共分四大部分：第一，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第二，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第三，孔子传；第四，《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本书既向西欧国家介绍儒家的经籍，又略举其重要注疏，便于欧洲人民接受。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济著《中国哲学》和翻译《四书》、《孝经》和《幼学》等，向法国介绍了他研究儒家哲学的心得。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勃尼兹，于1687—1690年间，在罗马邂逅结识意大利闵明我等一批从中国传教回去的耶稣会士，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一批中国儒家经籍资料，从此发奋研究中国哲学，于1697年写成《中国近事》一书，全面地向西欧介绍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高度称赞中国文化之伟大。他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在书中还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过欧洲哲学的，说：“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于是，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sup>①</sup>。莱勃尼兹汲取



了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又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沃尔夫把思辨哲学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皆可用数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沃尔夫的思维哲学为他的学生康德所接受，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非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在莱勃尼兹思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就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是受到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部分思想家如荷尔巴旭、波易尔、魁斯奈等人，经常从耶稣会士的报告书札中探讨中国儒家哲学的实质，从而受到中国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而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

## 二、重农思想对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中国以农立国，历代君主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这种经济思想传至欧洲后，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重农学派学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斯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从传至欧洲的中国古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于1767年出版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七章的篇幅系统介绍了中国文化。在第八章中列举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向中国学习。他说：“中国的法律是以自然律为依据的，无论从物质或道德方面看来，都是十分有益于人类的”，中国“在自然法上达了最高的成就”。他高度赞扬了中国的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要求法国政府改变轻视农业和束缚农业发展的现状，倡导“中国化”。他利用充任御医的

方便，极力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大礼”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均田贡赋的启示，主张法国应像中国一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所必需的赋税<sup>②</sup>。可见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之深。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继承和发展了魁奈的思想，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其他各种劳动所以能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为了更充分了解中国的重农思想，他委托在法国留学的两名中国籍学生（也是耶稣会士）杨德望、高类思二人回中国为他收集资料，其中有关中国的土地、劳动、资本、地租、赋税等农业经济资料 30 条，造纸、印刷、纺织等工艺资料 15 条；自然地理、物产等资料 7 条，作为他在法国进行财政改革的参考。杨、高回国后，汇编了《北京教士报告》出版，为杜氏改革法国财政提供重要的参考。杜氏最后写成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专著，系统地阐明重农主义学说，第一次在农业劳动领域内正确地回答了剩余价值问题。耶稣会士还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在中国收集有关中国的水稻、桑树、茶叶等农作物栽培的技术等资料寄回法国。钱德明还写了《中国乾隆帝和鞑靼权贵的农业观》一书，于 1770 年在巴黎出版，给重农学派以极深的影响。而此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到法国旅游，认识了魁奈斯和杜尔哥，从魁、杜两氏那里了解到中国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有关资料，吸收了中国的重农思想和运用了颇多的中国资料，吸收了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于 1776 年写成和发表了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评击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英国经济政策的改革起过重大的作用。

### 三、中国古典经籍西传欧洲国家

耶稣会士经广州入内地传教过程中，攻读中国古典经籍，并把中国经籍翻译成西文出版发行，使之在欧洲各国得以传播。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书名为《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这是中国经籍最早的西文译本。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印行。意大利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会士郭纳爵两人合译“四书”，把《大学》译名为《中国之智慧》，1662年在建昌出版。后殷铎泽又译《中庸》，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1666年和1669年分别在广州及印度果阿出版。1711年，卫方济以拉丁文翻译“四书”、《孝经》和《幼学》，由巴拉加大学图书馆印行。康熙末年，法国会士马若瑟节译《书经》、《诗经》出版。1752年左右，法国会士孙璋。翻译《礼记》出版。1770年，法国会士宋君荣翻译《书经》在巴黎出版。1834年，法国会士雷孝思翻译《易经》，由莫尔出版第一册，1839年出版第二册，名曰《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全书分三卷，第一卷用十一章讨论《易经》的作者、《易经》之价值及其内容，伏羲所创之卦、与五经之价值；第二卷为《易经》原名及注疏之翻译；第三卷为《易经》之批评。此外，还有雷氏拉丁文《易经》注疏第一卷评论》。现在梵蒂冈图书馆还藏有关于耶稣会上研究《易经》的中文稿本十四种，名曰：《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学外篇》、《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重）、《太极略

说》等。

## 四、中国语言文字的西传

耶稣会士为了研究中国的古典经籍和学习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以拉丁文编写了中国的文法书籍和字典，寄回欧洲出版，为欧洲国家的学者学习中国文化提供方便。例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编写的《中国文法》，开了中国文法西传的先河，现仍保存于格里斯哥大学亨得尔博物馆。1681年，比利时会士柏应理回国时，曾以此书指导德国医生闵采尔研读中国语文，闵氏又据此编写一本《汉文入门》在德国印行，为德国人学习中文提供方便。1728年，法国会士马若瑟在广州编著成《中文概说》一书，对于汉字之构造和性质进行详细的论列，举例达13000余条，成为西欧国家研究中国文字学的鼻祖。马氏以其书寄给法国学者傅尔孟校阅，傅氏又据此自编《中国文典》一书，于麻六甲英华书院印行，1894年香港纳厘肋书局重印发行。其书博大慎密，后有各国译本，至今仍流行欧洲各国。1685年，闵采尔还在德国出版《拉丁汉字小词汇》和《中国字汇式例与文法之建立》，至今仍藏柏林国家图书馆。1813年，法国驻广州领事德经，秦拿破仑之命编成《中法拉丁字典》，由巴黎王家印刷所出版，1853年重印于香港。1762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出版奥斯定会士P·Horatius della perma和Cassia us Beligatti di Macerata两人合著的《藏文字母》，以拉丁字母著西藏音。1773年，Beligatti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编著《唐古文及西藏文初学》，为欧洲国家学者学习中国藏族文化开辟了道路。乾隆时，法国会士钱德明编著《满洲语文法》，孙璋编著《汉蒙对照字典》，为

欧洲国家的学者学习和研究中国满、蒙文化提供了工具。

## 五、中国文学的西传

中国文学也随着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而向欧洲传播。1719年，在广州经商和居住多年的英国商人魏金森将中国小说《好逑传》翻译成英文（其中有四分之一译成葡萄牙文，后经英国文人汤姆士·潘塞改译成英文）于1761年在英国出版发行，连同书末附录《中国戏提要》、《中文谚语集》和《中国诗选》共四册，向英国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就。1766年由署名M的一位法国人译成法文，慕尔译成德文，使《好逑传》传播更为广泛，并被评为了才子书中的第二才子书。1732年，马若瑟将元初纪君祥著的元北曲《赵氏孤儿大报仇》一书译成法文，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于1734年在巴黎《法兰西时报》杂志刊登一部分，第二年，译本收入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的第三卷中。《赵氏孤儿》由于《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本（1736年）、德译本（1747年）和俄译本（1744年）相继出版而流行欧洲，风靡一时。1753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剧本《中国孤儿》，后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并将《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译编成剧本《埃尔彭罗》在德国上演，轰动一时，备受各界人士的赞扬。歌德还十分喜欢《好逑传》，高度评价中国像《好逑传》这样好的小说，他说：“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sup>③</sup>歌德还从1827年开始将中国抒情诗移植到德国，根据中国的一些诗意写成《中德季日即景》，诗中浸透着他对孔子、老子哲

理思想的仰慕，组成了中西文学在 19 世纪初的共鸣。

## 六、中国医学和植物学的西传

耶稣会士对中医学和中草药感到神奇而纷纷加以研究，并把中医学书翻译或编译传回他们的祖国去。1671 年，在广州住居的一名法国人将晋朝名医王叔和的著作《脉经》翻译成法文，名为《中国脉诀》，寄回格莱布尔出版。1658 年，波兰医生卜弥格写成《中医津要》一书，内容包括翻译《脉经》，和介绍中医以舌苔、气色诊病法，并列有中药 289 味。这本书于 1688 年出版后，译成欧洲各国文字相继出版后，流传极广。从此，中医学成了欧洲人的一种新知识，传诵一时，上述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便是中医专辑，共译出《脉经》、《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必录》、《医药汇录》等著作和许多中医处方，介绍中国医学的独特医术。从此，欧洲人掀起学习中医知识的热潮，给西欧近代医学、动物学、植物学和进化论以深刻的影响。19 世纪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著《人类的由来》一书时，就引用了清初翻成德、法、英、拉丁、俄文译本的《本草纲目》一书中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资料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问题。他在另一本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第二章《人工选择》中，也一再提到“上一世纪耶稣会士出版的那部主要是辑自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伟大著作（指《本草纲目》）”<sup>④</sup>。据统计，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提到中国中医学和植物学的达 104 处之多<sup>⑤</sup>，说明中国医学和植物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甚大。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来广东和北京后，很留意中国的实用植物学，他潜心研究靛青和用槐花作黄色染料，

并于1747年把资料寄回法国。韩国英在中国曾注意研究中国的动物、植物，积极采集中国植物标本，其中在澳门采集144种，在内地采集149种，于1780年寄回法国，现在仍保存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约瑟夫最早把广东的荔枝引进到法国去种植。中国的柑橘树亦由葡萄牙耶稣会士移植到里斯本圣洛伦公爵邸宅种植。中国的植物嫁接技术资料也在这个时期传到欧洲，使18世纪欧洲园圃面貌焕然一新。

## 七、中国工艺美术的西传

16至17世纪，经广州起航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中国丝织品、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品，深受欧洲各国的欢迎和称赞。特别是各国君主均酷爱中国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命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来广州订造标有法国甲冑纹章的瓷器，在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德国一些罗科科式的宫殿也以收藏华瓷炫耀一时。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更醉心中国瓷器，在宫内专设玻璃橱陈列各式华瓷。有鉴于此，欧洲各国纷纷掀起仿造中国瓷器的热潮，并有专家对瓷器进行分析研究，撰著专书加以阐释和宣扬，使中国的工艺美术得以在欧洲广为传播，深为影响。1677年，法国人查尔定在希撒诺开设瓷厂，仿照中国瓷器工艺，制造出青花软质瓷。1717年，在江西传教的耶稣会神父殷宏绪，将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和开发瓷土，1768年发现了类似景德镇高岭土的瓷土层，即设塞夫勒瓷厂制造出硬质瓷器。英国于1750年在斯特拉福设立鲍瓷厂，生产出第一批软瓷。1768年又在博屋设立“新广州瓷

厂”，招收工匠 300 人，利用从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仿制出中国硬质瓷器。这批瓷器把崇尚超脱、纯朴的中国彩色花纹工艺和罗可可艺术风格结合起来，浑然一体。此后，广州还特制具有中西工艺风格的瓷盘外销，周缘按等分绘四种不同的五彩图案；供欧洲国家主顾挑选定样加工。所绘题材有纹章瓷，神话、宗教和风俗画中的人物画，船舶图和花卉等。1974 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纹章瓷》一书，便收集了 2000 多件纹章瓷图片，供英国以至欧洲国家的军团、贵族受勋、喜庆典礼之用。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不断仿制中国漆器。例如 1730 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独家仿制中国漆器，以蓝、红、绿和金色为底色，以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和牡丹、花鸟为图案，深受法国人酷爱。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邸宅的漆制家具全用此种有中国工艺特征的作品。在华耶稣会士汤执中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漆器工艺美术，于 1760 年发表了《中国漆考》论文（载《法国考古文献学院集刊》第 15 集），附有中国精美漆器图片。中国漆器（特别是福建的漆器）在英国也十分流行而时靡。商人在广州将大块漆板贩运英国后，改制成屏风，甚受欢迎；甚至有将家具从英国运到广州上漆的。18 世纪的英国上层妇女以学绘漆工艺美术为时尚，绘漆竟成为女子学校的一门美工课程。1680 年后，英国家具制造商开始仿造中国漆器家具的色彩和图案，制造出一批中国式的家具。著名家具设计师汤姆·齐本达尔和海普尔华特设计和制造的橱、台、椅等家具，全部模仿中国式样，采用上等的福建漆，绘刻龙、塔、佛像和花草等图案。齐本达尔于 1700 年引进福建漆檀木椅，后又模仿中国竹节家具，设计和制造出雅致的屏风<sup>⑥</sup>。18 世纪英国的家具被称为齐本达尔时代，直



至今天，还可以看到英国家具保存着中国风格的痕迹。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到中国考察后，于1757年写成和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集》一书向西欧国家系统地介绍和宣茨墙纸。1688年，法国仿制中国墙纸成功。1734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新法制造墙纸的专著，系统介绍中国墙纸的世艺美术，英国虽然能生产墙纸，但工艺仍逊色于山水和人物图案，甚受英、法等国家顾客的欢迎。不久欧洲也仿制各种中国墙纸，产生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的墙纸。1688年，法国仿制中国墙纸成功。1734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新法制造墙纸的专著，系统介绍中国墙纸的工艺美术，英国虽然能生产墙纸，但工艺仍逊色于中国墙纸。所以直至1766年，英国还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大批中国墙纸供应英国需要。今天伦敦古斯银行客厅内还保存着英使马卡特尼觐见乾隆皇帝后带回去的花墙纸，上面绘有302个各不相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表现了中国极高的传统工艺美术。中国丝绸的工艺美术更为欧洲国家的妇女所羡慕。特别是刺绣工艺在罗科科风行时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毡而代之。1573年，法国里昂已由意大利人佩蒙特创办作仿生产丝绸。直到18世纪，里昂生产的丝绸仍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

## 八、中国绘画和建筑艺术的西传

中国绘画和建筑艺术对西欧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工艺美术。明清时期，中国的山水、人物画成为欧洲著名画家的摹本。例如，法国最杰出的画家华托的作品景色，常常仿照中国画那种黯淡的流云和纯朴的山景构成画面中烟雾迷蒙的韵致，被人誉为深得中国作画六法之佳作。他所作的《孤岛帆

阴》陈列在卢佛美术馆，更是一派中国绘画风格。其他具有中国画情调的画家还有倍伦、基洛、彼里门等。英国著名画家柯仁的水彩画亦深受中国画风的影响，他的设色山水，与中国画毫无二致，常常用棕灰作底色，再涂上红、蓝二色烘托。他作画时还仿中国画家好用毛刷蘸色和墨，以墨草图，使水彩画在欧洲初期发展时，显出了特色。其学生特涅等人的人物水彩画，亦继承他的笔法。另一位著名画家康斯保罗的作品也深受中国画之影响，其杰作《绿野长桥》，洒脱而出，一如中国的江南风光。直到19世纪，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仍然受到中国画风的感染，常用中国的墨泼法作画。其中莫里斯尤以模仿中国瓷器工艺美术画见长。

中国的建筑艺术和风格在西欧国家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中国的庭园艺术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风格更是使欧洲的布置呆板、单调的园囿，建筑大为逊色。因而使欧洲国家纷纷仿照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建设房屋和园囿蔚然成风。德国华肯巴特河旁边的费尔尼茨宫，开了按照中国式屋顶建筑的先河，以后德国波茨坦和荷兰、法国、瑞士等国家也多竞相修筑中国式的钟楼、假山、石桥和亭榭。上述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在他所著《东方园艺》一书中，高度赞美“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象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0年，他为丘城设计一座中国式庭园——丘园。园内有湖，湖中有亭，湖旁有耸高163尺的十层四角形塔，角端悬以口含银铃的龙。塔旁建有孔子楼，图绘孔子事迹，一派中国建筑风格。1763年，他把丘园的建筑撰写成专书《丘园设计图》出版。另一建筑师哈夫佩尼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庭

园建筑艺术。使中国庭园建筑在英国日臻完善，被誉为“中英式花园”。1773年，德国派出园林设计家西克尔亲到英国研究中国庭园后，于同年出版了温塞所著《中国庭园论》，以示德国对英国新兴的中国式建筑应迎头赶上之意。此后，卡赛尔伯爵即在威廉索痕建筑木兰村，村旁小溪起志用中国名字吴江。村中一切建筑风格和艺术均模仿中国，俨然江南苏州园林。中国庭园建筑艺术对德国的影响也跃然可见。

## 九、中国风俗的西传

随着中国茶叶从广州出口贩运至欧洲国家后，中国饮茶的风气也传至欧洲。1610年，荷兰首先兴起饮茶的风气，1636年普及至法国巴黎，1659年在英国伦敦成为社会习惯，1659年传到莫斯科。17至18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生活习惯，每年从广州运去茶叶达2万磅，19世纪初增至2000万磅，茶已成为英国人不可缺少的日常饮料，而取代了巧克力。

由于中国轿子贩运至欧洲，乘轿也成为欧洲人的习惯。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贵族官吏出行均兴乘轿。轿顶围帔的材质和色泽，按等级严格规定，以示身份、官职的高低；轿身均以漆绘，流行中国牡丹、芍药等花卉，乘轿者多是贵妇人。与中国不同的是，抬轿夫不用肩荷，而以手举，法语说是“抬椅”。“抬椅”习惯还搬上舞台，1659年出版的莫里哀的喜剧《风流妇女》即为例子。“抬椅”在德国、奥地利一直都很流行，直至1861年，德国还保存有禁止仆役乘轿的法令，可见中国乘轿之风影响至深。

从上述所述，显而易见，在16—18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经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国家是非常广泛的，影响是

极为深远的。在这中间，一批耶稣会士翻译、编译和编著大量的中国古典经籍和著作传至欧洲国家出版发行，实是起了重要的传播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 200 年期间，耶稣会士所译、编、著中国书籍者不下七八十种。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广州建筑与海上“丝绸之路”

邓其生

广州建筑是岭南建筑的发展中枢。它的风格特点的形成，不仅在于汉族与原南方少数民族（包括楚、越、瓯等族）的交融渗透过程，而且凭靠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贸易交往，不断地吸收了中亚、波斯、印度、南洋、阿拉伯、欧洲等建筑艺术成就，博采外域建筑经验，使自身逐步获得新的生机。

广州建筑与外国建筑较大的接触共有四次：一是汉至南北朝时期；二是唐宋时期；三是明中叶至清初；四是鸦片战争以后。每一次接触都或多或少增添了新的发展因素，创作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兼容性，但主流还是中国式的。在对中原传统建筑游离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有所谓“岭南建筑”之称。

## 一、东西方文化的初次海上沟通

据《汉书》记载，广州与海外交往是从秦汉开始的，当时主要是阿拉伯人把波斯湾一带的香料运来广州贸易，广州汉墓中普遍发现有陶熏炉。象岗山南越王墓发现的银盒，正是历史的见证。苏门答腊与爪哇古墓中发掘有五铢钱和汉陶，也是互相文化交流的佐证。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派使者来广州亲善访问。同年,西竺(印度)僧人迦摩罗来广州传授佛教,建三归、王仁两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来广州建王园寺(光孝寺),奉敕译经。南梁普通八年(527年),印度僧人达摩来广州,建西来庵(华林寺),为中国禅宗之始。这些寺院原形均已毁变,无可考,但在广州后来的佛教建筑中仍留下当时的影响,也是印度建筑在广州的影子,如在建筑装修中常用佛教八宝的母题:莲花、相轮、卷草、宝珠、孔雀等图像多来自印度;塔的形制和式样也是印度窣堵波的演变;建筑部件的须尔座、力士、壁画、佛龕、壶门、藻井等多来自佛教的影响;佛像的雕法与摆布,庭园方池,菩提树的种植,无不与印度文化传入有关。

始建于梁大同三年(537年)的庄严寺塔(六榕塔之前身),即为昙裕法师埋藏其从印度带来之释迦舍利而建的,说明广州作为佛教初来地位之重要。据史载,在此期间,印度商人留居广州出家和从艺的人亦不少,无疑对广州建筑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毵毵毵毵毵毵毵毵

## 二、盛唐帝国大胆吸收外来建筑文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最兴旺时期。据《历代职官表》载,唐大历四年(769年),一年就有40多艘外国大船来穗,广州市场商贾云集,熙熙攘攘。来广州的外国人除商人外,还有僧侣、留学生、使节、观光者。由于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外国人大批长期留居广州,称之为“蕃客”。唐代政策还许可他们与唐人通婚、开店、入仕当官。为管理方便,还在现光塔路一带

设置“蕃坊”，内有蕃宅、蕃市、蕃学、蕃仓等，这些建筑多由蕃人设计建造，建筑形式估计多为适应他们审美的蕃式，光塔就是一个见证。

怀圣寺光塔的建造年代，大约在唐天宝年间，相传是阿拉伯传教士阿布·宛葛素来华时为怀念穆罕默德而建的。大唐官府在当时，除要求外侨遵守中国法律外，还允许他们按原回教生活风习建造寺院。现存保留下来的光塔全然是阿拉伯建筑形式的移植，古人亦称它是“中州所未睹”，“取制天方”。其外形采用光滑的圆筒体，结构采用双旋梯绕塔心而上登平台，塔顶立金鸡……等，都是与中国传统塔式大不相同。寺内大殿布局采用朝东开门，有浴室净身，无神像，用阿拉伯文装饰，无动物形象及用木地板等，均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增加了广州建筑发展的新因素。在桂花岗的清真先贤墓采用方平面穹窿顶的结构，亦是别开生面的。据《南海百咏续篇》载，怀圣寺“拜殿之式有类穹庐”，现今拜殿无疑是经多次汉化而成。据宋岳琦《桡史》记述宋时蕃坊内有好些楼房，“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这些都是阿拉伯建筑、园林形式输入广州的见证。

南海神庙是隋开皇中创建的祭祀海神的祠庙。唐宋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此庙成为海内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据点。它地处广州外港的黄木湾（扶胥镇），外国船只进广州前必暂停在这里。传说波罗国（南印度）商人曾带两株波罗树种植在这里，故又称波罗庙，这说明庙与印度商人交往之密切。它又是航海安全的精神寄托，是中外海员的游览胜地。庙的布局虽然是唐制，然庙内曾置达奚弦通像，其形态、塑作手法、动作等却深受外来的影响。

唐宋时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外交礼仪需要，还出现过海山楼（在今北京南路）和共乐楼（在今南濠街）等外事建筑。它们都建在外商泊船的码头处，雄踞江边，楼下是外贸市场，楼上是作为接待外宾、宴会娱乐的地方，市舶使也住楼内。宋·程师孟描写当时内港码头的诗云：“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现存光孝寺南汉铁塔，是广州最古的铁塔，其造型深受印度的影响。塔建于大宝十年（967年），四角七层，遍塔布满千佛，佛形象有浓厚的犍陀罗味，檐下飞天、卷草，须尔座形式与构作等，可明显地看出它是脱胎于印度。在唐宋间，有许多外国著名高僧经海上来广州传教说经，把印度建筑形式带来广州这是事实。

外国商人捐款修道教庙宇的事例。据镇海楼现存《重修天庆观记》云，天庆观原址在海珠北路祝寿巷，皇佑四年毁于火。宋英宗年间，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遣使来穗，见天庆观残垣断壁，出于亲善，特派思离沙文主持重建事宜，于元丰二年（1079年）完工，重建后的天庆观极富丽堂皇，“规模宏伟，焕若洞府。”

### 三、扩展与海禁交替时期西洋建筑的传入

元代王朝推崇回教，阿拉伯商人来广州者甚众，其他国家商人来华后信仰回教者亦不少，回民居住区也在扩大。据元代《重建怀圣寺记》可知，元代是广州回教又一兴旺时期。元人陈大震在《南海志》中指出，元代广州的驿馆有二：一是设在蕃巷的怀远馆；另一是设在冲霄门外的来归馆（现今文德路工人文化宫附近）。宋代的共乐楼亦改名为远华楼。



明洪武初，朝廷对广州的外贸亦颇重视，后因为防止外商支持沿海地方割据势力抗明而实行海禁。明永乐年间，国力强大，才取消海禁。《广东通志》云：“永乐四年（1406年）置怀远驿于广州蚬子步（在西关十八甫路），建房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隶市舶提举司。”在此时，来华之阿拉伯商人已减少，欧洲早期殖民主义者已逐步增多。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吉利人先后踏上了广州的土地。这时欧洲正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文艺复兴时期。从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亦随之直接影响到广州。永乐年间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中国文化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和东非等地，至今南洋还有纪念郑和的中式庙宇。

明中叶至清初，广州沿海遭受到两股外国势力的侵犯（即来自日本的“倭寇”和西方的“蕃舶”），抵抗和海禁又反复了多次。朝廷一方面希望通过广州的外贸来增加税收和满足上层消费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害怕动乱，因此只好采用限制政策，不允许外商入广州内城。在此期间，毕竟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晚期，与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比较已暂落后，但自大的民族自尊心还很强，对西方建筑的传入多抱好奇和抵制兼有的态度。

据《明史·佛朗机传》载，西欧最早直接来广州交往的是葡萄牙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葡萄牙人依仗其先进的炮舰，强行闯进了东莞和广州，“久留不去”，“筑室立寨”，遭明兵击退后，则采用贿赂贪官的手法，租占了濠镜澳（澳门），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此建立了中国第一块殖民地，大兴土木，按西方建筑形式建“夷城”，雄踞海滨的城墙高耸，炮台林立，城内洋楼夷馆成片。现存的青洲山上的三巴天主教堂遗迹是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葡萄牙人

兴建的，《明实录》云：“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国梵刹比。”其形式完全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手法教堂建筑的搬样，堆砌的倚柱、壁龛、山花、涡卷等等，体积是起伏和光影的变化完全是西洋的格体，为当时的中国人不能接受，有些官民曾准备捣毁这座建筑。但无论如何，它开始了西欧建筑输入中国的先河，影响甚大。

明王士性所著的《广志绎》亦说：“番山嶼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浣泥、暹罗、真腊、三佛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层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矣。”这些永久性的洋房，“雕楹飞甍，栉比相望。”正是殖民建筑在中国传播的实录，而且成了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国际商埠。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由这里转经粤西、粤北等地进京，实现了中国又一次与西方的文化大交流。

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人开始依仗其“巨舟大炮”而招摇广州。此后经过多次与广州地方官员的较量，终未能实现其侵略野心。只能在朝廷控制下的十三行（清闭关锁国政策下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街）里进行少量的正常买卖。明末清初的十三行建在广州城南外沿珠江一带（即今十八甫之南），是政府指定的半官半商性质的受约束监视的商行机构。十三行建筑沿江岸码头展开，基本是洋式，故称十三夷馆。沈复《浮生六记》说这些建筑“结构与洋画同”，估计是商行买办请洋人设计建造起来租给外国人用的。梁嘉彬《十三行考》云：“夷馆结构备极华丽，墙垣甚为高厚。”从现存图片和外国人的描述中，可大体知道其建筑形象如下：（1）建筑多为两三层，成排独自布局，外形多为迴廊联拱式（谓殖民

式)；(2) 下层多为厨房、仓库、仆人房、接客房，二楼多为帐房、客厅、办公室等，三楼多为洋人卧室和金库等；(3) 夷馆前多有广场，大的商馆还有内花园、宴会厅、贵宾室等……(参见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在鸦片战争前后，十三行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又经过乾隆、道光几次火灾和战争洗劫，元气大伤，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年)在英帝攻占广州时，“纵火焚烧夷馆，洋行亦被灾及，尽成焦土”。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西洋建筑毕竟是极少数的，对这些建筑只作为外国风情来观赏。许多人出于民族自尊心或夜郎自大的心理，把这些西洋建筑看作是鬼楼。叶詹岩的《广州杂咏》诗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康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

#### 四、崇洋自卑与大规模传入外国建筑形式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腐朽至极，民族自尊心大为丧失，几千年来传统的木结构体系和古老的形式受到西方建筑文明的挑战。故此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西方建筑的传入，广州的城市面貌随之改变，半殖民地建筑成了广州建筑的主流，临大街建筑大多西化，小巷居民虽仍保持着传统竹筒屋的形式，而新开发的城区就开始了大片建造洋楼。

近代广州建筑形式受外国影响最大的是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公共建筑和沿街商位建筑(骑楼式)。这些建筑有的是外国人直接设计的，有的是留洋学生回国设计的，也有华侨与传统工匠在学习西洋建筑样式时，结合传统工艺和本地功能需要而营建的。从建筑思潮而言，有的是盲目崇洋搬弄洋式；有的是以民族建筑为本，把洋建筑套为己用；有的是

完全把洋式建筑移植而来；有的是把中外建筑折衷凑合而成者。

广州一德路的圣心教堂（石室），建于1863~1888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作为赔偿，按法国水师总镇谷芳德、法国会理华洋政务总局正使司大努安与清粤总督劳崇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租地上（被军炮轰毁的两广总督府旧址）建造起来的，设计与最初领工均是法国人，后由揭西工匠总管建成。其建筑形式完全是法国哥特建筑的移植，是巴黎圣母院的发展。教堂属罗马系派天主教，由礼拜堂、传教士住房、习教学校、普济医院和育婴堂等组成，建筑规划富理性，体现了西欧文艺复兴以来一种人文主义思想；结构为石砌拱肋砖穹窿，用飞虹作斜撑。拔地而上的两端尖塔，高达58.5米，强劲的扶壁上之蓬勃向上的尖亭尖阁，幻憬着天国的美好，表现了法国哥特建筑艺术的壮丽宏伟。它的输入，给广州建筑增添了异彩。

1834年以后，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无与匹敌的霸王，强制对广州推行鸦片贸易，终于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据中国战败后所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广州就成了任由帝国主义横行的商埠，他们在广州开商馆、设船坞、建教堂、立银行。随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857年占领了沙面（原为拾翠洲）。1859年强租沙面，把东部定为法租界（53亩），西部定为英租界（211亩），开始在这里建造楼房商馆，据《南海县续志》云：“咸丰九年，运石中流沙填海，谓将建各国互市楼居也。”这里就成了外国人控制下的新“十三行”了。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兰等国都先后在这里设商行。沙面租界工程于1870年基本竣工，其布局、绿化、道路、建筑形式均为外国的翻版。这里环境幽

雅闲适，“维多利亚酒店”（现胜利宾馆）装饰堂皇，西方古典主义外表端庄凝重，古典柱式，卷拱门楼，山花雕饰等均再现了西方当时建筑情调，这无疑是当时帝国主义在被侵略国土上的自我炫耀。不过，它也无疑是丰富了中国建筑创作的思路，增添了建筑设计的辞汇，特别是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的传入，以及建筑设备的科学化，对中国建筑发展的确是起了推动的作用。

广州沿街“骑楼”式店铺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建筑形式，它的初胎可能是南方为防雨、防晒所形成的檐廊（粤北、湖南、四川均有）。西方联拱柱廊的传入，结合城镇交通、安全、买卖等功能的需要，而创造了这种富有岭南特色的建筑形式。因为它具有商住建筑性质的门面，故各尽标新立异之能事。古希腊罗马柱范、阿拉伯之穹顶、哥特之塔尖、巴洛哥之曲线、西班牙之窗户、意大利之钟楼……等五花八门，集锦了西洋建筑之大成和小品。沿街望去，“洋”中有“中”，“中”中有“洋”，“中”与“洋”的冲撞与调节，这就是广州城市店面的特色。

广州在唐代已有入沿海上“丝绸之路”到南洋和西亚侨居。鸦片战争以后，在输入鸦片的同时，还输出了劳工，据有关《华工出国史料》统计，仅在清道光年间（1850～1875年）就有128万华工被拐骗出国。另外还有不少是出外经商和留学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这些海外赤子带去了中国文化，也带回了外国文化。华侨回乡建房，也常把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带了回来。如花县坪山勳庐（读月楼），是1926年美国旧金山某华侨按西式建筑建造的，高五层，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顶层有四角炮楼，中有尖塔顶，用梯间并联式平面，全然是西欧寨堡风情。在广州东山市郊建造的华侨住

宅，不论在平面空间上，或外表造型上，多数是西化了的。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外国有什么建筑形式，广州也很快地出现了这种形式。古典复兴式、浪漫主义式、草原式、西班牙式、西亚式、现代派、中西合璧式，应有尽有。

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在反封建过程中得到国外华侨的大力支持。西方的现代文明和民主，始终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精神支柱。孙中山先生亲自在1892年设计的“故居”，就是一栋二层联拱廊式的洋楼。辛亥革命成功后所建的一些纪念性建筑，也多为洋式。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朱执信墓、邓仲元墓等，从平面布局至外观造型，均采用西式，其他装饰手法和内容亦一反封建传统旧式，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932年建的沙河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墓之凯旋门、墓碑、墓表、墓廊等全然用罗马复兴式，宏伟壮观，是借西方建筑形式表达纪念性内容的成功作品。

近代广州是东方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现存的长堤海关、银行、邮局、商行、百货楼……等多为外国人设计、建造和经营，建筑形式无疑是西洋式。如沿江路广州海关，建造于1923年，其厚重坚实的台基，雄壮的仿古罗马式双柱廊，高耸的山花和钟楼，充分体现了金融建筑的性质，这对于单调的中国封建建筑类型来说，应该是一种突破。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人民的耻辱，然而外国建筑形式的输入却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现存人民南路的新亚酒店、新华酒店是1919年由留英学生杨鐸宗设计的，分别为希腊复兴式和英国尖顶拱哥德复兴式，原都为七层。长堤的十三层爱群大厦，是1932年由留美学生陈荣枝、李炳垣设计的，采用芝加哥学派建筑手段，用混凝土钢铁框架和简明有韵律的窗户相结合的样式。这是广州近代第一座高层建筑。这些建筑的保存，正是西方近代第

一座建筑文明东传的历史见证。在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到中国来贸易和殖民，同样把中国建筑带到外国，特别推崇中国的造园艺术，出现了所谓“东方情调”的先浪漫主义建筑。如在伦敦由钱伯斯为王室设计的克欧花园则是其中一例。

在漫长的广州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交流促使了广州建筑的演变与发展，“岭南建筑”的形成是和历史上的开放分不开的。国际建筑间的信息交往丰富了各国建筑的技术与艺术，世界建筑是属于世界的。

(本文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教授)

# 海上“丝绸之路”对教门习俗的 形成和影响

杨 棠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系大食和波斯的蕃商，航海到南中国海进行香料等贸易的路线，故亦称“香料之路”。它是中国和阿拉伯文明古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它揭开了东西方海上交通史的篇章，还给我们传来了一些异国的风情习俗，播下友好交往的种子，在各国人民精心培育下，曾开过芳香灿烂的花朵，为各国的文化园地增添了奇香异彩。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的至圣穆罕默德（571～623年），创教伊始，即训示其门徒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跟着就有一些信教的蕃客，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一方面向中国学习，一方面来华传经送宝。唐朝皇帝也以仁相待，任其往来。

《全唐文》卷七十五载：“南海番舶，本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爱，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存加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

由于阿拉伯人仰慕中国，而唐朝又实行优惠政策，所以很多蕃客接踵而至，大食商人苏来曼在其游记中说：“广州是番商汇集处，中国皇帝派有回教徒一人，办理前往该处经商



的穆斯林事务，每当节期，就由他领导大众行祷告礼……”。可见唐时广州已有“众”多的回教徒了。

回教古称“大食法”、“天方教”，又称“回回教门”或“清真教”，今称伊斯兰教。是公元七世纪唐贞观年间，通过“丝绸之路”或说“香料之路”传入我国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起点，也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城市之一。伊斯兰教的传入，就开始孕育和形成我国的教门习俗了，所以教门习俗与海上“丝绸之路”是息息相关的。它既有伊斯兰教的色彩，也有回回民族的特征。

今天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的穆斯林，就是继承其先祖蕃商们所奉行的伊斯兰教和有关习俗，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意识观念，表现在饮食起居和礼节仪式等方面别具一格。但这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没有回族先民的渡海东来，就没有我国的伊斯兰教门习俗，就没有今天伊斯兰教的礼节仪式和回族的文化心理特征。

伊斯兰教的教门习俗集中表现在“清”与“香”两个方面。“清”即清洁卫生的清真饮食习惯；“香”即香业世家的喜用香料传统。这些习惯传统，至今仍有广泛而深远影响。

## 一、教门习俗中的饮食习惯

今天沿海各地的回民饮食习惯，基本上是沿袭大食法中《古兰经》的有关规定而逐渐形成的。《古兰经》提倡饮食卫生，禁猪禁酒，不食“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野兽吃剩的动物。”<sup>①</sup>这是教门饮食习惯最大的特点。

杜环的《经行记》是我国最早记述大食法的文献曰：“……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魏源《海国图志》载：“……不食犬、猪肉、无鳞鱼，谓之色目回回教门。”《广东丛书》卷三也说：“非同类杀者不食，不食猪肉，谓之回回教门。”

此外，教门饮食习惯中还喜爱一种独特的食品——“教门油香”。这种油香，最晚也于元代传入我国，“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若迂婚、丧、节庆，均以油香作为小点招待亲友……以后此风俗在泉州、广州、扬州、杭州，即在我国南方略有发展。”<sup>②</sup>

教门饮食习惯的特殊性，导致回民在旧社会的职业，多偏向从事牛羊行业和饮食业，正如有段民谣所反映的那样：“回民身上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

回民不食猪肉和喜欢油香的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已成为一种民族的生活习惯，凡是回民较为集中的地方，至今都有回民牛肉供应点和回民饭店或清真饭店，教门油香不仅回民家庭经常做，而且回民饭店也常年供应。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一贯尊重回民的饮食习惯，制定有关政策予以照顾，注意扶持和发展回民饮食业，发放回民伙食补贴和节日油面的特殊供应等。例如广州惠福路的回民牛肉店，得到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一直按回民风俗的要求，保证肉类新鲜卫生，深受群众欢迎，每天门庭若市，营业额为同行业之冠。又如中山六路的回民饭店，颇具规模，可以同时供应千入进餐，常年供应教门油香，新开设的美食廊快餐部，全天候供应清真饭菜，尤以回民牛杂煲，脍炙人口，生意十分兴隆。

近年来，一些个体户又在三元里一带，先后开设了很多

回民饭店和清真餐厅，大量供应西北风味的新疆烤羊肉串和兰州拉面等，所有这些教门饮食习惯，都是不同程度地沿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二、教门习俗中的用香传统

教门的用香传统由来已久，这与回族先祖蕃商的经济状况有关。唐时来华的蕃商，大都是经营珠宝香料的，也有后来在华制造香业的世家。以香营生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回族世代用香的传统。

《唐大和上（尚）东征传》记天宝年间事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得珍宝，积载如山”。黄休复的《茅亭客记》载，五代时波斯人的后代李玆，就是“以鬻香药为业者”的世家，《宋会要》载：“大商蒲亚里既往广州，左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去，上（皇帝）令劝亚里回国，往来于运香料。”

又据庄为机《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指出：“宋寿庚之先祖……不仅于1192年就已在广东做香料生意，而且是广东最大的香料富商。”“蒲氏家族虽然被压改姓迁居，但是，他们经营香料却一直世袭到现在。“法石是蒲寿庚的家乡……，这里居住有卜姓……，他们也在明初永乐年间改蒲姓为卜姓的，他们仍是以种花为职业，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风俗习惯，用香料、香花敬奉祖先。他们种植的茉莉花和素馨花是从阿拉伯移植来的。”

由此可见，教门用香的风俗，始于唐宋而沿袭至今。广东近代也有从香业者，如民国初年，杨善平制作的光塔商标辟污清真香，就是专供教门习俗用的香料。

教门用香，范围广阔，大至清真寺的建筑和设备，小至家庭居室的炉瓶，处处用香：书写经画时要点香，制作教门油香时要用香，谓之“起香锅”；婚礼要有香花；丧葬礼仪更缺香不可，亲友给丧主的资助，称为“香仪”；亡人落土，不许有任何陪葬品，但必须放些花椒或樟脑等香料入坟坑。

被誉为中国第一座清真寺的广州怀圣光塔寺，曾用香材建造大殿，岳柯《程史》对此有过描述：“堂中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

居室用香，宋代也很普遍，《广东蒲氏族谱》记载，来粤始祖玛咭阿的夫人胡氏，曾有“名门簪纓世裔”之称。因她“相夫以义，佐读添香”<sup>⑧</sup>而名传后世，可见宋时“添香”之风俗也很盛行。

元代以后，穆斯林多用安息香，每到斋月，“家家户户……到清真寺礼拜殿前焚点成双香枝，并在自己的厅堂中，焚点二或四支‘安息香’和焚烧檀香木和香末……”<sup>⑨</sup>

明宣德年间，出现大批铜香炉，其中有不少是专供教门行香用的经文香炉和炉瓶三设。入清以来，更有大批陶瓷经文香炉，这些经文香炉和经文条幅一样，是回民家庭必备的陈设和装饰，成为回民家庭的标志。甚至有些回民把经文香炉看作是传家宝，是传宗接代的象征，可见教门用香习俗的广泛和普遍。

饮食唯清真，生活多用香，仅是教门习俗的一部分，但从中可以看到，这些习俗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是息息相关的，其传播和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

##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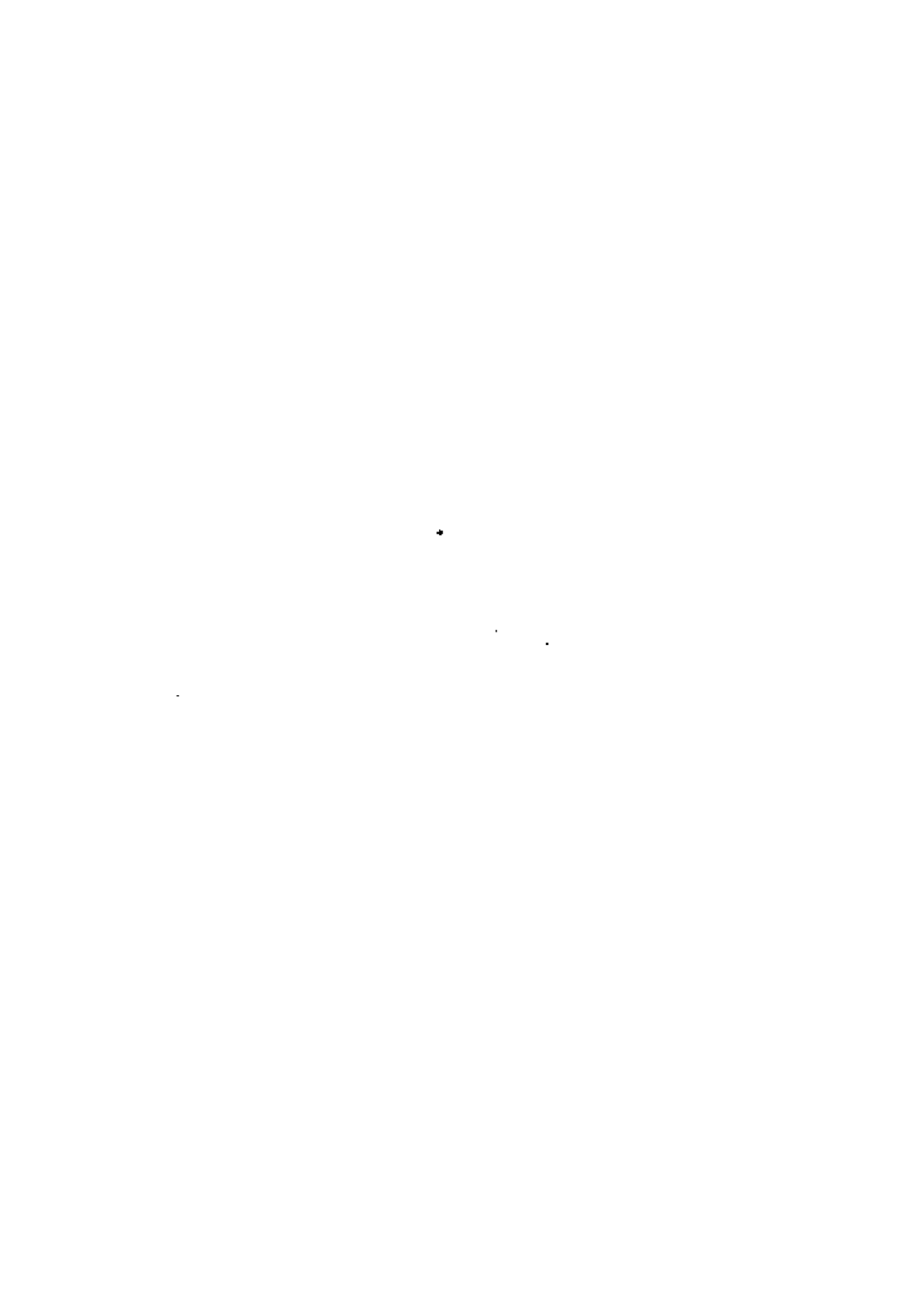
① 《古兰经》第五章第三节

②④ 《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浅谈回族风俗”

③ 《南海甘蔗蒲氏家谱》第 87 页

①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第 73 页

（本文作者是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 三、海上“丝绸之路” 有关的人物、文物 遗址与名胜古迹





##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人物

夏 丰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漫长岁月里，有不少中外人士为发展以广州为起点的通商贸易航线，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涉及者数量很大，不可能一一叙述。现只择其主要者介绍如下：

### 朱应、康泰

朱应、康泰是三国时孙吴政权的官员，朱应任宣化从事，康泰为中郎。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州（州治在广州）刺史吕岱奉令征讨交趾太守士徽，事件平定之后，为了睦邻友好关系，乃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他们航海沿林邑（越南南方）南下，首先访问了暹罗、扶南，然后渡暹罗湾沿马来半岛到达缅甸和沿岸的一些国家。据他们自己说：“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往返达十余年，回国后著《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以介绍其所见所闻。惜两书均佚，只保留了部分的段落在《水经注》和《太平御览》等书之中。

自朱应、康泰访问扶南等国后，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节到吴国访问，密切了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 法 显

法显，姓龚，东晋时山西临汾人，自幼出家，在修行中常感佛教经书之不足，乃于60岁左右高龄毅然决定西行求经。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自长安出发，从陆道抵印度，历30余国。后又从印度的耽摩梨帝渡海往狮子国（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居住了两年，求得佛经多种之后，即乘船经耶婆提（今爪哇）回国，计划在广州登陆，后被大风吹至山东的牢山湾上岸。

法显是我国古代见诸史籍第一个从印度取海道、经东南亚回国的僧人。其为佛教献身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所著的《佛国记》虽然只有九千五百多字，但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目前为止，已有英、法、日三国的译本，被公认为研究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著作。

## 拘那罗陀

拘那罗陀又名真谛或叫波罗末陀。印度僧人。我国的南北朝时期，他到东西亚一带传教，历游诸国。梁武帝肖衍敬佛，慕其名，从扶南礼聘至中国传教。于大同十年（546年）抵达广州，太清二年（548年）到达南京。因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他便避居富春译经，后又回到南京传教。往来于南昌、泉州等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定居广州光孝寺，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生活在广州共12年之久，先后译出经书64部，278卷，为该时代译经最多的一个佛学家，奠定了佛教摄论宗的传播基础。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病逝于广州。

## 常骏、王君政

常骏、王君政，隋炀帝时代的官员。常骏任屯田主事，王君政为虞部主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招募通绝域者，常、王两人应募出使赤土。据冯承钧考证，赤土是当时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在今马来半岛中部。常、王两人于同年十月，由广州登船出发，携带丝织物五千段，沿越南海岸线南下，渡暹罗湾后，即循当时的真腊、缅甸的海岸线航行，至马来半岛北部东岸，经鸡笼岛后抵赤土国。受到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赤土王甚至说：“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敬意，赤土王还派他的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回访，并于大业六年（610年）春在京师谒见隋炀帝。常骏、王君政的出使，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 义净

唐代僧人义净，姓张氏，字文明，范阳人（今河北省涿县）。15岁便有志于往印度取经。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才约集到数十人至广州。到了将要登船出发时，这些人都害怕困难而退出，独义净坚持到底，只身前往。先到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国，然后到马来半岛的吉打，再由吉打乘船至印度。经25年，历30余国，最后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归国回洛阳。并带回梵本经、律、论约400部，合50万颂。

义净译经56部，共230卷。有些还是在海外翻译的。如永昌元年（689年）义净在苏门答腊岛译经，遇到困难时，便乘船回来广州，寻找助手，并运去一大批纸张和用品。可见

其坚韧不拔之精神。

义净在求经途中，还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为西行求法高僧凡61人立传，这61人中，大部分都是取海道往印度的。因此，该书亦是一本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参考书籍。书中保留下来许多宝贵的资料，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 杨廷璧

杨庭璧是元朝初期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为一高级地方官吏。据《元史》记载，他曾多次奉命出使印度半岛。当时的印度半岛诸国中，以马八儿（在南印度半岛之东部）和俱蓝（在南印度半岛之西北部）二国最为显赫，特别是俱蓝，为元代东西交通必经之大商埠。杨廷璧多次出使俱蓝，为密切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出使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往，十七年（1280年）三月抵达俱蓝。俱蓝“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元史》卷210《外夷传》）。

第二次与宣慰使哈撒儿海牙同往，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从泉州出发，海行三月，因阻风乏粮，改在马八儿新村码头登岸，拟假道马八儿陆行至俱蓝。为其国大臣所阻，未能到马八儿陆行至俱蓝而还。

第三次仍由杨廷璧独往，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发船，十九年（1282年）二月抵俱蓝，受到隆重的接待。俱蓝还遣大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前来人贡。杨廷璧返航时还到达那旺（尼科巴群岛）、苏木都刺（苏门答腊）等国，这些国家在杨的劝说下，都遣使至中国入贡。

又据《元史》卷二一〇载：“二十三年（1286年），海外

诸蕃国以杨廷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今印度西北），曰僧急里（今印度西岸），曰南无力（今苏门答腊亚齐一带），曰马兰丹（今加里曼丹岛西北海上岛屿），曰那旺，曰丁呵儿（今马来半岛东岸），曰来来（西印度古国），曰急兰亦解（今马来西亚吉兰丹），曰苏木都刺，皆遣使贡方物。”

杨廷璧为沟通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鄂多立克

鄂多立克，意大利弗里乌黎省波登隆埃县人，生于1286年左右的时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传教士。

鄂多立克是中世纪四大旅游家之一，他于1318年开始东游，1321年抵达印度，并由此乘船至中国。沿途遍访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越南等地。在广州登陆后，还至泉州、福州、杭州、南京、扬州等地游览，最后抵达北京。居留三年之后，由陆路取道西藏回国。

鄂多立克著有《东游录》一书，介绍了沿途旅行的情况，对广州的风物亦有描绘，如广州人以蛇肉为佳肴，广州副食品供应充裕和粤菜的特色等等。也可以说，他是外国人介绍食在广州的第一人。

《东游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中外关系史名著之一。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郭搢臣把此书译成中文，并在武昌出版。

###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摩洛哥丹吉尔港人。生于1304年（元成

宗大德八年)，是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

白图泰于1325年（泰定帝二年）22岁时开始东游，横越非洲北部之后，周游柏莱斯丁、叙利亚、麦加、波斯等地，从印度乘船至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复经越南南方而至中国之泉州，然后访问了广州、杭州、北京等城市。最后经印度、西亚、埃及回摩洛哥。行程7.5万里，历时28载，是中世纪时期循海上“丝绸之路”游历最广泛者。

白图泰著有《游记》一册，详细描写旅途之所见所闻。此书之价值，张星烺认为仅次于《马可波罗游记》。此《游记》对广州亦有提及，称广州为当时世界大城市之一。“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书中还反映了广州制瓷、制船及外商的贸易情况。的确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为此，该书已有中、英、德、法、葡等文字译本，广泛流传，风行世界。

### 林道乾

林道乾，广东澄海人，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名海商。明朝由于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禁绝私人经营海外贸易，故当时的海商，大都有两重身份，正如谢杰《虔台倭纂》所说：“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因当时的民间海外贸易，是被视为非法的。

广东的南澳岛是当时民间海外贸易的基地。当官军禁止他们出海贸易时，海商们则组织武装进行抗拒，林道乾便是被称为“海盗商人”的头目。

嘉靖末年，官军加紧对海盗商人的镇压，林道乾乃以万历元年（1573年）率残部逃往海外，先至柬埔寨，后因明廷

派人跟踪，买通柬埔寨的统治者，企图里应外合，活捉林道乾归案。林乃率部退至暹罗。万历八年（1580年），林道乾化名为林语梁，藏匿在暹罗的一个海澳中，暹罗王最初想招抚这支人马，后为明廷所收买，策划与柬埔寨合兵，共同围攻林道乾，林只好再次转移，“扬帆直抵浔泥，攘其边地以居，号称道乾港”（《明史》卷三二三）。《明史》中的浔泥，实大泥之误，即今天的马来半岛北大年。林道乾在北大年定居下来后，对港口进行扩建，扩大了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所以李贽的《焚书》卷四说：“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林道乾对繁荣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确实是作出过贡献的。

（本文作者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

### 钟 声

#### 银 盒

银盒是古代盛药的用具，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银 盒



1983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前期南越国第二代国王“文帝”赵昧的陵墓。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墓内有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有一部分是由海外输入的珍品，其中一银盒，是墓主贴身的随葬品，为盛药所用。银盒高12.1、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盒盖与盒身相合如扁球形。盖顶正中圆突，外有一周宽带纹。主纹饰在外周，为密排的突瓣式互向的纹带。腹部主纹与此相同。在腹盖相合处各有一条窄细的稻穗形纹带。纹带表面有极薄的鎏金。

从银盒的造型、制作工艺花纹图案，以及对银料成份的化验分析，此银盒与伊朗古苏撒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刻有波斯薛西斯王名字（公元前五世纪）的银盒类同。可以看出，这个银盒不是中国的产物，而是目前广州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外舶来品，亦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起点的重要实物见证。

#### 四连体铜薰炉

四连体铜薰炉是燃烧香料的器具，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炉盖和炉身分别铸出，再把四个炉身与方座足合铸而成。通高14.7厘米，盖面形成四个小金字塔形，塔尖各缀一小环钮。炉盖和炉身有子母口相合。盖和身有镂空的几何图案作透气孔。炉体表面光滑，镂空的几何图形凸线却隐在体内。四连体炉可能是为了燃烧几种不同香料成复合香味而改进的。

燃烧的香料主要出产于东南亚地区，说明这种舶来品在当时日常生活中已较普遍使用，也反映了当时的番禺（今广州）与海外的一些国家已有贸易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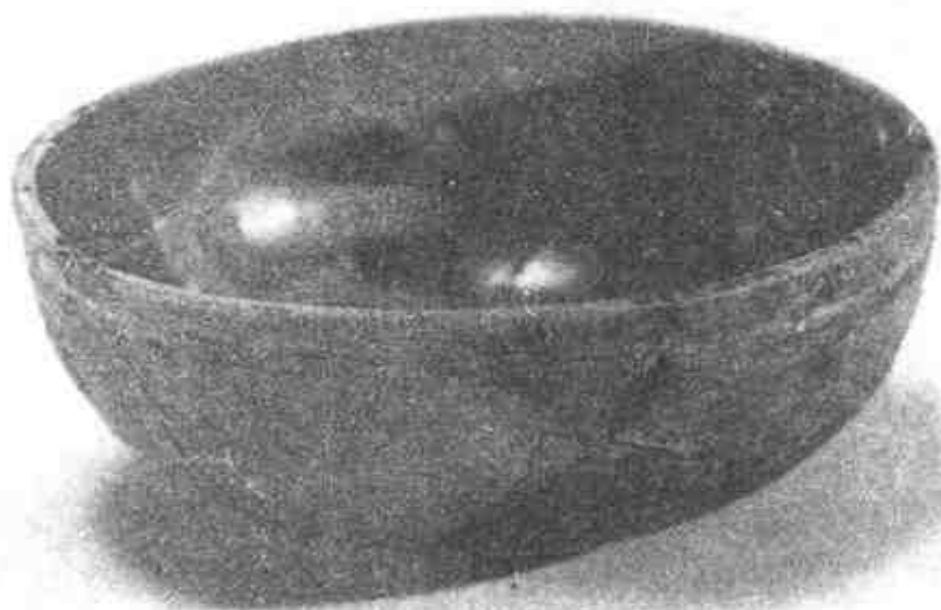


四连体铜薰炉

### 玻璃碗

玻璃碗，於 1954 年在广州市横枝岗西汉中期（公元前 111 年～前 32 年）古墓葬中出土。口径 10.6、厚 0.3 厘米。共三件。形色相同，紫铜色，半透明，平底。倒模制型，内壁光滑，外壁及口沿打磨呈毛玻璃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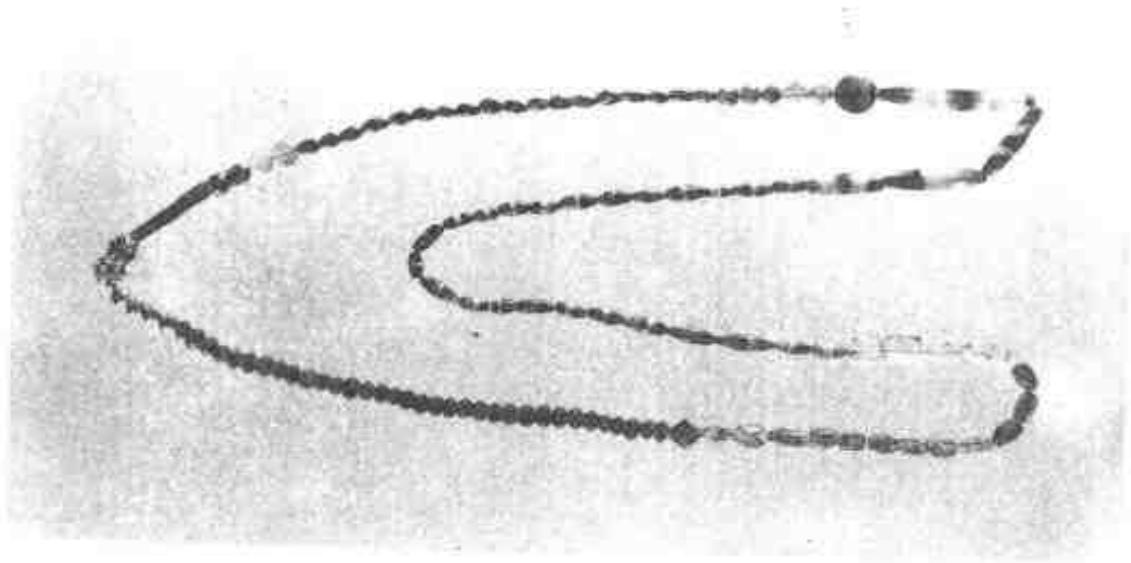
据同位素 x 射线莹光分析，属钠钙玻璃系统，似同公元前一世纪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产品，说明距今 2000 多年前已有欧洲玻璃器皿从海路运销到广州来。



玻 璃 碗

### **玻璃、玛瑙、水晶串珠**

玻璃、玛瑙、水晶串珠，于 1953 年在广州市游鱼岗出土。经考古鉴定为西汉后期（公元前 32~25 年）封建贵族佩戴的装饰品，其中药物蚀花肉红石髓珠和玻璃珠等，据分析，应是从海路运入广州的贸易品。



玻璃、玛瑙、水晶串珠

### 陶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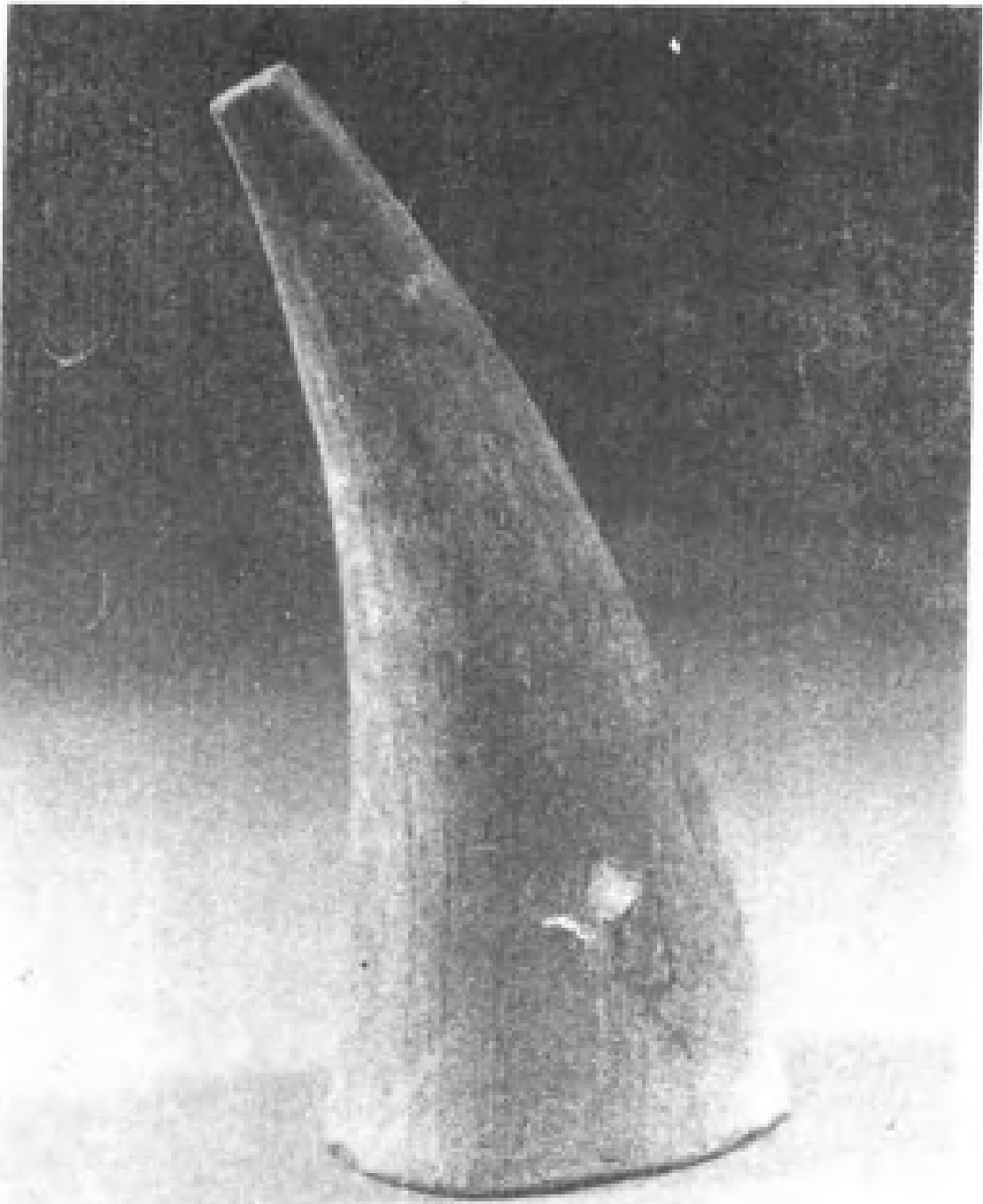
陶犀角，于1955年在广州市大元岗西汉前期（公元前206～前111年）古墓葬中出土。长17、底径16厘米。仿真犀角造型。

陶犀角底部挖空成圆锥形，角的尖端削平。《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今属印度）献犀牛”。说明距今2100多年前已有生犀通过海路运到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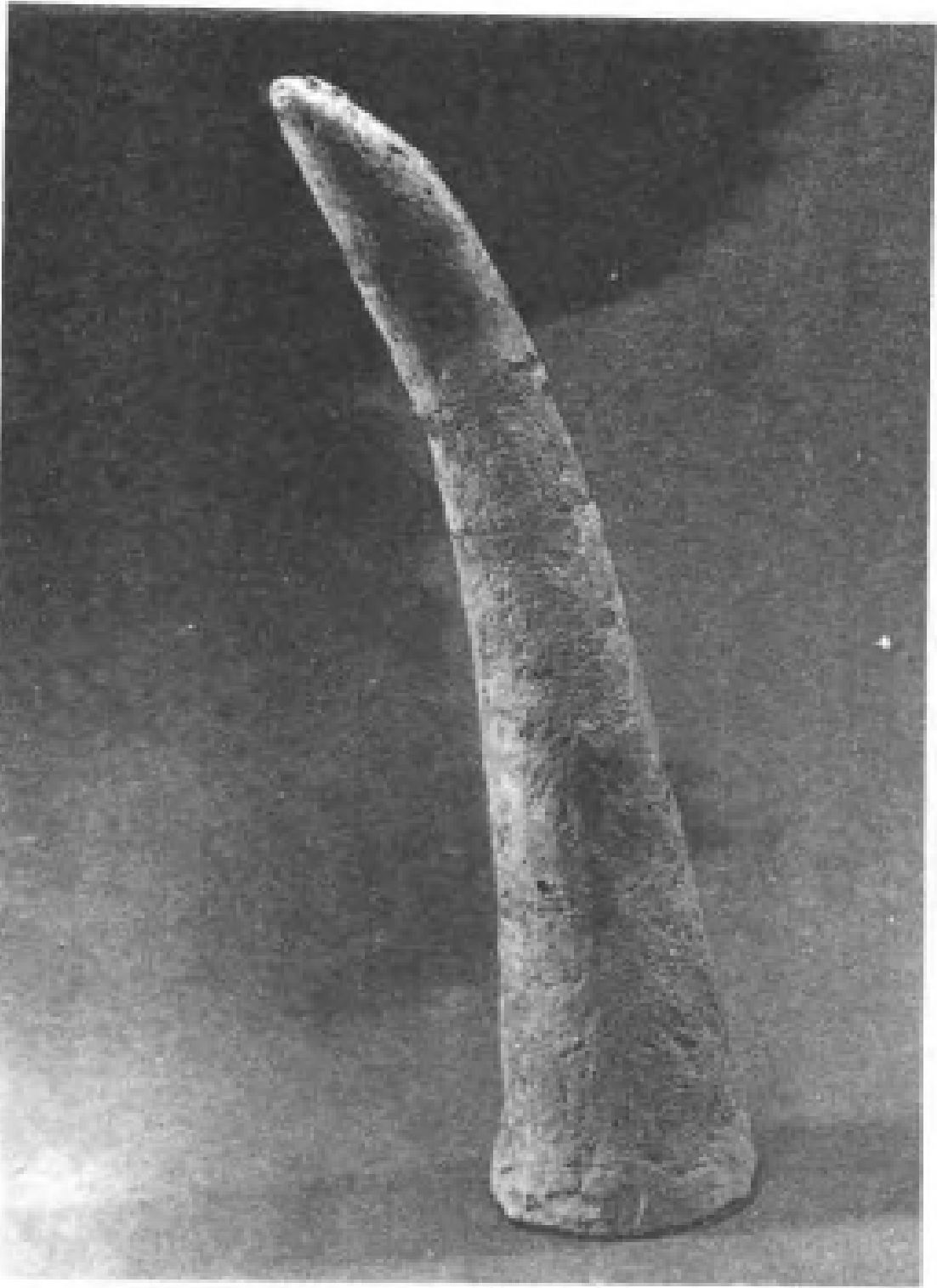
### 陶象牙

陶象牙，于1953年在广州市先烈路二望岗西汉前期（公元前206～前111年）古墓葬中出土。

该陶象牙长49、底径9.3厘米。仿真象牙造型。说明距今2100多年前已有象牙从海路输入广州（详见陶象牙图）。



高 塔 角



陶象牙

### 陶俑座灯

广州河南大元岗 15 号墓，位于今海珠区前进路。这里



陶俑座灯

有一群西汉晚期至东汉年间的古汉的古汉墓，1955年已发掘20多座。出土的陪葬器物繁多，以陶器为主，形态逼真，风格独特。其中最具典型的是1件灰白色硬质陶制胡俑座灯，通高24.7厘米。灯座塑成托灯的奴隶，头上发如椎髻，鼻梁高，眼突出、颌有须，张口吐舌。裸体、跣足，遍身划毛，屈膝蹲坐，左手斜托灯盘，右手弯支腿上，头向左仰视灯盘。俑的塑形属于西亚或东非人，被商人贩运到中国，卖给封建贵族做“家奴”。这类胡俑在广州汉墓中出现，证实汉武帝以来，广州与西亚海外贸易日益繁荣。

### 陶 船

陶船，于1954年在广州先烈路东汉墓中出土。船通高16、长54厘米，分前、中、后三舱，尾部有望楼，后舱右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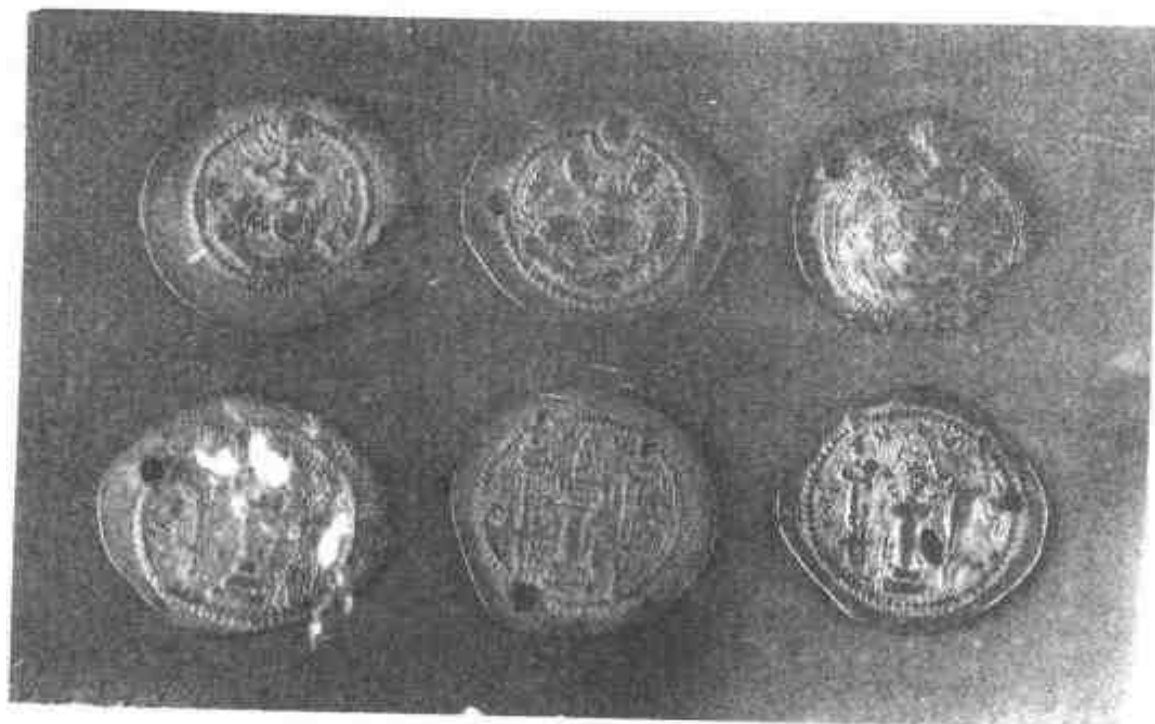
陶 船



有厕所等生活设施；船前有锚，船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桨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骨干的坚牢和加深吃水量。这些说明东汉（25~220年）广州人已掌握了建造航海船只的技术。

### 波斯萨珊朝银币

1960年在英德县滄光古墓葬中发现波斯萨珊朝银币三枚。银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中央是祭坛，上面有火焰星月，两边各有一祭司相对而立。据考证银币属于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时（457~483）所铸，为南齐永元元年（499年）前流入中国。



波斯萨珊朝银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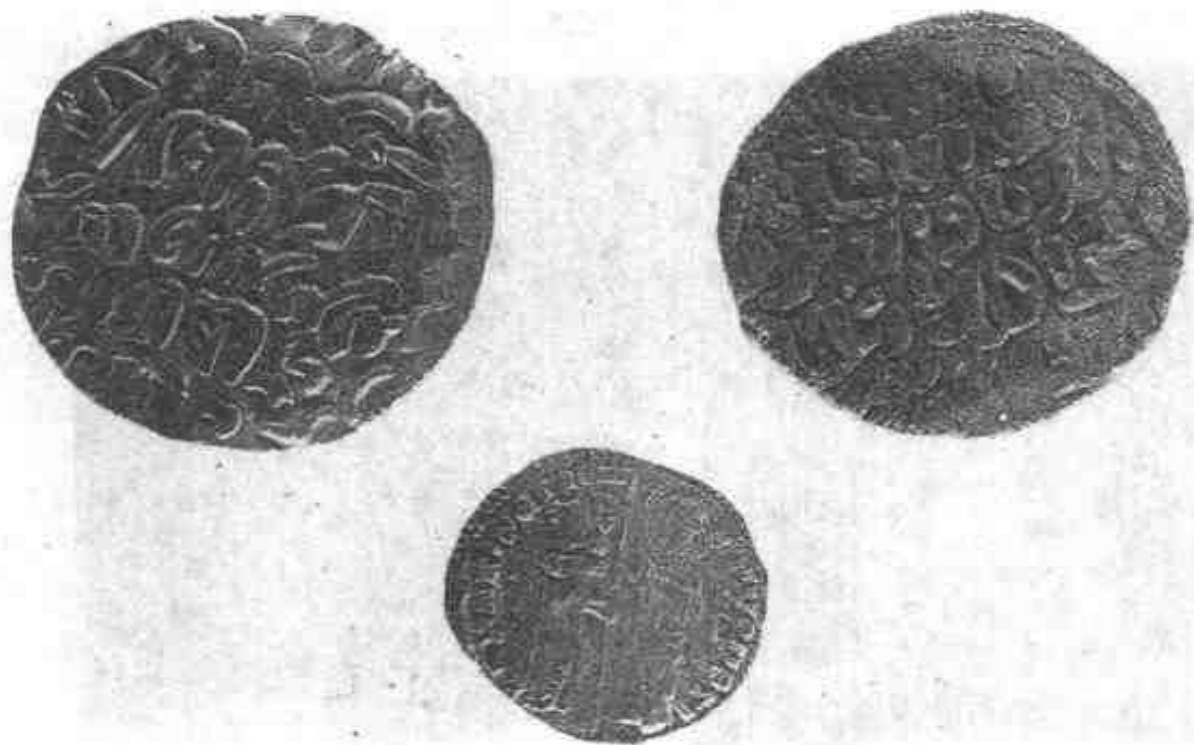
1973年在曲江南华寺东南山坡南朝古墓中，又发现9片剪割开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这些银币由波斯湾传到粤北，从

地理和交通条件分析，应是由广州港口中转的。

这些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发现，对研究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银 币

古威尼斯银币、孟加拉银币于1964年在广州市东山明代韦眷墓中被发现，韦眷在广州任提举市舶太监。威尼斯银币又称“格罗索”或“格罗塞托”银币。孟加拉银币又称榜葛啦银币，铸于1459年，应是从海路输入广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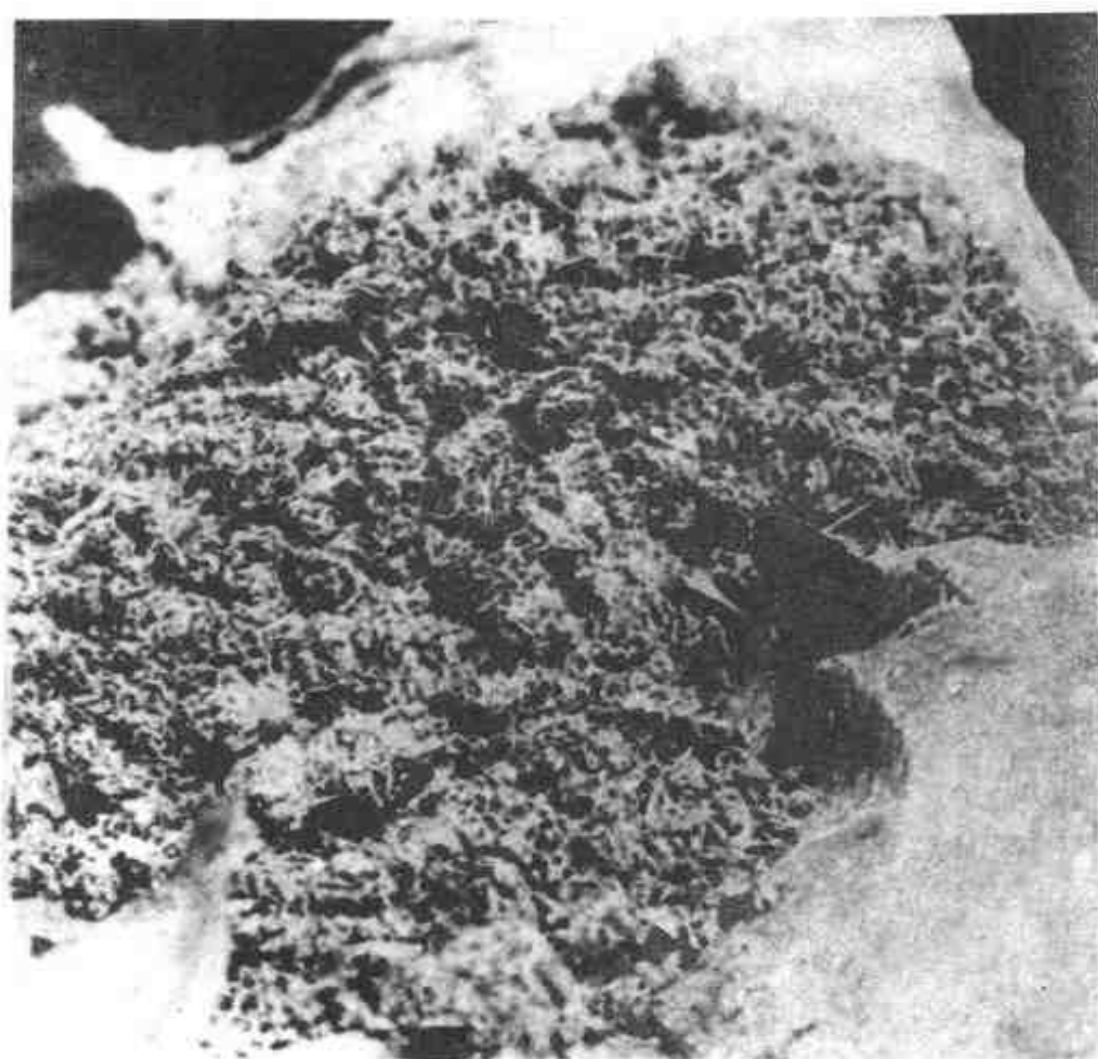


威尼斯、孟加拉银币

## 瓷器、茶叶

清雍正十年(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达

广州黄埔港，从此开辟了中瑞海上的贸易往来，在经营的 75 年间，共完成了 130 次远东旅程，其中 127 次的目的地是广州。“哥德堡”号轮是该公司的一艘大商船，1745 年 9 月 12 日，在自广州返航途中，不幸在瑞典西岸哥德堡市港口外搁浅沉没，当时船上载满大量茶叶和瓷器。在东印度巨轮“哥德堡”号基金会的赞助和组织下，沉船的海底考古研究工作于 1986 年开展，至今，数以千计的瓷器和大量茶叶已从沉船遗骸中打捞上来。



茶 叶



青花瓷器

这些瓷器是清乾隆期间（1736～1796年）的产物。大多是青花瓷器，上面的装饰图案有山水画、风景人物画、花鸟画、风俗生活画、花束及古玩装饰画等。

这些瓷器虽然在海底200多年，仍然保持原有的色泽、光彩，足以说明当时广州造瓷技术工艺的精湛的高超。

令瑞典学者喜出望外的是，打捞上来的茶叶不但保留了原来的青绿色，而且冲水泡茶仍香味浓郁、可口宜人，反映出清代造茶业的产品质量和包装技术达到惊人的水平。它们是中瑞两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商贸、文化往来的历史物证。

（本文作者单位：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秘书处）

#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和名胜古迹

日 生

## 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位于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和儿童公园内。旧称“禺山”，是南宋梁伯揆讲学的“禺山学院”所在地。经过试掘证明，这是汉代以来堆积形成的一片东西长约300米的坡地。造船遗址在坡地下五米深处，南距今珠江北岸1300米。1974年文化局院内建筑发现。1975年在400平方米范围内试掘，揭出一部分船台和木料加工场。造船工场建造在灰黑色的沉积粘土层上。船台区有三个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造船台。1号船台在南，船台中宽1.8米，长度估计在100米左右，所造船只的宽度约3.6—5.4米，长约20米，载重25—30吨。2号船台居中，中宽2.8米，仅露出一小段。所造船宽约5.6—8.4米，长度30—40米，载重50—60吨。3号船台，因上有楼房，没有开掘。

遗址上面出土有秦半两、汉初半两钱，秦汉瓦当及西汉初陶器等物。据此并结合文献资料考证，此造船遗址始建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至西汉初的文、景期间废弃。

这处造船工场规模之大，造船木料之优，船台结构布局之合理、工艺之巧，都充分显示了2000多年前广州的造船技

术和航海能力已达到很高水平。



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 西汉南越王墓

西汉南越王墓坐落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1983年因建筑发掘，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室南北长10.85米，东西宽12.5米。分前室、东西耳室、主棺室、东西侧室、后藏室共七室。墓中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这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汉墓，是继河北满城陵山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后我国汉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文物中有部分珍品是海外输入，是研究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珍贵资料。照片中为前室石门。



西汉南越王墓石门

## 光孝寺

光孝寺位于光孝路，以历史悠久、规模宏伟为岭南佛教丛林之冠。寺址初为南越王赵建德王府。三国时，吴国骑都尉虞翻谪徙居此讲学，辟为苑圃，多植诃子，又称诃林。虞翻死后，家人舍宅始创佛寺，名制止寺。经多次改名，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易称光孝寺沿用至今。自东晋至唐，外国名僧天竺国的真谛、罽宾国的三藏法师昙摩那舍、印度的智药三藏、达摩禅师及中国佛教南宋六祖慧能都曾在此译经或讲经传教。对中国佛教及中外文化交流有很大影响。



现存寺内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瘞发塔；其西有大悲幢、西铁塔和近年以岳雪楼丛帖所建翠廊；其东有六祖殿、伽蓝殿、洗钵泉和近年集中寺内碑记所建碑廊。再东有睡佛阁，洗砚池和东铁塔等。全寺面积 31 000 多平方米，环境开阔幽静，诃子、菩提、榕树等古木婆娑，香烟四溢，实乃佛门静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光 孝 寺

### 六榕寺与花塔

六榕寺位于六榕路，是广州著名的名胜古迹。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420—479年）。初名宝庄严寺。北宋初，寺院焚毁，端拱二年（989年），重修寺院，僧人崇奉佛教南宋六祖



六 榕 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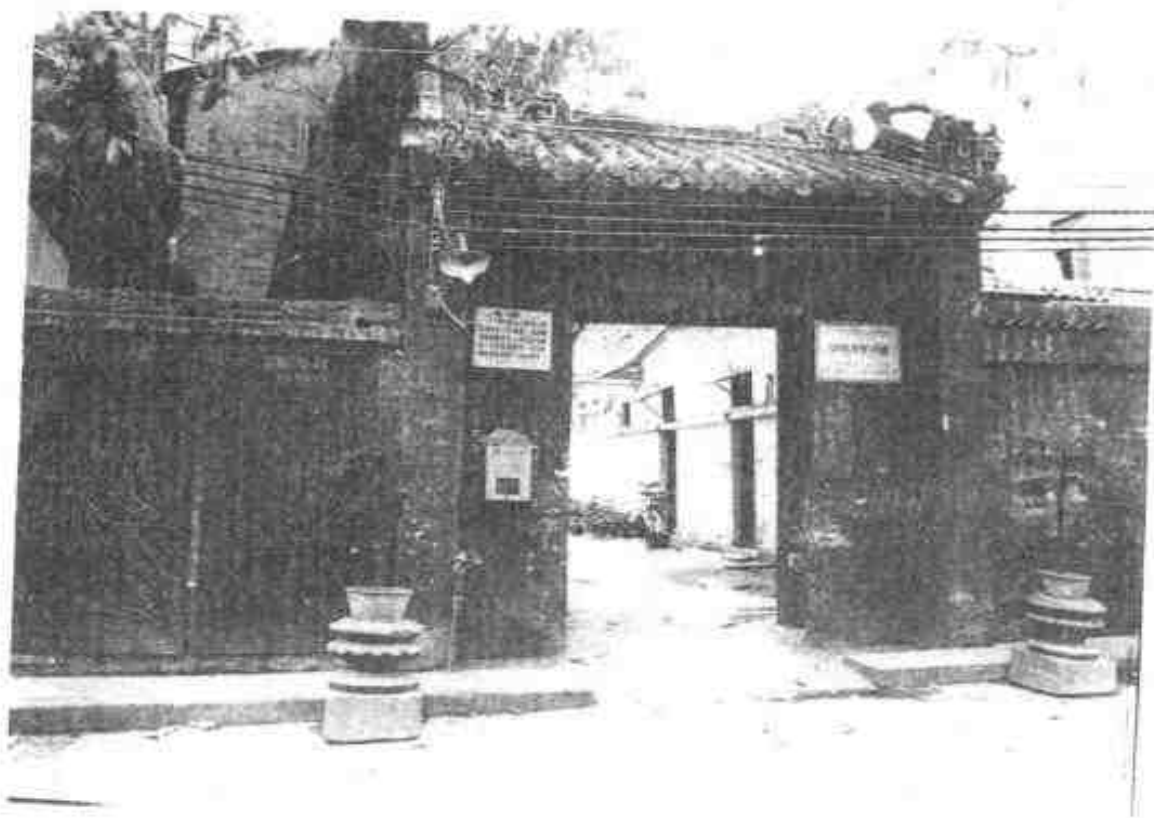
慧能，以修“净业”，改名净慧寺。花塔矗立寺院内大殿前。原建于梁大同三年（537年），为一华丽的木塔。供奉从海外携回的佛骨，并赐号宝庄严寺舍利塔。北宋初，木塔与寺院均被烧毁。宋绍圣四年（1097年），重建成楼阁式砖塔，易名千佛塔。宋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来游，见寺内有六株苍翠成荫的大榕树，欣然手题“六榕”二字，后人将寺、塔称为六榕寺、六榕塔。

如今寺院面积7000多平方米。东向的山门之内依次为天王殿、花塔、大雄宝殿、其北有解行精舍等，其南有碑廊、观音殿、六祖堂和外榕亭等。六榕寺花塔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西来初地与华林寺

南朝梁普通八年（527年），印度名僧达摩从海道来中国传教，最先在今广州下九路附近登岸；并在登岸处建“西来庵”，距今已有1400多年，属岭南古名刹之一，亦是早期中印文化交流之地。人们尊崇这位来自西方佛国的高僧，将其来我国最先登岸传播佛教的地方叫西来初地。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西来庵”经大规模扩建殿堂、经阁，廊庑参差错落，环境幽雅，改名为“华林寺”。寺内僧侣云集，香火旺盛，成为当时广州佛教五大丛林之一。道光末年，建五百罗汉，罗汉体形逼真，姿态各异，面目喜怒不一，其中还塑有马可·波罗像。此外，在罗汉堂中央原有一座清代铜铸阿育王塔，重750公斤，高4米，是珍贵文物，已下落不明。



华 林 寺

### 怀圣清真寺与光塔

广州怀圣清真寺俗称光塔寺，位于广州市光塔路，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相传是唐朝初（公元七世纪）阿拉伯著名传教士赛义德·本·艾比·宛葛素来华时所建；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寺名怀圣是教徒怀念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之意。它是我国和阿拉伯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历史见证。

寺内光塔，具有阿拉伯的建筑风格。青砖砌筑，外表以蚝壳灰批荡，园柱形，无层级，塔底直径7.5米，下有两门，

各有梯级可达塔顶。塔高 36.3 公尺，如银笔直指蓝天。光塔原名邦克塔，即宣礼塔，是每次礼拜前由人登高喊“宣礼词”，叫人快来礼拜之用。据传唐宋时期，光塔位于珠江古河畔上，入夜悬灯塔顶，用以导航来往船只，故有光塔之称。怀圣寺光塔是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怀圣清真寺与光塔

### 清真先贤古墓

清真先贤古墓，位于解放北路兰圃西侧。相传是来华传教创建怀圣寺的赛义德·本·艾比。宛葛素歿后埋葬的地方。是广州著名的伊斯兰教古迹。墓建于唐代。墓园四周用青砖

高墙围绕，内为庭院式布局，花木繁生，墓室建在园内北面，外方内圆，拱顶，形如悬钟，在里面诵经讲话，回声相应，故又称为响坟。有四方亭、敞口厅、礼择殿等。墓附近亦为历代知名的伊斯兰教徒墓地，在这里还发现一方元代高丽（今朝鲜）人氏穆斯林刺马丹的阿拉伯文墓碑。碑石上刻有一行中文，记载着墓主死于元至正九年（1349年）距今已有600多年。这是广州发现最早的阿拉伯文碑铭。清真先贤古墓是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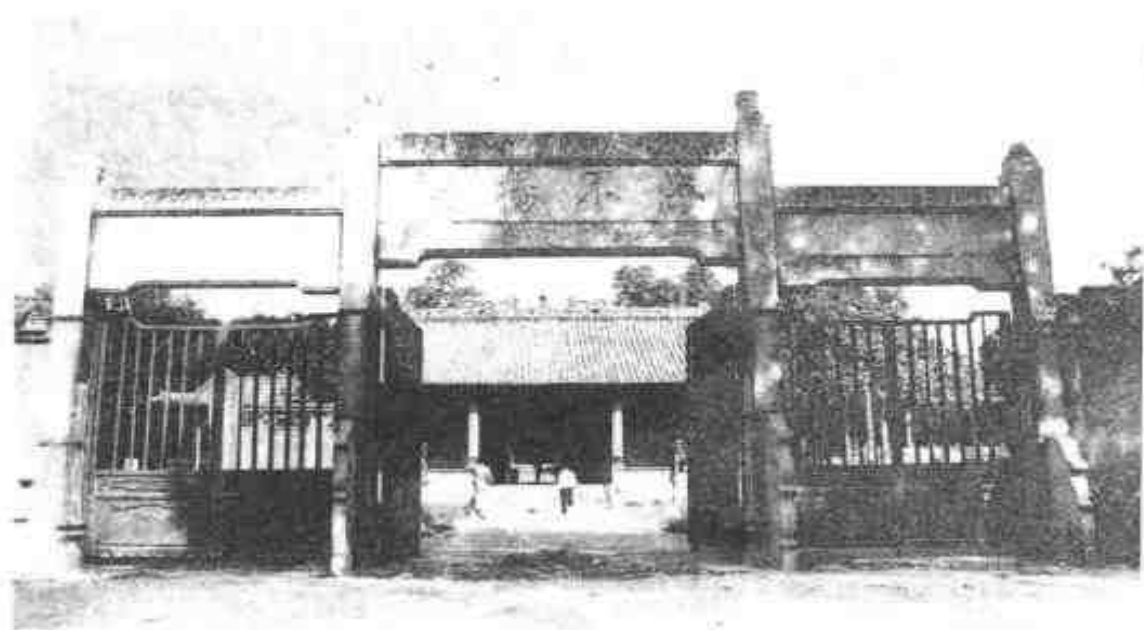


清真先贤古墓

### 南海神庙与浴日亭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庙头，又称波罗庙，是中国古代海外交通贸易往来的重要遗址。隋开皇十四年（594

年)，隋文帝下诏祭四海，在广州外港黄木湾建南海神庙。其后历代帝王都派员到庙立碑致祭。神庙已几经扩建重修，是中国著名的海神庙。神庙前是古代码头遗址，中外商船出海前按例到庙拜祭，祈求航海一帆风顺，贸易兴隆。庙旁扶胥镇为贸易集市。以此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达东南亚、西亚和东非，明清时远达欧美。



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宏伟深广，现占地近3万平方米。“海不扬波”石牌坊内，主体建筑五进，依次为头门、仪门、礼亭、大殿和后殿。仪门两侧有复廊。大殿前有东西两廊，均为清代以来重建。

庙内藏有东汉大铜鼓、明代铁钟和玉刻南海神印。庙内

曾有大批的碑刻，有南方“碑林”之称。现尚存唐代韩愈碑、宋开宝碑、明太祖御碑等 30 多块，均为重要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关于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资料，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庙西章丘顶上有浴日亭。“扶胥浴日”是宋、元的羊城八景之一。亭内立有宋苏东坡《浴日亭》诗碑及明陈白沙步苏韵诗碑。南海神庙是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高 2.17、宽 1.13 米。唐袁州刺史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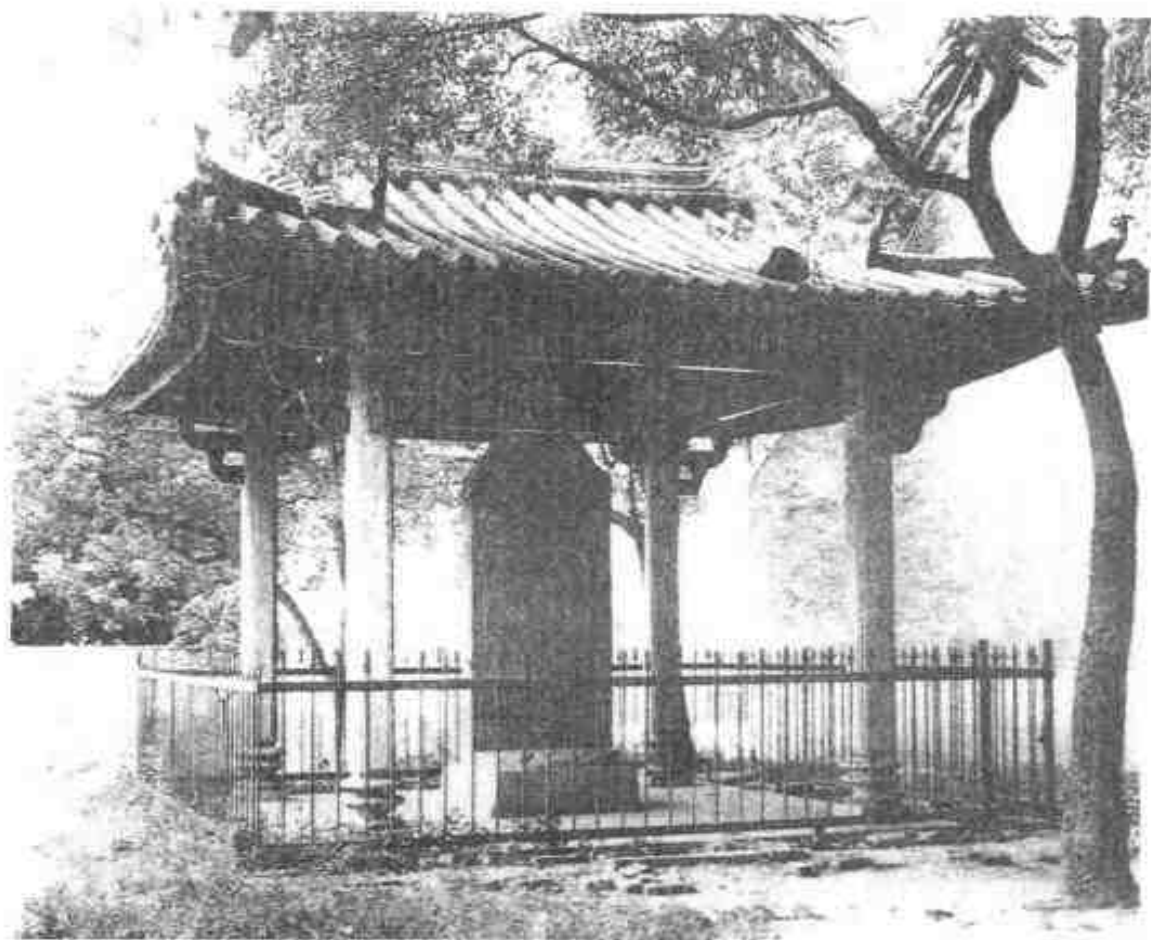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愈撰文，循州刺史陈谏书。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一日立。原立南海神庙殿侧东廊，今移置庙内头门西侧北向，保存完整。碑文记载了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封南海神祝融为广利王等事。文内有“海事”一词，据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海事一词（指航海技术、客运、货运等事）最早见于此碑。更显示出它的科学价值。

###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碑，高3.72米、宽1.59米。北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宋开宝六年（973年）由裴丽泽“奉敕”撰文，韩溥书。碑立于南海神庙内。碑文记载了971年北宋大军围广州，刘侏投降，南汉灭亡后，开拓对外贸易的事迹。还记载了自古交趾七郡货物从南海沿江达淮，逾洛水至开封开展贸易往来的贡献。说明宋时期海上贸易是很繁荣兴旺的。

### 六侯之记碑

六侯之记碑，宋绍兴乙丑年（1145年）原置于南海神庙内。碑高1.77米、宽0.82米。碑文记载的六侯是达奚司空、杜司空、顺应侯、济应侯、辅灵侯、赞宁侯等6人。他们有的来自印度的海员，被南海神封为侯。还记载了南朝梁普通七年（526年）印度名僧达摩从海路来广州的史实。

### “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碑

“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碑。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刻，立于南海神庙。1963年移置于广州博物馆。碑高1.88、宽1.3米。碑文记载了自唐天宝十年起，历代帝王给南海神加上封号的史实，文中有广州“夷舶往来，百货丰盛”等语，反映了当时广州中外贸易的盛况。

### 琶洲塔

琶洲塔位于广州海珠区琶洲。建于明万历28年（1600年），塔为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内膛为八角直井式。外观9级，内分17层，高50余米。传说附近江中常有金鳌浮出，所以原称海鳌塔；又因建塔的山岗为两山相连为琵琶，故亦称为琶洲塔。琶洲未与珠江南岸相连时，屹立于岗顶的琶洲塔严如中砥砥柱。明清时期，出入广州的海船，以此为通航标塔，

六侯之記

六侯之記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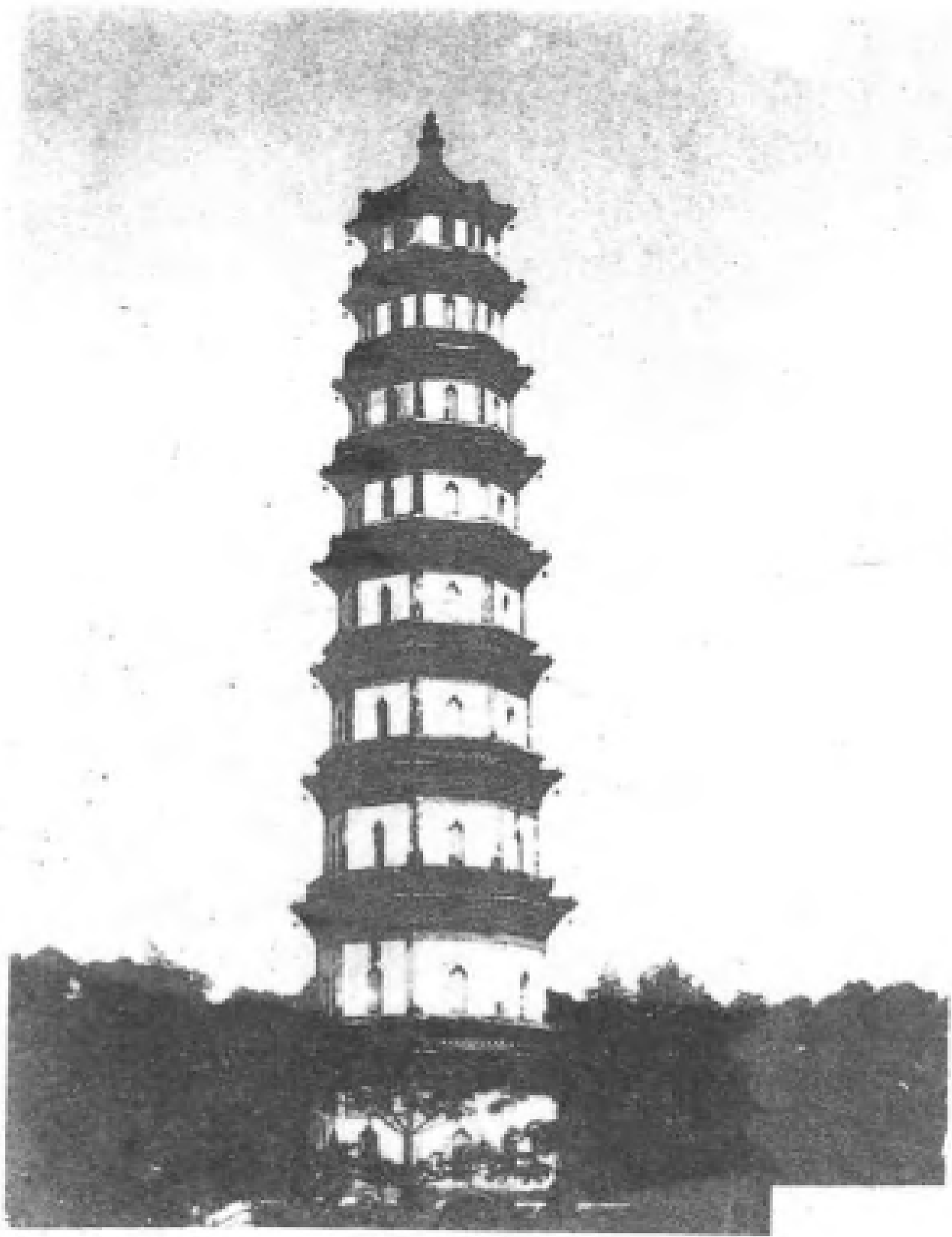
南 廣 濟 昭 廣 王  
漢 新 聖 漢 帝

“南漢廣利漢帝昭漢王記”碑

起导航作用。故“琶洲砥柱”被列为清代羊城八景之一。塔旁尚存《琶洲鼎建鳌塔记》石碑一块，高1.71米、宽0.87米，花岗石碑座。琶洲塔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琶 洲 塔



蓮花塔

## 莲花塔

番禺县莲花山，海拔 105 米。在山北主峰顶上，矗立着高达 50 米秀丽的莲花塔，与广州市海珠区的琶洲塔、赤岗塔鼎足而立，雄驻珠江入海处，中外来往船舶以此为“海航表望”，有“省会华表”之称。莲花塔建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 年），为楼阁式砖塔，平面呈八角形，外观 9 层，内为 11 层，拾级盘旋而上，可达顶层。莲花塔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作者单位：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秘书处）





## 四、海上“丝绸之路” 精神在当代的弘 扬与发展



# 海上“丝绸之路”——当代国际性考察研究的大热门

何礼荣 林康裕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年代悠久，但它在历史上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掉的。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许多国家，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考察研究活动，借以回顾、纪念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表达当代人希望和平对话、友好交往、平等交流、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因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顿时成了一项国际性的考察研究大热门。

## 一、联合国的十年综合考察规划 与“和平方舟”号的综合 考察万里行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提出，似始见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79年面世的《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也是由此而在各国学者中引起重视，掀起考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性热潮。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研究十年（1988—1997年）规划”的提出，以及1990年

10月，为实施这十年规划，派出“和平方舟”号豪华游艇，载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官员、20多个国家的几十名学者和新闻记者所组成的综合考察队，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跨越欧洲、非洲、亚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历时142天，行程万里，进行多学科考察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性考察研究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

据称，这次考察活动的目的是：通过重温古代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历史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对话和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表达希望人类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和平友好环境中的良好愿望。当1991年2月9日“和平方舟”号抵达广州港时，受到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充分体现了主宾们希望各国人民永远友好交往、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

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重要港市，是中外通商贸易从不间断的著名巨埠，迄今还留存着其他古港不可比拟的大量遗址、文物和资料可供考察研究。因此，广州市在这次考察全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古港所无与伦比的。考察队在广州期间，先后参观考察了南海神庙、光塔寺、清真先贤古墓、镇海楼等名胜古迹，还举行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正如考察队负责人迪安在畅谈观感时所说：“几天来，我们参观了许多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和实物。我们既看到了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又接触了中国现实文化。广州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风采！大量的实物证明：很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就有了广泛的交往。这种交往，使中国向外界输出了许多东西，同时也从外界吸收了不少东西。”考察队学术领队、土耳其汉学家欧刚也说：“始子

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起点，历久不衰，从未中断，她为中外友好交往，促进各国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毫无疑问，这次成功的综合考察活动，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十年综合考察研究活动的完成，对于推动国际性考察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实现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二、热心于考察研究活动的阿曼苏丹国

阿曼苏丹国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是个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 1700 公里的海岸国家，是往返中东和远东之间以及远东与非洲之间航线的战略要地，是沟通亚洲、非洲贸易的中转站，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国际转口贸易中心。

中国和阿曼之间的友好交往关系，远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汉朝。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阿曼人是艾卜·欧贝德·阿卜杜拉·本·卡希姆，他曾于公元 8 世纪到过广州。公元 9 世纪中叶，广州与苏哈尔市的贸易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广州和苏哈尔市在中国同阿曼苏丹国的友好交往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致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称苏哈尔城是“中国的大门”。从苏哈尔城到中国来经商而长驻于广州的商人阿卜杜拉，曾被宋朝廷封为“归德将军”，以表彰其商业道德。广州与苏哈尔城的通商贸易，虽然曾因黄巢起义占领广州而一度中断，但在很多世纪以来，两国的友好交往仍可说是一直持续发展的。特别是在 1970 年 7 月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即位后，两国的友好交往更是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在中国与阿曼的友好交往史上，曾流传着阿拉伯文学名

著《一千零一夜》中所描写的辛伯达航海历险故事。为验证当年辛伯达航海探险的可能性和真实性，阿曼苏丹国仿照辛伯达当年的船模造了一艘古帆船“苏哈尔号”，于1980年11月23日，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启航，沿着当年辛伯达的航道，历时220多天，航程6000海里，于1981年7月11日抵达广州港，受到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和广大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一成功的仿古航行，充分证明了当年辛伯达的航海历险故事是完全可能的、具有真实性的。为此，“苏哈尔号”船长蒂姆·赛弗林还专门编著了一本纪实性文学著作——《现代辛伯达航海记》，详细描述他率众驾驶阿曼仿古木帆船沿着当年辛伯达的航道，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完成这次远航探险，胜利抵达广州的艰苦历程。

在“苏哈尔号”抵达广州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阿曼苏丹国又派遣文化使者——阿曼苏丹国最大的民间艺术团，前来广州参加“阿曼文化周”活动，1991年7月15日晚，在友谊剧院演出富有阿曼苏丹民族风情的精采歌舞节目，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喝采。与此同时，阿曼苏丹国民族遗产和文化大臣费萨尔·本·阿里·本·费萨尔·艾勒义德殿下、民族遗产和文化部顾问马鲁拉·本·阿里·本·哈比布·莱瓦梓先生等也亲自率领代表团前来广州举行“中国阿曼文化友谊报告会”。正如大臣殿下在报告会的讲话中所说，举行这个报告会，为的是“共同回顾两国人民之间贸易和文化的友好交往史。”“广州是阿曼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我们以与伟大的人民、古老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而自豪。……伟大的卡布斯国王陛下政府重视这一关系。顾问先生还说：“我们这次访华是来庆祝‘苏哈尔号’抵达广州十周年纪念的。……这一活动无论是对阿曼还是对中国，都是具有历史意义

和价值的。我希望每隔十年举行一次纪念活动，让‘苏哈尔号’历史性的航行和航海家辛伯达与我们的关系永远铭刻在我们两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脑海中。”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阿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预示着诸如‘苏哈尔’号那样的考察研究活动，将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航道上。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阿曼苏丹国国王卡布斯还给以鼎力支持和慷慨的资助，他特地为这次综合考察活动而在德国不来梅造船厂订造了“和平方舟”号豪华游船，并为“和平方舟”号提供燃料和船员。这一切充分地体现了卡布斯国王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研究活动是多么重视、何等的热心！

### **三、古沉船残体“哥德堡号” 的发掘与瑞典历史代表团 前来广州寻觅当年锚地**

18世纪初，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延伸到北欧的瑞典等国，开始了中国与瑞典等国通商贸易和友好交往的历史。1984年于瑞典哥德堡港发现的古沉船“哥德堡号”，是曾为这段美好历史做过重大贡献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因此，对这艘古沉船的发掘，也就成了考察研究当年中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项目。

18世纪三四十年代，“哥德堡号”曾先后三次往返广州至

哥德堡的航线上。1745年9月12日，当该船由广州返回瑞典刚驶入哥德堡港时搁浅沉没。为考察研究当年中瑞两国通商贸易和友好交往的历史，1984年开始发掘该沉船残体。目前已打捞起来的货物有瓷器50多万件，其中大部分都有中国传统的图案花纹，还有133吨白银，370多吨茶叶以及丝绸、胡椒、藤条等，打捞起来的茶叶，至今仍可饮用，香味并不减于当年。显然，这一切都是当年中瑞两国通商贸易盛况的最生动的历史见证。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关闭于1831年。当时，从海上权力而言，瑞典与英格兰、荷兰等国相比，无疑是个小国，但从同中国的通商贸易来看，却完全是可以同英、荷一争高低的。当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先是从瑞典运载木材、柏油和金属到西班牙销售，获得大量银钱后，再到中国以十分优惠的价格购买中国货物运回瑞典。这种三角贸易，使瑞典得到很大的好处，对18世纪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段美好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它并没有为瑞典人民所忘记。近年，瑞典人民除继续发掘古沉船“哥德堡号”残体外，还于1991年3月派出一行60人的历史代表团，携着从“哥德堡号”打捞起来的货物到香港旗杆屋茶货博物馆展览，并前来广州寻觅当年“哥德堡号”的锚地，还举行有关学术座谈会，与广州地区有关学者共同研究和回顾当年中瑞通商贸易的美好历史，表达进一步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拓展友好交往的共同愿望。



#### 四、世界各国群众的自发性考察探险活动

除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各国政府所组织的各种考察研究活动外，世界各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还纷纷起来自发地组织各种考察探险活动，为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性考察研究活动增添了广泛的群众性特色。其中特别是1980年德国的布鲁格兄弟俩驾驶古波斯船“瓦丝柯德·甘玛”号从印度西海岸到广州和1981年6月9日欧洲12名青年驾驶中国式仿古木帆船“华—埃尔夫”号从广州到巴黎的两次考察探险活动最为感人。

德国人布鲁格曾经当过轮机员，早年到过中国，得知古波斯国与广州的海上通商贸易，比之意大利水手哥伦布的三艘帆船从西班牙航行到美洲还要早几百年，感到非常惊喜。其弟弟在海军服役当轮机员时，也曾看见过一种奇特的古帆船。这些发现，驱使他兄弟俩希望有朝一日能驾驶古波斯那样的木帆船，按照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商人到广州经商的古航道，亲自经历一次考察探险生活。

为了实现愿望，布鲁格兄弟辛勤工作，节衣缩食，经过三年的努力，积蓄了一笔经费，于是在1979年7月，兄弟二人从西德飞往印度西海岸，按照他们提供的设计资料，仿照古波斯木帆船的式样，并要求完全用古代手工的造船方法，订造了一艘古波斯木帆船“瓦丝柯德·甘玛”号，从印度曾有1000多年对外通商贸易历史的加尔克（译音）港启航，沿着当年的古航道，经历了7个多月，远涉重洋，完全利用风力航行了25 000海里，于1980年11月5日，安全抵达广州港，终于实现了平生的愿望。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在启航出发前，曾登广告征求同行伙伴。广告登出后，许多有志者踊跃要求参加，但因古船只有6个床位，不能全部满足应征者的要求，只有德、法等国4位工人幸被准。这些工人与布鲁格兄弟素昧生平，但志趣相投，使得他们相处非常融洽，团结一致，战胜惊涛骇浪，平安航行在古通商航道上。

他们来到广州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参观广州博物馆。当他们在博物馆找到“唐代广州海上交通图”，并证实他们这次前来广州的航线同当年的航线大抵相符时，情不自禁地惊呼了起来。

另一感人的探险活动是1981年6月9日，欧洲12位青年驾驶着他们在广州造船厂订造的中国式仿古木帆船，沿着以广州为起点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绕过好望角，返回巴黎。

这项探险考察计划，原是法国的尼尔·律元、万尚·克鲁佐、让·卡洛德·高梅、让·路易斯四位青年人在1978年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他们都是做工务农的青年人，口袋里“空空如也”。因此，很多人都为这项计划感到目瞪口呆，认为这不过是个梦想罢了！有的人甚至嘲弄他们。不过有一位刚从中国回到巴黎的商人给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情况，鼓励他们试一试。更难得的是尼尔的老祖母鼎力支持这帮可爱的小伙子。她腾出家里的一间小房，并借出一笔钱，让这伙年青人立即开始筹备工作。他们既要准备航海探险的有关资料，筹备经费，又要维持生活，为此，只好几个人轮流外出打短工，省吃俭用，省下钱来进行宣传、联络工作。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准备活动，他们终于由4人扩展到12人，并得到法国埃尔夫国营石油公司等机构的资助。终于凭藉着他们金刚石般的

意志和毅力，实现了不少人认为只能是梦想的计划，轰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的新闻界。

## 五、广州市政府与社会各界齐心 协力大力修建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史迹

近年来，我国有关科研机构、文博系统和高等院校的有关学者，广泛地掀起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热潮，频繁地举行有关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科研论文，其中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刊物《历史研究》1981年12月（第六期）刊载朱少伟所撰的《海上丝绸之路》、1982年6月（第三期）刊载陈炎所撰的《略论海上“丝绸之路”》等文，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兴趣。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还受国家委派和承蒙香港招商集团明华船务公司资助部分旅费，作为中国专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并先后被推举为科学副领队和科学领队。参加这次活动某些考察阶段的还有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学者。

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长盛不衰的重要港市，是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大商埠，因此，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感情和热情，近年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汇总这些研究成果，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和省社会科学院汇编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广州市政府办公厅也委托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古都

学会在广泛征集论文的基础上，研究和汇编了《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即本书）。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广州市政府采取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办法，重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史迹——南海神庙，使千年古庙得以重现原貌英姿，为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做了一项意义十分深远的事情。

南海神庙又称菠萝庙，始建于隋开皇 14 年，距今已近 1400 年的历史。它是历代帝王祭海的场所，也是古代商贾和南海之民出海前祈求“海不扬波”一帆风顺的祭祀海神庙。当年神庙前江边海舶云集，中外商贾熙攘，物宝交驰，盛极一时。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广州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迹。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加上“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千年古庙面目全非。这次维修是近百年来最大、最全面的一次，不但重建大殿、祈亭、东西廊、韩愈碑亭、开宝碑亭、明洪武碑亭、万里波澄碑亭、前后院围墙等，而且还修复了石碑坊、头门、仪门、复原浴日亭、后殿，并整理复原及新刻石碑 40 余方，使千年古庙完全恢复了原貌。有关方面还设想在庙西广场兴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出广州 2000 多年长盛不衰的海上交通贸易文物；拟在庙东北广场，建一座岭南民俗陈列室，复原古扶胥一条街，出售菠萝鸡等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拟在海不扬波牌坊前复原古庙码头，征用农田辟为人工湖，南可通珠江，周围设微缩海上“丝绸之路”，（由广州直达东非航线各国）沿途古代风景点，游人可乘游艇参观。可以想象，这个设想一旦实现，南海神庙将成为一个系列文化史迹游览点，成为人们回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追忆人类友好交往历史的生动课堂，其深远意义将是不同凡响的。

综上所述可见：近年来，全世界确是出现了一股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研究热，而且还有越来越热的发展趋势。细想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并非偶然。就其主要之点而言，这是因为当代世界日益由对抗转为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再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日趋整体化，更加需要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交流。一句话，历史发展迫切要求人们进一步发扬各国人民和平对话、友好交往、各民族文化互相理解交流、平等通商贸易、互得益彰、共同发展的精神。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研究热的出现，正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本文写作的目的，也只是想表达希望有关领导和学者们认清这种形势，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快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步伐，拿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无愧于广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本文作者何礼荣是广州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林康裕是广州师范学院教授）

## 黄埔南岗与海上“丝绸之路”

李 中 区 盍 根

南岗镇在古代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改革开放以来，该镇继承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荣历史传统，弘扬先辈开辟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精神，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试验区的中心城市——广州东南部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南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海上“丝绸之路”闻名遐尔的名胜古迹南海神庙、浴日亭等就在南岗镇境内，足见该镇在古代中外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文帝下诏立祠以祀四海之神，自此建立南海神庙。这一带曾是繁华的商业区，叫扶胥镇。

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镇，地处“黄木湾”，狮子洋在其前，大小虎门当其中。江水波涛浩淼，是一天然海港，自古即为我国对外贸易往来的要道，是我国启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重要口岸，中外船舶往来多停泊于此。人们为了保佑往来船只顺风顺水，生意兴隆，在庙前立了一块石牌坊，上书“海不扬波”。至今牌坊犹存。

南海神庙又称菠萝庙，藏石碑甚多，故又有“南海碑林”之称，还因庙藏有汉代铜鼓，所以又有“汉鼓唐碑”之誉。神庙门口有楹联，上联云：“白浪起时，浪在拍天，山骨折，呼吸雷风”，下联云：“黑云去后，云芽拂诸，海怀开，吞

吐星月”。南海神庙全盛时，南宋诗人杨万里来游后，赞叹不止，称道“天下都无此奇绝”。

在庙仪门之左，有“达奚司空”立像，传说南北朝时，佛教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及其两个弟弟从南天竺（印度）一起航海到广州，小弟叫达奚。船至扶胥港口，大家上岸祭祀南海神。海神要达奚留下，达奚不从，突然死去，死后成神，立化庙左。当地人用泥漆其身加以衣冠，奉为神明，祀于左廊，一手抬至眉际作远瞩状，像前筑一新亭以障之，使之望不见海上舟楫往来，以免触动其思乡之念。

相传每年农历2月11日至13日是南海神诞日，又称菠萝诞。至今仍有一年一度的菠萝诞，而且四乡民众云集，热闹非凡。清崔弼在《菠萝外记》中说，这时“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有不得就岸者，架长篙，接木板作桥，越数十重船以渡……。连声爆竹，灯火通宵，……真天宫海市不为过矣。”到13日神诞，三更时分，已经是庙门“填塞不能入”。庙前的广场，更“搭篷作铺店。凡省会、佛山之所有……百货荟萃，陈列炫售，照耀人目”。应有尽有。

这种以庙期进行的贸易活动，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它最初可能是与外商进行有关的贸易活动，但后来却演变为地域性交易。南海神庙也就变为一年一度的贸易活动中心。对当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时间过去2000年，扶胥港已为沙土淤积，海滩不断伸展而变为遗址，南海神庙也因长期失修和“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而曾经面目全非。但这一切无损它历史上起过的卓越贡献。近几年，广州市政府极为重视，古庙已进行了全面重修，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它光辉的历史又显耀在人们的眼前，

它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见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处在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南岗镇，以海上“丝绸之路”先驱者的开拓精神和创造智慧，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开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村、镇经济和外向型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1992年，南岗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24亿元，比1986年的7800万元，增加7倍多，全镇人均纯收入5200元，是1986年的1500元的3倍。其增长幅度是近年之冠。其中农业总产值已达8300万元，是1986年总产值3800万元的2倍多。而且是在国家征用耕地面积15000多亩的情况下而取得的，这就更是令人瞩目了。镇政府对发展农村经济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善于处理农工两者的关系，坚持把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和健全了双层经营和股份合作制，调整产业结构，实行适度集中，适度经营。重视对农业的投入，抓好科技兴农，大力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搞好水产、禽畜饲养。同时大搞开发性农业，向荒山、滩涂要地，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大力种植发展本镇的著名土特产，如笔村糯米糍荔枝、沙步香蕉、南湾杨桃、金紫白蔗、南岗片糖、鱼包等。

南岗镇工业发展迅速，到1992年，镇工业总产值已达5.14万元，是1986年总产值4000万元的13.5倍多，其发展速度可说是十分惊人的，此乃是在抓好原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同时，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结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这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其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多功能的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新体系。目前全镇引进的厂家发展到94家，已签项目即将投资的有20多家，引进外资9500



多万美元，利用外资 6300 多万美元。为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商的吸引力，几年来，全镇投资 1.4 亿元新建标准厂房 40 多万平方米，实现了镇有工业区、村有工业邨、社有工业楼；镇内 2000 门国际国内直拨程控电话投入使用，可拨通世界各国，形成一个完善的通讯网络。为了加快外向型投资，利用迎春茶话会、端午龙舟节、荔枝品尝会、旅外乡亲联谊会、香港招商会等活动，共聚情谊，沟通信息，联络感情，介绍南岗的优越条件和投资环境，争取更多的投资者。凡港澳、华侨、台胞以及外国商人来南岗办“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除享受国家、省、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外，还可以享受如下优惠条件：①简化审批手续，实行“审批一支笔，服务一条龙；②提供办厂方便，在用地、水、电、通讯等方面优先安排；③厂房价格从优；④工人工资合理；⑤外商投资的企业有权筹措、运用资金；⑥有权自行确定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⑦凡具备外经贸部规定条件的出口产品企业和先进技术的企业，可免交地方所得税和市政建设费；⑧享受三年免税，后六年减半收所得税；联营企业开发的科研成果，可税前提取 20% 作开发基金；外单位在联营中分得的利润，可自主支取。

值得提出的是：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南岗镇境内，离南海神庙只有一箭之地。现在开发区从原来的 9.6 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又在南岗镇东面扩展 5 平方公里。开发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环境优越，南临珠江，隔江与东莞市、番禺市相望，西距广州市中心仅 25 公里，水路距香港 38 海里，南行 5 公里是我国华南第一大港——黄埔新港。近可通沿海港口，远可达世界沿海各国。广深、广九铁路沿北侧而过，广深公路横贯全镇，正在动工兴建的广深珠高速

公路在本镇东侧通过，交通极其方便，至使开发区建区仅 5 年，便在两个小区 4.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完成了基本建设投资 14.26 亿元，实现了通路、通水、通讯、通电、排污畅通的一批标准工业厂房和专用厂房拔地而起，宾馆、商店、学校、住宅、写字楼等公共设施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形成了投资设厂、办实业的环境条件，成为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现代化新型工业园区。迄 1992 年已与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签订了合资、合作项目 370 多项，投资总额达 27 亿元。由于开发区的飞腾发展，其优惠政策和待遇辐射到南岗镇，促进南岗镇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

目前广州市政府批准的 15 平方公里的“云埔工业开发区”，是广州市东南部开发的重点之一，其范围大部分在南岗镇内。云埔（南岗）工业开发区的 2 平方公里与新扩展的开发区相连，现在南岗镇已完成了总体规划，进入“三通一平”阶段。云埔（南岗）工业开发区除了享受以上 8 项优惠条件外，广州市政府还颁布了“十大优惠政策”，使投资者能够得到更多的优惠，成为海内外客商的投资乐园，镇党委、政府已制订了具体可行措施，决心到 1998 年基本建成以工业为主体，商业、宾馆、金融、教育卫生、娱乐等配套齐全的工业城。

南岗镇——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城乡一体化的新城镇！到那时，这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将更加欣欣向荣，兴旺发达。如果达奚在天之灵能看到此种情景，相信他将不再会为当年留下来为南岗镇民而惋惜了。

（本文作者单位：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黄埔区南岗镇政府）

## 五、海上“丝绸之路” 大事记



# 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

邓端本

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古越人，便有过向海洋大迁徙的活动，从而开辟了由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和太平洋诸群岛之间的远洋航线。在这些地区和岛屿中，发现百越新石器文化特型器物的有段石镞，便是历史的物证。

先秦时期：南越（岭南）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玕向中原的输出地，这些物资大部分是通过与东南亚等地贸易而来的，是为海上的“丝绸之路”的萌芽时期。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统一岭南，分岭南为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治番禺。郡尉任嚣筑番禺城。港市开始形成。

汉初南越国时期：番禺为全国 19 个大都会之一，是珠玕、犀角、象牙、玳瑁、果、布、银、铜的集散地，中原商人往番禺经商者，多发财致富。番禺作为对外贸易城市的地位，已经确立，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在此时期正式形成。

公元前 111 年（元鼎六年）：汉武帝灭南越国，于南越故地分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在此时期，由日南、合浦、徐闻起航，开辟了往印度的海上贸易航线。

公元 217 年（建安二十二年）：交州郡治由广信（今广西

梧州)迁至番禺。由于海上“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番禺附近已有种桑养蚕业出现。

226年(吴黄武五年):孙权实行交广分治,分合浦以南为交州,以北为广州,广州因此而得名。吴国很重视东南沿海的开发,广州成了孙吴政权贸易的重要港口。

281年(西晋太康二年):罗马帝国遣使访问中国,经过广州至洛阳。由于使者是沿海路而来,因此,也被视为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年,印度佛教僧人迦摩罗至广州传教,建三归、王仁二寺。

397年至401年(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到广州传教,建王园寺(今光孝寺)。

402年(元兴元年):广州已经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了。史载:“珍异所出,一篋之宝,可资数世。”所以,朝廷派著名的清官吴隐之来担任广州刺史。

420年至589年(南北朝时期):广州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港口,又是“四方珍怪,莫此为先”、“瑰宝溢目”的城市。梁普通八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道至广州传教,他上岸的地方,后人称之为“西来初地”。

594年(隋开皇十四年):在广州东郊黄木湾建南海神庙,反映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航海人员不断增加,因而建庙礼拜,以适应航海人员的需要。

607年(大业三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出航地点在广州。

656年至661年(唐高宗显庆年间):朝廷下诏,加强市舶管理,说明广州外贸进一步繁荣。

684年(嗣圣元年):广州都督齐元睿因放纵部下,侵扰来广州经商的外舶,被愤怒的外国商人刺杀。

714年（开元二年）：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的专官）周庆立与波斯僧造奇巧进献给玄宗皇帝，此事证明广州当时已有市舶使之设。

716年（开元四年）：朝廷批准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以解决岭南至中原的交通运输，进而促进广州外贸的发展。

756年（乾元元年）：9月，阿拉伯、波斯商人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逃跑，由此可见广州外商之多。

唐朝中期：政府划地为“蕃坊”（在今光塔路一带），专供外侨居住。大批阿拉伯商人到广州经商，带来伊斯兰教，建怀圣寺以及光塔。

768年（大历三年）：李勉任广州刺史，因为官清正，来广州经商的外舶大增，由过去一年的四、五艘，增至四十余艘。

785年至805年（贞元年间）：贾耽编写《广州通海夷道》，以广州为始发港的海外交通航线，已延伸至波斯湾一带。广州，也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2月，宋军攻下广州。6月，以潘美、尹崇珂为广州市舶使，着手成立市舶管理机构。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麻逸国（菲律宾）商船到广州贸易，是为历史记载菲律宾与广州贸易之始。

1004至1078年（景德年间）：经略高绅建西澳码头（今南濠街），既为船舶避风，也便利贸易。

1008年至1016年（大中祥符年间）：广州知州邵煜，开凿城濠，方便交通，抗御台风，为市民做好事，为海外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056年至1063年（嘉祐年间）：经略魏炎建海山楼，为欢送蕃商回国，作临别饯行之所。

1071年（熙宁四年）层杞国（今桑给巴尔岛）贡使航海至广州，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宋代海外交通航线已延伸至东非了。

1077年（熙宁十年）：广州市舶司收购乳香占全国乳香收购量的98%。是虽三处置司（明、杭、广），实只广州最盛也。

熙宁年间，广州城区面积扩大，加筑了东城和西城，对外贸易促进了城市建设。

1080年（元丰三年）：宋廷以广州为试点，制订《广州市舶条》，并以广东转运使孙洙为首，组织班子，向全国推广。此“市舶条”是为中国最早的市舶管理条例。

北宋末年：中国远洋船舶已使用先进的指南针导航，瓷器也大量出口，远销海外。

南宋渡江初期：明、杭、广三司市舶收入达200万缗，广州贸易为全国之冠，其收入最少有120万缗。

1131年（绍兴元年）：阿拉伯商人蒲亚里向广州进口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角三十五株，价值五万余贯，轰动一时。

1156年（绍兴二十六年）：外商蒲晋、蒲延秀因经常支持广州外贸，成绩显著，对繁荣市舶作出贡献，被分别授予忠训郎和承信郎的官职，以资鼓励。

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朝廷命广东招讨使杨廷璧，出使印度，招谕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国家前来通商。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廷建立广州市舶司。

1297年至1307年（大德年间）：与广州通商的国家 and 地区共140多个。

1322年（至治二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鄂多立克由海路抵广州，称广州为辛迦兰大城，城内有庞大的船队，其数量比当时整个意大利的船舶还要多。



1347年至1348年（至正七年至八年）：中世纪四大旅游家之一，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游广州，称广州为世界大城之一，市场之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造船业发达，能造载1000人的远洋船舶，广州船舶远航至印度半岛及波斯湾等地。

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命廖永忠率兵，由海道攻打广州，元守将何真投降。

1369年（洪武二年）：改元朝的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广州。广东省之名自此始。

1370年（洪武三年）：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市舶司。

1374年（洪武七年）：明太祖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海禁，不准“片板下海”。罢三市舶司，禁止私人通商海外，对外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出现，叫“朝贡贸易”。

1381年（洪武十四年）：又重申濒海居民不得私通海外诸国。此后，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三十年，都有类似的禁令颁布。但私人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禁绝的。洪武二十六年，香山县（今中山县）三灶岛便发生居民吴进添所谓“通蕃”事件。而明朝另一种贸易形式——以走私为主的私人海外贸易，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

1403年（永乐元年）：重新恢复三市舶司的设置。但私人海外贸易仍然禁止。

1405年（永乐三年）：因朝贡贸易不断发展，前来朝贡的贡使和蕃商日益增多，乃在广州十八甫怀远驿，有房舍120余间，作为招待贡使和蕃商之用。

1493年（弘治六年）：两广总督都御史闵珪向朝廷上奏疏，报告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

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

到达印度，从而发现了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促使了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

1509年（正德四年）：有暹罗番船因风飘至广东，停于泊所。当时的镇巡官会议以亟军需开支为理由，对其货物征税（在这之前朝贡贸易是不征税的），正德五年，户部对这一行为认可。右布政使吴廷举根据这一历史情况，请准朝廷，在广东正式建立番船征税制度，税率为20%。

1514年（正德九年）：有一批葡萄牙商人航海到中国，至当时广州之外港屯门，并在这个地方建立石碑，以为发现之纪念。

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以国王名义派皮来资为使节，偕安拉德等人率军舰八艘，抵达屯门，并于同年九月，舰队驶进广州，要求通商。

1521年（正德十六年）：葡萄牙人在屯门被逐。

1522年（嘉靖元年）：葡萄牙舰队又寇新会西草湾，被明军击退，并因倭患严重，罢浙江、福建二市舶司，广州为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

1529年（嘉靖八年）：巡抚广东都御史林富上《请通市舶疏》，要求放宽对广州外贸的限制。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托言舟触风涛，暂借澳门曝晒水湿贡物，进而盘据澳门，并以澳门为中转港，开辟了澳门至欧洲、澳门至日本、澳门至菲律宾等贸易航线，大量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澳门也因此而繁荣了一个多世纪。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设立客纲、客纪，整顿牙行组织，加强对外国商船的服务。

1567年（隆庆元年）：明廷有限制地开海贸易。

1575年（万历三年）：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出现，这条航线首先通过广州和福建的海商，供给马尼拉丝绸等物，然后再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到墨西哥和秘鲁。广州当时有夏秋两季的出口商品交易集市。

1582年（万历十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经广州至肇庆传播天主教。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西班牙商船来广东互市，船泊虎跳门。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派船至澳门求市。

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商船四艘至广州求市。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朝廷颁布禁海令。

1662年（康熙元年）：重申禁海令，并令沿海居民内迁50里。广州对外贸易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1679年（康熙十八年）：准开澳门陆路贸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撤消海禁，准予开海贸易。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设立粤海关，外国商船泊黄埔。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禁往南洋贸易。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广州成立公行，这是当时主持外贸的十三行商人组织，此后时组时废。

1725年（雍正三年）：废除禁往南洋贸易的禁令。

1728年（雍正六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以后荷兰、丹麦、瑞典亦相继在广州设立商馆。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禁止外国商人往闽、浙、江海关贸易，广州成了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广州重组公行，加强对外贸易的服务。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贸易，是为中美两国贸易之始。

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国政府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1834年到职，旋与地方官发生冲突，于是年11月退出广州，病死于澳门。

1837年（道光十七年）：英政府派义律为驻华商务监督，执行领事之责。此时鸦片贸易已十分猖狂。

1838年（道光十八年）：两广总督邓廷桢禁鸦片，遭英、美鸦片贩子的反对。广州人民举行万人示威，支持邓廷桢的禁烟斗争。

1839年（道光十九年）：朝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抵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万多箱，全部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史阶段。

（本文作者生前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编 后 语

本书自 1990 年 6 月开始组织征稿，蒙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积极撰稿，南岗镇政府、光孝寺、六榕寺等单位鼎力资助，广州博物馆和南越王墓博物馆大力支持并提供照片，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借此致以衷心感谢！

在编辑本书过程中，曾先后两次邀请部分作者和邓炳权、杨劲等专家学者举行研讨会，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学术问题和编辑本书的指导思想等问题，进行共同的研讨，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互通使节、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它起始于秦汉时期，终止于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它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起过重大的作用，特别是极大地促进了相互贸易交往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唯独长盛不衰和贸易量最大、交往地区最广的重要城市。因此，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同一般的。

与会专家学者还一致认为，编辑本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主要是响应和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探索未来；弘扬先人开拓“丝绸之路”的精神，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学术、文化、经济交流，推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在编辑过程中，力求以作者所提供的确凿历史资料和科学见解，以史籍

记载和历史遗迹为依据，从各个方面论证广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名城广州的光辉历史业绩，进一步推动“识名城、爱广州”活动。

编书期间，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号考察船驶抵广州进行调查研究 and 学术交流；还有幸参加前来广州访问的瑞典历史代表团为纪念曾多次运载货物航行于广州和瑞典间“丝路”的哥德堡号商船所举行的学术座谈会；还有阿曼民族遗产与文化大臣费萨尔·本·阿里·赛义德亲自率领的大型代表团来广州，庆祝10年前阿曼“苏哈尔”号仿古木帆船访问广州10周年而举行的庆祝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各国人士如此热心考察研究广州，在“丝绸之路”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倍加努力地工作，为编好此书，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广州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书由原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初同志题写书名。

本书从筹划、组织、编辑直至出版的全过程，都是在广州市政府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和协调下进行工作的。中山大学出版社刘翰飞同志亲自参加了审稿。

尽管编者作了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3年8月